

جوڭگوت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 中國邊政

شۇر. ۋەزى. مەسئەل. شۇر.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مەسئەل. شۇر. ۋەزى. مەسئەل.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三月

201

## 怒族簡介

怒族主要居住在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之碧江、福貢、貢山三縣，據 1982 年資料其人口爲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六人，及至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其人口爲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三人，二十八年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增加率相高。

碧江縣的怒族自稱「努蘇」、福貢縣的怒族自稱「阿怒」、貢山縣的怒族則自稱「阿龍」；從不同的自稱中可以看出，怒族可能有兩個來源，即自稱「怒蘇」與「諾蘇」的，與大小涼山一帶自稱「諾蘇」的彝族可能同源共祖，「怒蘇」與「諾蘇」音義都相同，在元代的文獻中也把他們統稱爲「廬鹿蠻」；而福貢、貢山兩縣的怒族，則可能來自怒江北部貢山一帶自稱爲「阿龍」或「龍」的古老民族，這部分怒族與獨龍族在古代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至今貢山怒語和獨龍語可以互通，儘管如此，怒族中的這兩部分由於長期交往，相互影響，已形成了今天的怒族。

怒族語屬漢語系藏緬語族。貢山怒語、福貢怒語、碧江怒語的方言差別很大，三者不能互相通話，怒族由於長期與傈僳族混處，普遍都會說傈僳話，怒族並未創制文字，現在大都使用漢語。

在宗教信仰方面，主要還是泛靈的薩滿信仰，近代以來也有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散布在貢山北部與藏族雜居的怒族人，也有少部分信仰喇嘛教。

怒族的家庭以小家庭制爲主，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組成，丈夫爲家長，掌管家庭重大事務，女子一旦嫁人，便處於從屬地位，除了與男子共同參加田間勞務外，還要承擔采集、做飯、紡織等繁重家務，在經濟上沒有任何權利，嚴重的男女不平等。男子享有繼承財產的權利，女兒則沒有繼承權，依照怒族的傳統習慣，怒族社會普遍由幼子留守老家，與父母同住，承擔養老送終的義務，同時也享有優先財產繼承權。怒族婚姻以一夫一妻制爲主，少數頭人與富裕者，也有娶妾的現象，當然目前的法律已不允許多妻制。在婚姻禁忌上比較寬鬆，除親生父母、子女、親兄弟姐妹外，叔伯兄弟姐妹，從兄弟姐妹等，都可以互爲婚嫁，這是一種亞血緣族內婚。

在飲食以玉米、蕎子爲主食，貢山怒族學會種植青稞後，也以青稞麵爲主食，蔬菜則有白菜、蘿蔔、瓜豆等，男女都善飲酒。怒族人居住的房舍多用木或竹篾建造，通常只有兩間，外間待客，內間爲主人臥室，外人不得進入。

怒族葬俗以往多爲火葬，近年以來有改行土葬，土葬時，男性採伸肢仰臥，女性則爲屈肢側葬，如果是夫妻葬，則婦女須面向男子屈肢，這是相當特殊的。

怒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詞大部分是按照曲調即興編唱，因此顯得多彩而活潑、舞蹈則多爲摹擬動物活動的形象，以是動作十分豐富。



# 目 錄

略論古代氐、羌族的分佈、遷徙及漢化 .....	周偉洲	1
近年藏情與達賴言行 .....	孟 鴻	13
霧社事件及其餘生遺族的歷史記憶——兼評《又見真相： 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 .....	方素梅	55
從中俄雅克薩之戰到黑瞎子島歸還 .....	劉學鈺	69
《滿洲實錄》滿、漢文本對勘研究 .....	強光美	93
介敘林恩顯博士所著《新疆論叢》 .....	孟 鴻	113
論《飛燕驚龍記》書中韓愈的為文立場——以《送溫處士赴 河陽軍序》一文為例 .....	張華克	121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十七）——黎族食品「竹筒飯」 .....	華 華	131
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暨中國邊疆研究所 專題講演紀實 .....	林遙鵬	135
中國邊政協會第41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	編輯部	149
稿 約 .....		154

☆ 本（中國邊政）季刊經理監事聯席會議（2015.2.14）決議自 202 期起，凡投稿者論文標題、摘要、關鍵字均需中、英文併列，特此通告。

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鈺《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業已由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出版（TEL:2331 8262）。

本書計收錄《論清代邊政之得失》等六篇論文。本書書名雖以「邊政」爲主，但內容卻不以「邊政」爲限，而是兼及中國邊疆特定地區的史地變遷、風土民情、經貿發展、宗教文化、詩詞歌賦等，內容深入淺出，對於前人鮮少述及者多所引介闡釋，值得關注此一議題者細細品味。





# 略論古代氐、羌族的分佈、遷徙及漢化

周偉洲

四川大學講座教授、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教授

## 摘要

氐與羌是中國古代西北兩個關係密切的古老民族。本文根據古代文獻分別論述氐、羌兩族的名稱、原始居地，以及兩族在秦漢統治下，因各種原因而遷徙，分佈於西北的關中、隴西、河西等地，與漢族雜處，而逐漸漢化。重點敘述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兩族的遷徙與分佈，以及其漢化過程：指出氐族到隋唐時，絕大部分已漢化；而關隴等地羌族也大致融入漢族，青海、甘南的羌則先後融入吐穀渾和吐蕃(藏族)之中。僅四川汶川、茂縣一帶羌族綿延至今。

**關鍵字：**氐 羌 遷徙 分佈 漢化

氐與羌是中國古代西北兩個關係密切的古老民族，語言均系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在先秦的典籍《詩經·商頌·殷武》、《竹書紀年》、《逸周書·王會》、《山海經海·內經》中，就有“氐羌”的記載，且多是“氐羌”並提連稱。如人們熟知的《詩經·商頌·殷武》雲：“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等。學者們對先秦時的“氐羌”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有謂先秦文獻“氐羌”連稱應為一族，只是秦漢時才分為氐與羌兩族，即所謂“同源異流”；<sup>1</sup>又有說先秦“氐羌”原

<sup>1</sup> 見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第 49-52 頁。

居地、風俗、語言異，原本就是兩族。<sup>2</sup>但是，無論如何，至少至秦漢時，氐與羌已是不同的兩個民族，均屬於四夷中的“西戎”。

從秦漢時起，氐與羌兩族的原始居地、社會經濟生活、風習及社會組織以及與各王朝的關係等情況，史籍也開始有了較為明確的記載。從西元前 2 世紀至 10 世紀，即秦漢至於隋唐王朝的一千多年時間內，氐、羌族因各種原因不斷遷徙，分佈於西北的廣大地區，與漢族及其它民族雜居錯處，並逐漸與其他民族融合。本文所要探討的即是西北的氐、羌族在上述一千餘年間的遷徙、分佈及與漢族的融合，即所謂“漢化”的問題。

### 一、氐族

關於氐族的稱謂，顯然是當時華夏族對他的稱呼，據學者研究，此名與其原居地隴西“隴坻”有關，“秦謂陵阪曰坻”<sup>3</sup>，故華夏漢人稱之為“氐”，與其所居地形(坻或坻)而名之。<sup>4</sup>成書于西晉初的《魏略·西戎傳》雲，氐人“其相號曰盍稚”。<sup>5</sup>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自冉駹(今四川茂縣、汶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即白馬氐)最大，皆氐類也。”這是較早記載氐族原始居地的情況。到西漢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漢武帝開西南夷，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於氐人原始居地岐隴以南、漢川以西之地設武都郡(治今甘肅隴南武都區)<sup>6</sup>，曾引起部分氐人的遷徙，正如《魏略·西戎傳》所說，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漢書·地理志》記武都郡所轄九縣，其中武都道、下辨道、平樂道、嘉陵道、修成道、嘉陵道、故道，均有氐人居住其間。漢代“道”，相當於縣，設于居有漢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地方，《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有蠻夷曰道”。此外，《漢書·地理志》記隴西郡(治今甘肅臨洮)所轄之氐道、戎邑道、略陽道、綿諸道、獬

<sup>2</sup> 見馬長壽《氐與羌》，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引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再版本，第 8-19 頁。

<sup>3</sup> 許慎《說文》卷一四下。

<sup>4</sup> 馬長壽《氐與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頁。

<sup>5</sup> 《魏略·西戎傳》見《三國志魏志》卷三〇《烏桓鮮卑東夷列傳》注引。下引此書，再不出注。

<sup>6</sup> 參見《北史》卷九六《氐傳》。

道；廣漢郡(治今四川梓潼)所屬之剛氐道、旬氐道；蜀郡(治今四川成都)所屬的湍氐道等，也均有氐人居住其間。

以上地區包括今甘肅隴西、隴南及四川西北等地，均已爲氐族居地，而氐族的原始居地大致在今甘肅東南，漢代的武都郡，包括西漢水、白龍江流域及涪水上游。西漢武帝開西南夷，在氐人原始居地設立的武都等郡縣，其意義重大。對氐族而言，其居地本與早已成爲華夏漢族的秦人、周人居地鄰近，兩者也早已有頻繁的交往；秦、漢統治者，特別的漢代的統治者郡縣其地之後，統治者採取傳統的“用夏變夷”之策，任用漢族官吏，以漢族“法教”治理該地，使漢族經濟、文化等傳入氐族之中，其中不乏帶有“強迫同化”的性質。漢、氐兩族在語言、文化習俗及農耕經濟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具有強勢的漢文化逐漸影響和促進了氐族的“漢化”進程。

不僅如此，自漢魏以來，內地的統治者多次將氐族遷徙到河隴、關中等漢族聚居之地。早在漢武帝開西南夷，於氐族聚居之地置武都郡，引起氐人反抗，武帝出兵鎮壓，分徙一部分氐人於酒泉郡(治今甘肅酒泉)。<sup>7</sup>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取漢中後，命武都太守楊阜先後徙氐人萬戶於京兆(治今陝西西安)、汧(治今陝西隴縣南)、南安(治今甘肅隴西)、天水、廣魏(治今甘肅天水東)等郡縣內。<sup>8</sup>到三國時，魏、蜀兩國爭奪武都，魏先後數次將武都一帶氐人遷徙到能控制的漢陽郡(原天水郡)和關中等地。<sup>9</sup>蜀漢也曾將武都氐王苻健等四百餘戶遷到廣都(今四川成都南)。<sup>10</sup>

到魏末晉初，因氐族的遷徙，其分佈大致在以下三個地區：一是其原居地武都、陰平一帶，《魏略·西戎傳》記：“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二是關中地區，主要集中在京兆、扶風、汧、隴(今陝西千陽東)，即長安西北一帶。晉江統《徙戎論》說：“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所謂“戎”，即指氐、羌。又說：“徙扶

<sup>7</sup> 《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

<sup>8</sup> 《華陽國志》卷二；《三國志魏志》卷二五《楊阜傳》。

<sup>9</sup> 《三國志魏志》卷三〇注引《魏略·西戎傳》。

<sup>10</sup> 《三國志魏志》卷九《夏侯淵傳》；同書卷一七《徐晃傳》。



風、始平、京兆之氐，著陰平、武都之界”。<sup>11</sup>氐族在關中的分佈及其原居地則就十分清楚了。晉元康六年(296年)，關中氐、羌、匈奴等族聯合起義，反抗西晉統治，其首領即是已淪為晉編戶的氐人齊萬年。<sup>12</sup>可見，遷入關中的氐族多淪為西晉的“編戶齊民”，與當地漢族處於同等的社會地位和有相同的社會環境。三是隴西的天水、南安、廣魏(原為略陽郡)諸郡。此地氐族很多，十六國時建前秦的氐族苻氏、建後涼的氐族呂氏，原均為略陽氐族。

正因為漢魏長期對氐族居地設置郡縣，以及部分氐族遷入漢人聚居的隴西、關中等地，與漢族雜居錯處，更加速了其漢化的進程。魏末晉初的魚豢所撰《魏略·西戎傳》中，記載當時氐族的風俗說：

其俗，語不與中國(此處指漢族)同，及羌、雜胡同。各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錦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發。多知中國語(漢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

由此可知，魏末晉初的氐族雖然還保存自身的語言、風俗及種落王侯(主要指隴西、隴南原居地的氐人)；但其姓氏、語言(多知漢語)及農耕的生產方式已與漢族相同。其漢化的程度由此可知。

至十六國時，前趙、後趙和氐人苻氏所建前秦時，氐人的遷徙更為頻繁，有的甚至東遷至今河南、山東等地。如前趙劉曜都關中時，曾於光初七年(324年)，“徙秦州大姓楊(氐族)、薑(羌族)諸族二千余戶于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十一年(328年)劉曜遣軍襲氐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sup>13</sup>略陽氐酋苻洪等，後趙時曾被徙於關東枋頭(今河南淇縣)。<sup>14</sup>苻堅即出生於此。東晉永和七年(351年)略陽氐苻氏建前

<sup>11</sup> 《晉書》卷五六《江統傳》。

<sup>12</sup> 《文選》卷二〇《關中詩一首》李善注引潘嶽《上關中詩表》雲：“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

<sup>13</sup> 均見《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

<sup>14</sup> 《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

秦政權，至苻堅時基本統一了北方，都長安。前秦建元七年(371 年)，苻堅曾進攻氐族聚居的仇池，克之，“徙其民於關中”。<sup>15</sup>此時，僅關中的氐族就達十五萬戶以上<sup>16</sup>。苻堅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於前秦建元十六年(380 年)將關中氐人一萬餘戶分別遷徙到冀州的鄴城、並州的晉陽、雍州的蒲阪(治今山西永濟)、河州的枹罕(今甘肅臨夏)、豫州的洛陽，於是氐族又遍於各地。<sup>17</sup>至前秦延初元年(394 年)，前秦爲後秦所滅，前後共 44 年。十六國時，氐族還在西北建立了一個政權--後涼，它是由前秦苻堅大將、略陽氐族呂光所建，都姑臧。<sup>18</sup>後涼時，氐族又相對集中到河西走廊一帶。後涼最後爲後秦所滅。

在北方十六國分裂割據、社會動盪、民族遷徙頻繁的時期，氐族在關中、隴西、隴東、河西的頻頻遷徙，與漢族的錯居的面更廣，兩族的關係也更加密切。略陽氐族苻氏、呂氏先後建立的前秦、後涼政權均採用了漢魏以來漢族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帶有漢化色彩的經濟和文化措施。兩個政權的滅亡，也加速了氐族的分散及與漢族的接觸。特別是作爲氐族的苻堅，一向以繼承和發展傳統的漢族封建文化爲己任，並以此來“變夷”。史稱苻堅曾“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並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sup>19</sup>這些教育措施對於氐、羌等族上層貴族子弟學習漢族文化起了積極的作用。苻堅還“起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教爲將士”。<sup>20</sup>又“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sup>21</sup>也就是在軍隊和宮廷裏也辦起學校，學習漢族先進文化。總之，苻堅廣修學宮，大肆推廣漢族封建文化，目的之一就是欲使自己統治下的諸族學習漢族先進文化，改變他們的“荒俗”，而知“仁義”，“用夏變夷”。這些措施無疑有助於氐、羌等族的

<sup>15</sup> 《宋書》卷九八《氐胡傳》。

<sup>16</sup>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晉書》卷一二二《呂光載記》。

<sup>19</sup> 《晉書》卷一〇三《苻堅載記》。

<sup>20</sup> 《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兵部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sup>21</sup> 《晉書》卷一〇三《苻堅載記上》。

漢化。因此，可以說十六國時期是氐族進一步漢化的重要里程。

南北朝時，氐族大多漢化較深，其分佈地區大致與十六國時相同，如秦(即隴西)、雍(即關中)兩州仍然有許多氐、羌、屠各等居住其間。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雍州渭北爆發了以盧水胡蓋吳爲首的各族起事，次年，秦、雍氐、羌等起來回應，“有氐、羌一萬屯於南嶺(在今甘肅天水南)”，後爲魏將封敕文所攻滅。<sup>22</sup>又北魏和平二年(462 年)又有雍州扶風氐人仇儁檀等率眾起事。<sup>23</sup>至西魏、北周時，仍見史籍有關於秦、雍一帶的氐族反抗統治者的記載。<sup>24</sup>氐族反抗北朝統治失敗後，分散、遷徙，與漢族進一步錯居，漢化日深。到隋唐時，秦、雍等地的氐族可以說已漢化，基本不見於史籍。

氐族最集中之地武都、陰平兩郡，中心是仇池。在東晉十六國時，氐族豪酋楊氏先後在仇池一帶建立了前仇池國(296-371 年)和後仇池國(386-443 年)。後仇池國是氐酋楊定所建，其盛時領有隴西南部，攻掠天水、略陽、隴城等地。後楊定爲西秦乞伏乾歸所殺。楊定死後，其後代保武都、陰平兩郡。到東晉義熙元年(405 年)，楊氏勢力增長，佔據了今陝西漢中，後取西秦赤水(今甘肅岷縣)以西之地；又寇劉宋益州之葭萌(今四川廣元東南)、涪城(今四川綿陽)。劉宋元嘉二十年(443 年)，後仇池國終爲劉宋、北魏所滅。此後，氐族楊氏子孫相繼又建立了武都國(443-477 年)、武興國(478-553 年)、陰平國(477-580 年)。陰平國最後爲北周所滅。

25

氐族楊氏所建諸仇池國很大程度上是受內地政權的控制，其自主權較爲薄弱。十六國至南北朝時期，建於北方和南方的政權對仇池楊氏的割據勢力的爭奪，使其時而爲北方政權所控制，時而又爲南方政權所統治，成爲他們邊疆地區的州郡之一。而楊氏割據勢力亦不時倒向北方或南方政權，以求得生存。這也是仇池國得以綿延不斷的原因之一。但是，隨著內

<sup>22</sup> 《魏書》卷五一《封敕文傳》。

<sup>23</sup> 《魏書》卷三〇《陸真傳》。

<sup>24</sup> 如《周書》卷一九《侯莫陳順傳》、同書卷三三《趙昶傳》記：西魏大統年間，南岐州氐民苻安及清水郡、東秦州的氐酋李鼠仁、梁道顯等先後起兵反等。

<sup>25</sup> 參見張維《仇池國志》1948 年甘肅銀行鉛印本；韓定山：《陰平國考》，1941 年鉛印本；李祖桓：《仇池國志》，1986 年書目文獻出版社。

地割據局面的變化，統一的趨勢不可避免，仇池國也就最終為北周所滅，而氐族楊氏亦就進一步漢化，到隋唐時這一地區的氐族大部融入漢族之中。只有部分未漢化的武都一帶的氐人，後為唐代興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所統治而逐漸融入吐蕃。

現今四川、甘肅交界的平武、文縣一帶因特殊地理環境，受外界的影響較少，歷代這一帶的民族被稱為“番人”。上世紀 50 年代被識別為“藏族”（“白馬藏族”）。但是，他們在語言、衣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均與藏族有明顯的差異。學者們從歷史文獻及民族現狀考證、分析，認為白馬藏人很可能是古代氐族的後裔。<sup>26</sup>但是，經過千餘年的變化，白馬藏族受鄰近的漢、藏族的影響，已有藏化、漢化之趨勢，與原來的氐族已有一定的差別了。

## 二

羌族，也是華夏對它的稱呼。“羌”字來源，據許慎《說文》卷四釋“羌”雲：“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即是說，華夏人將西部以牧羊為生的民族稱之為羌。近現代居四川茂縣、汶川的羌族自稱為“日芊”或“日綿”、“日瑪”。<sup>27</sup>

先秦時，在秦隴一帶已有從事農業的“薑姓”的西戎，應即羌族的一支，正如《後漢書·西羌傳》所說：“西羌之本……薑姓之別也”。羌、姜兩字古代相通，本是一字。薑氏與興起於關隴的周人有密切的關係，兩族通婚，傳說周人始祖後稷母為“姜嫄”，周文王元妃“周薑”<sup>28</sup>、武王妃“邑姜”（姜太公女）等<sup>29</sup>。姜姓族人隨周人多次遷入內地（中原），也隨周人一些華夏化了。

然而，在薑姓羌族之西的的羌族，到秦漢時稱“西羌”，《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集中敘述了東漢前西羌的歷史。羌族原居地在“賜支”（一作“析支”），即今青海黃河河曲一帶，包括青海湟水流域。傳說秦厲

<sup>26</sup> 見曾維益編著：《白馬藏族研究文集》，四川民族研究所內部刊印本。

<sup>27</sup> 上引馬長壽：《氐與羌》，第 12 頁。

<sup>28</sup> 《詩經·大雅》；《史記》卷四《周本紀》。

<sup>29</sup> 《史記》卷三九《晉世家》注引《集解》：“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也’。。”

公時(前 476-前 443 年)，有秦人奴隸羌人無弋爰劍逃至三河(黃河、賜支河、湟河)間羌人原居地，教之田畜。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立，前 384 年)，忍季父印率部出賜支河曲，“其後子孫分別……或爲犛牛種，越嶲羌(今四川西昌一帶)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今四川松潘一帶)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今甘肅隴南武都一帶)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sup>30</sup>

至西漢武帝設河西四郡前後，於西羌聚居的河湟地區設置郡縣，以隔絕羌、胡(匈奴)。《後漢書·西羌傳》詳細記錄了各地羌族部落，主要有賜支大、小榆穀(在今青海貴德一帶)的先零、卑湍、燒當、鐘存(又稱“鐘羌”)等部，湟水流域的罕开，河曲西的滇零，金城郡(治今甘肅蘭州西)附近的牢姐、當煎部，等等。西漢統治者開始把降附或因羌族反抗後俘虜的羌族徙之於河西、隴右、關中諸郡。於是羌人就逐漸向東遷徙，遍於河隴、四川西北等地。東漢建立後，由於統治階級加強對西羌的壓迫和剝削，不斷引起羌族的反抗，東漢政府在鎮壓了羌民反抗後，又陸續強遷羌民入內地，使其更深入到安定(治今甘肅鎮原東南)、北地(治今寧夏金積)、上郡(治今陝西米脂北)，甚至三輔和河東地區。<sup>31</sup>於是，史籍中出現與“西羌”相對的所謂“東羌”之名。所謂東羌，指“羌居安定(治今寧夏鎮原東南)、北地(治今寧夏吳忠南)、上郡(治今陝西榆林南)、西河(治今山西離石)者”；西羌指“居隴西(治今甘肅臨洮)、漢陽(治今甘肅天水東北)，延及金城(治今甘肅蘭州西)者”。<sup>32</sup>

總之，兩漢時期統治者不斷鎮壓羌人反抗後，將羌人徙於關中三輔、河隴等地，使羌人與華夏漢人雜居錯處，羌、漢兩族關係進一步密切。同時，兩漢統治者在包括羌人原始居地的河湟地區，設立郡縣，以漢法治之，並大開屯田，加速了羌民的漢化進程。

到東漢末年內徙於西北諸郡的羌族，又成爲割據西北的地方勢力倚恃的主要力量。比如起于西北的董卓、韓遂和馬騰父子等軍事集團，莫不擁

<sup>30</sup> 《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

<sup>31</sup> 前人論述漢代西羌落及其遷徙甚詳，此不贅述。可參見上引馬長壽：《氐與羌》，第 94-128 頁；冉光榮、李紹明、周錫銀：《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5 年版，第 53-73 頁。

<sup>32</sup> 《資治通鑑》卷五二，東漢永和五年(140 年)正月條，胡三省注。

有眾多的羌兵。他們先後率領羌兵進入內地，逐鹿中原，使原河隴的羌人更內徙於關中等地，與漢民雜處。

除此而外，仍有大批的羌族留居於河湟、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等地。他們基本上保存了原有的社會組織，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發展階段。東漢末年，他們亦往往成為西北割據勢力爭取和掠奪的對象。此外，在今新疆地區也有一些羌族部落，如漢代的若羌及從若羌向西南一直到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分佈著名為蔥茈羌，白馬、黃牛羌等部落。<sup>33</sup>

正因為如此，所以到魏晉十六國時期，羌人遍於西北的涼、秦、雍、益四州之地。下麵就以這四個地區分述羌族的分佈、活動及漢化過程。

涼州（治今甘肅武威），包括今青海部分地區，自秦漢以來是羌族原始居地。曹魏初，涼州幾經戰亂，戶口凋零，後在金城太守蘇則的招撫之下，多有羌民返居郡縣。<sup>34</sup>此後，魏、蜀兩國又展開了爭奪涼、秦等州的戰爭，該地的羌、氐等族多有反復於兩國之間者。如魏景初二年（238年），有燒當羌王芒中、注脂起兵反魏。<sup>35</sup>東漢建安九年（204年）至曹魏正始十年（249年）間，蜀將薑維出隴西，與魏爭奪涼、秦二州羌族，有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攻圍城邑，南招蜀兵。<sup>36</sup>西晉初，以鮮卑秃發樹機能為首的各族反晉鬥爭中，涼州羌氐也積極參加，為數不少。

十六國時，涼州的羌族先後為前涼、後涼、南涼、西秦、北涼等政權所統治。而在各政權相互兼併的戰爭中，羌人往往成為各族統治者掠奪的對象，有的被迫遷徙到統治者易於控制的地區。如南涼嘉平二年（409年），南涼秃髮禿檀取武威後不久，即下令遷西平、湟河（治今青海循化北）諸羌三萬余戶于武興（治今甘肅永昌東）、番禾（治今甘肅永昌）、武威、昌松（治今武威南）四郡。<sup>37</sup>在今青海湖西南的白蘭羌（在今青海都蘭、巴隆一帶），則為晉末遷至甘南和青海的吐穀渾所征服，其中有部分融入吐穀渾

<sup>33</sup> 《三國志魏志》卷三〇《烏丸鮮卑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sup>34</sup> 《三國志魏志》卷一六《蘇則傳》。

<sup>35</sup> 《三國志魏志》卷三《明帝紀》。

<sup>36</sup> 《三國志魏志》卷二六《郭淮傳》。

<sup>37</sup> 《晉書》卷一二六《秃髮禿檀載記》。

之中。<sup>38</sup>

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地區，包括洮河流域及白龍江上游，也是羌族集中之地。秦漢時所謂的“羌中”，就是指臨洮(今甘肅岷縣)以西之地。隴右的羌族很多，十六國時，建後秦政權的姚氏，即隴西南安赤亭(今甘肅隴西東)羌人；還有隴西的“赤水羌酋彌姐康薄”等<sup>39</sup>。此外，秦州羌族在前涼、後涼和西秦等政權的統治下，有的割據稱雄，時叛時服。如河州枹罕的羌酋彭奚念、彭利發，強川(今洮水中上游地區)羌酋彭利和，南強羌豪辛澹等。<sup>40</sup>建國於隴西的西秦政權內，也有很多羌酋作官爲吏，見於記載的有左衛將軍莫者矜羝、西安太守莫者幼眷、尙書郎中莫者阿胡，羌酋留何等。<sup>41</sup>在今白龍江上游(古稱“羌水”)，還有白水羌、黑水羌、紫羌等。<sup>42</sup>

雍州(指關中及渭北諸地)地區，自漢代以來也成了羌族聚居之地。除三輔外，安定、北地、上郡無不有羌。西晉時，江統《徙戎論》說，“從馮翊(治今陝西大荔)、北地、新平(十六國時治今陝西彬縣)、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均在河湟)、析支之地”。可見，以上關中四郡羌族最多。到十六國前趙統治關中時，劉曜又先後徙上郡氐、羌二十萬口、秦州大姓薑(羌族)、楊(氐族)二千余戶于長安。<sup>43</sup>後趙石虎又曾將南安羌酋姚氏及秦隴羌族遷入關東，姚氏駐於清河(今山東臨清)，以後姚氏又率部返回關中。<sup>44</sup>前秦時，關中的羌族多集中在關中渭河以北至洛水中下游一帶。這從現存前秦時的《鄧太尉祠碑》及《廣武將軍□產碑》所記渭北各族中，羌族姓氏占了絕大多數可證。<sup>45</sup>

十六國時，羌族姚氏所建後秦政權(又稱“東秦”)，都長安。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年)爲東晉劉裕北伐所滅，共存34年。

<sup>38</sup> 參見周偉洲、黃顥《白蘭考》，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2期。

<sup>39</sup> 《晉書》卷一二五《乞伏幹歸載記》。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同上。按，莫者，又譯作莫折，秦州羌族大姓之一。

<sup>42</sup> 《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陰平郡。

<sup>43</sup> 《晉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

<sup>44</sup> 《晉書》卷一一六《姚弋仲載記》。

<sup>45</sup> 參見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1985年中華書局版。

以上從東漢末至東晉十六國時，關中的羌族與關中氐族一樣，漢化最深。這不僅因為關中漢族眾多，與羌雜處，交往頻繁，更因羌姚氏率部曾輾轉於關東、關中等地，後滅前秦，建後秦政權，採取與前秦相似的漢魏以來的漢族政權的政治制度及經濟文化政策，崇信佛教，漢化已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後秦弘始九年（407年），姚興遣使北魏，獻良馬千匹，以贖柴壁之戰被俘之狄伯友、唐小方等，並同意放還前求婚之北魏大臣鮮卑人賀狄幹。北魏許之。賀狄幹在後秦長安幽禁期間，“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及返平城後，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應為‘漢俗’）”<sup>46</sup>，故怒而殺之。<sup>47</sup>這說明羌族姚氏漢化之深，也是因戰爭而漢化的一典型事例。

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的羌族主要集中在今四川西北，從秦州南的白龍江上游、甘松嶺起，往西南至岷江中上游的松潘、茂縣，西南至今雲南北部，都是羌夷雜居之地。其中魏晉時最活躍的是汶山郡（治今四川汶川）的諸羌及屠各、盧水、白馬等雜胡。汶山郡內的興樂、廣柔、平康、汶江等縣，有所謂“劉紫利羌”、“蜂峒羌”等<sup>48</sup>。西晉初，汶山郡的羌族有的甚至移居成都平原附近的都安（今四川灌縣）天枳山一帶。<sup>49</sup>

西元5世紀40年代後，西部的涼、秦、雍、益四州的羌族，大部分為北朝諸政權所統治。他們或與漢族雜處，漢化加深，或為他族所統治，仍居於原地。其中在北朝後期，關中及渭北的蒲城、白水、宜君、銅川、宜川、耀縣等地仍為羌族集中分佈地。他們與漢族雜居，形成漢村與羌村犬牙交錯的局面。而後，漢、羌兩族逐漸產生同村雜居的情況。在唐代以前，渭北羌族基本上仍保持著同族異姓的內婚制；唐以後，關中羌族與漢族通婚則成為數見不鮮的習俗，而其姓氏也由夫蒙、同蹄、鉗耳等姓改變為漢式單姓。中唐以後，渭北羌民漢化日深，最後與漢人融為一體，彼此無所區別。到宋、明時，關中雖仍有党、雷、井、屈、和、同、蒙等羌姓，但他們都是漢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習俗等方面已經看不到有絲毫

<sup>46</sup> 按，因姚氏已逐漸漢化，故此所謂“羌俗”，應是“漢俗”，《通鑑》卷一一四晉義熙三年（407）條作“秦人”，更為確切。

<sup>47</sup> 見《魏書》卷二八《賀狄幹傳》。

<sup>48</sup>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汶山郡條。

<sup>49</sup> 同上。



羌族的因素了。<sup>50</sup>

北朝時，在今四川西北白龍江和白水流域的羌族，還形成了兩個稱王的羌族小政權，即宕昌和鄧至。據史載，“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有梁勤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帶水（一作“席水”，在今甘肅天水南）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sup>51</sup>則宕昌羌分佈在今甘肅天水南，白龍江上游，中心即在今甘肅宕昌附近。宕昌羌興起於北魏時，與所鄰的北魏、吐穀渾關係密切，不時向北魏稱臣朝貢，又爲吐穀渾所控制。直到北周保定四年至五年（564年至565年），北周大將田弘擊滅宕昌，以其地置宕州。<sup>52</sup>此後宕昌羌人一部分融入吐穀渾，絕大部分成爲後來興起的黨項羌的組成部分。<sup>53</sup>

鄧至羌在宕昌羌南，原爲前述之白水羌。史稱其“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sup>54</sup>則鄧至羌分佈在今白水江一帶，中心在鄧至城（今四川九寨溝）。鄧至在南北朝時與宕昌一樣一度役屬於吐穀渾，西魏廢帝元年（552年），西魏軍逐吐穀渾出鄧至，於此地置鄧州。<sup>55</sup>

以上雍、秦及涼三州部分與漢族雜處之羌族，因長期與漢人相處，交往甚密，故到南北朝之後逐漸融入到漢族之中，尤以關隴的羌人漢化最爲徹底。而今四川西北及青海、甘南一帶的羌族，如上所述，有部分爲四世紀遷入並統治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的鮮卑吐穀渾政權所統治，隋唐後有部分融入吐穀渾族之中。到七世紀西藏高原的吐蕃興起，于唐龍朔三年（663年）北上，滅吐穀渾；唐安史之亂後，又統治河隴及今新疆南部，於是青海、甘南等地的羌（包括吐穀渾）族又融入吐蕃，形成爲今日的安多藏族。而汶山郡的羌族綿延至今，形成爲今日四川茂縣、汶川、川北等地的近現代的羌族。（本文係特邀稿件，無需審查）

<sup>50</sup> 見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1985年中華書局版。

<sup>51</sup> 《周書》卷四九《宕昌羌傳》。

<sup>52</sup> 《周書》卷二七《田弘傳》。

<sup>53</sup> 參見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6頁。

<sup>54</sup> 《周書》卷四九《鄧至羌傳》。

<sup>55</sup> 《隋書》卷二九《地理志》同昌郡條；《太平寰宇記》卷一三四《文州》。

## 近年藏情與達賴言行

孟鴻

前文化大學教授

### 摘要

十四世達賴喇嘛自流亡印度後，一直成為歐美日各國作為抵制中共的工具，而達賴喇嘛更運用此一客觀條件，遊走各國，名為弘揚喇嘛教，實為宣達藏獨，備受爭議的諾貝爾和平獎，錦上添花頒給達賴喇嘛，從此更成為世界各國媒體寵兒與鎂光燈焦點，對於大陸西藏情勢與達賴言行，莫不詳加報導，茲就近兩年來此間媒體所披載有關藏情與達賴言行加以評析。

**關鍵字：**西藏、達賴喇嘛、藏獨

### 一、藏情背景資料

首先簡述「達賴」名號由來，按喇嘛教受到元帝室崇信後，日益倡盛，在藏地（當時尚無西藏一詞，仍稱吐蕃，茲為行文前後一貫用西藏或藏地）享有許多世俗權力，如所周知，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享有極大世俗權力的喇嘛教眾喇嘛漸趨腐化，元朝後期，西藏喇嘛教一些教派權勢大增，薩迦派、噶舉派上層喇嘛直接參與掌握政治、經濟權力活動，追求世俗享樂，熱衷權勢利祿鬥爭，到明朝初期藏地喇嘛教情況依然如此<sup>1</sup>，在內地喇嘛教的情況則更為不堪，據相關文獻所載元大都（今北京）之情況為：

「都下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時時延帝師堂下戒師，於帳中受戒，誦咒作法。凡受戒時，其夫自外歸，則至房

<sup>1</sup> 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442。

不入，妃主之寡者，間數日則親自赴堂受戒，恣其淫佚，名曰大布施，又曰身布施。其流風之行，中原河北，僧（按係指喇嘛）皆有妻，公然居佛殿兩廡，赴齋稱師娘……」<sup>2</sup>

另據克珠杰在其所著《宗喀巴傳》一書中指出：

「當時紅帽僧（即指格魯派以外各教派喇嘛，原文為僧人，此處筆者特將之寫作喇嘛，以其作為實不似僧人，而當時係指明初）的大多數喇嘛（原文為僧人）不論什麼時候都喝酒，不論什麼時候都進食（而戒酒和過午不食是藏傳佛教的基本戒律），到處玩耍，沉湎歌舞。那些只修某一密法的喇嘛則稱戒律乃為小乘僧人而設，自己無需管什麼戒律不戒律的，他們公開娶妻生子，酗酒、貪婪成性，淫蕩恣肆。」<sup>3</sup>

從上述資料可見元末明初喇嘛教腐化情形，十四世紀中葉，有洛桑扎巴者於西元 1357 年生於多麥下部地區宗喀地方（其地為今青海塔爾寺附近）的瑪氏家族，其後為喇嘛，於 1372 年入藏習經，1381 年受比丘戒，1390 年開始傳教，由於其眼見當時藏地喇嘛教戒律的廢弛與喇嘛的腐化墮落，乃起而倡言宗教改革，講究戒定慧，獨創一派是為格魯派，由於洛桑扎巴是宗喀地方人，所以又稱之為宗喀巴，宗喀巴所創之格魯派雖大力提倡嚴守戒律，但是宗喀巴在其所著《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又倡「男女雙身法」<sup>4</sup>，而密宗「它含有色情成分和令人恐懼的神仙，這也就是構成西佛教的主要因素。」<sup>5</sup>，因此稱之為佛教實不相宜。宗喀巴辭世之後，其弟子根敦珠巴開始模仿噶舉派以轉世方式傳世，根敦珠巴辭世，由根敦嘉措為其轉世，根敦嘉措再轉世為索南嘉措，此人即宗喀巴之三傳弟子，此人點慧無比，深知當時藏地政教大權握在噶舉派手中，必須找到有力的「護法」，始能從噶舉派手中奪到權力，此際所謂「自性空」的佛理，早

<sup>2</sup>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84，按葉子奇係元末明初時人，其所述當係實情。

<sup>3</sup> 見宗喀巴高足克珠杰所著《宗喀巴傳略》，但此處係轉引自克珠群佩主編之《西藏佛教史》頁 442。

<sup>4</sup> 見白志偉等七人所編著之《達賴真面目》台北正智出版公司，2011 年，頁 135。

<sup>5</sup> 見德、克林凱特著，趙崇民譯，賈應逸審校《絲綢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 年，頁 157。

已拋諸九霄雲外，當時漠南土默特蒙古阿勒坦汗之武力與聲望如日中天，索南嘉措與之交，極受阿勒坦汗敬服，賜以「達賴喇嘛」名號，「達賴」，係蒙古語，意為「海洋」，「喇嘛」係藏語，意為上師，合言之可衍伸為智廣如海之上師，索南嘉措不敢獨享此一尊號，乃向上進尊根敦珠巴為一世達賴喇嘛，根頓嘉措為二世，而索南嘉措為三世達賴喇嘛，從此代代相傳以至於今。索南嘉措為確實能把蒙古阿勒坦汗力量作為喇嘛教格魯派的靠山，更指定阿勒坦汗的曾孫為其轉世靈童（蒙語稱呼畢勒罕），如此一來，等於將土默特蒙古的武力，與喇嘛教格魯派綑綁在一起，迫使土默特蒙古的武力不得不作格魯派的後盾，看來活佛轉世這一招是很好用的。

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也就是阿勒坦汗的曾孫，於十四歲入藏，當格魯派在藏地稍為站住陣腳時，四世達賴喇嘛適時在二十八歲的盛年在哲寺甘丹頗章宮內暴亡，當時（西元 1616 年）曰喀則扎什倫布寺第十六任堪布洛桑曲吉堅贊（即四世班禪、十四歲時被擁立為安貢寺赤巴活佛，此為班禪世系正式以轉世辦法之始）十分悲慟，立即前往拉薩，主持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的超度活動，其時握有藏地政治實權之藏巴汗下令禁止四世達賴轉世，四世班禪為此深感憂慮，巧的是幾年後藏巴汗身染重病，多方療治均不見效，後經深通醫理的四世班禪精心治療，終於藥到病除，藏巴汗甚為感激，要以一座莊園賞賜，但四世班禪拒絕了這分厚賜，只請求讓四世達賴喇嘛准予轉世，藏巴汗只得應允<sup>6</sup>，可見達賴喇嘛一系之得以延續傳承，實出於洛桑曲吉堅贊憑其精湛醫治藏巴汗的重病，並捨棄一座莊園的厚賞，只懇求准許達賴喇嘛一系得以轉世，可見達賴一系得以沿續，實出於四世班禪一念之仁，如果照喇嘛教的說法，轉世活佛是「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職位」<sup>7</sup>，則之後的歷世達賴喇嘛，應對歷輩班禪心懷感激才是，然而不然，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九世班禪極不友善，九世班禪如不及時逃到內地，可能連命都保不住，達賴之於班禪，可說是恩將仇報。再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年藏巴汗如果堅不准四世達賴轉世，今天也就沒有什麼達賴喇嘛了，可見其轉世與否，不是達賴說了

<sup>6</sup> 見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頁 459。

<sup>7</sup> 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1961 年，頁 34。

算。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之死，或說是辛夏巴·平措朗杰派人刺殺，此因辛夏巴·平措朗杰得了重病，懷疑是雲丹嘉措對他進行詛咒所致，于是派人刺殺雲丹嘉措，不管此一傳說是否屬實，辛夏巴家族仇視與打擊魯派則為事實<sup>8</sup>。按辛夏巴家族為藏地蒙族，於 1565 年辛夏巴家族推翻仁蚌巴家族後，勢力益形壯大，1605 年辛夏巴·次旦多吉聯合直貢噶舉派打敗在經濟上支持格魯派的第巴吉雪巴控制了拉薩地區，其孫辛夏巴·平措朗杰又攻破山南上部最大家族第巴雅覺巴及澎波的乃烏宗，至此辛夏巴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西藏地區，噶瑪噶舉黑帽系第十世活佛曲英多吉與辛夏巴家族關係密切，承認辛夏巴·平措朗杰「王」的地位，並頒給平措朗杰一顆印，辛夏巴家族與噶舉派紅帽、黑帽系及直貢噶舉聯合壓制格魯派，所以才有以上的傳說。

藏巴汗既允准四世達賴喇嘛轉世，經過尋尋覓覓於 1622 年在四世班禪洛桑曲吉堅贊主持下，把六歲的阿旺洛桑嘉措認為是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迎入哲蚌寺坐床，是為五世達賴喇嘛，此人點慧過人而又雄心萬丈，當時藏地仍然在藏巴汗與噶舉派控制之下，為要奪得政治上的控制權，又想玩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利用蒙古武力為後盾的把戲，只是土默特蒙古已經風光不再，此時在青海的和碩特部固始汗的力量正是如日正當中<sup>9</sup>，於是引和碩特固始汗力量入藏，推翻藏巴汗政權，固始汗長川駐藏，五世達賴喇嘛雖在宗教上享有至高的地位，但政權則握在固始汗手中，固始設置第巴一職協助處理政教事務，五世達賴喇嘛尚無法兼握政教兩權，自是意猶未足，總想同時掌握政教兩權，此時所謂「空」對五世達賴喇嘛而言，只是佛經上的字而已。不久固始汗死，和碩特內部對汗位的繼承有所爭執，經過三年始由固始汗長子達延鄂齊爾嗣立為和碩特汗。在這期間五世達賴喇嘛剽竊若干藏地的政權，直到後藏日喀則第巴諾爾布興兵作亂，達延鄂齊爾才率兵入藏平亂，亂平之後，達延鄂齊爾汗雖身在藏地，除了軍事，對政務毫不關心，這對五世達賴而言，正中下懷，可以上下其

<sup>8</sup> 見《西藏佛教史》頁 462。

<sup>9</sup> 和碩特部為蒙古衛拉特四部之一，和碩特係成吉思汗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裔，為蒙古本支，另三部為：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均為蒙古別支，其後土爾扈特西徙裏海北岸伏爾迦河下游駐牧，輝特遞之，衛拉特仍為四部。

手竊取政權，西元 1658 年（清順治愛新覺羅・福臨十五年）第一任第巴索南饒丹去世（此任第巴系固始汗所任命），五世達賴向達延鄂齊爾徵詢新任第巴人選意見時，達延鄂齊爾對如此重要職位人選，竟然沒有意見，任由五世達賴喇嘛自挑人選，於是年六月任命赤烈嘉措為第二任第巴，由於此人是五世達賴所提，所以處處唯五世達賴馬首是瞻，而達延鄂齊爾居然莫不作聲，從此大權逐漸旁落，1668 年（清康熙玄燁七年）達延鄂齊爾去世，青海和碩特內部意見不合，遲遲未能推出新汗，此時五世達賴喇嘛竟然迫不及待不經和碩特汗同意逕自任命第三任第巴，此人名羅桑圖道，是五世達賴的親信，直到 1671 年（清康熙十年），青海和碩特才推出達延鄂齊爾長子貫綽克喇達繼承汗位並且入藏，五世達賴喇嘛給他上了個「丹津達賴扎勒布」的尊號，簡稱達賴汗，此汗與其父一樣毫不關心政務，對於達賴喇嘛控制第巴、竊取政權並未提出異議，五世達賴喇嘛對政權的醉心，已由蠶食而鯨吞。之後更任命其弟子桑結嘉措為第巴，從此掌握了藏地政教兩權<sup>10</sup>。

桑結嘉措是五世達賴喇嘛的弟子，極得五世達賴喇嘛信任，把藏地的政務幾乎都交給桑結嘉措處理，師徒二人看法幾乎一模一樣，五世達賴喇嘛曾發布如下一個告示：

「他（指桑結嘉措）的任行為都與達賴喇嘛本人的行為沒有區別。」<sup>11</sup>

兩個人可說是一而二、二而一，都具有很高的政治嗅覺，察覺大清帝國終將統一全中國，如何不讓清朝進入青藏地區，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清朝的武力引向北方，如何引到北方？就是慫恿準噶爾蒙古東掠漠北蒙古，漠北一旦有警，漠南各部蒙古必然騷動，漠南與北京近在咫尺，因此只要準噶爾東侵漠北喀爾喀三汗，清廷必然要出兵救援，恰巧準噶爾酋長噶爾丹早年曾在拉薩出家當喇嘛，而且在奪取準噶爾部酋長過程中，五世達賴喇

<sup>10</sup> 關於五世達賴喇嘛與和碩特部蒙古及任命第巴經過詳情，見班布日、李兒只斤・蘇和所著《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67~73。

<sup>11</sup> 見夏格巴・旺曲德典《藏區政治史》或作《西藏政治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漢譯本，頁 271，原未註明何人所譯，惟據喜饒尼瑪所撰《熱振事件與帝國主義的陰謀》一文，頁 238，指出《西藏政治史》係李有義所譯，喜饒尼瑪《熱振……》一文輯入《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年出版。

嘛曾派濟隆呼圖克圖等高階喇嘛爲之出謀劃策，並給了噶爾丹一個「博碩克圖汗」名號，一切都在五世達賴喇嘛與第巴桑結嘉措規劃中，噶爾丹果然甘爲五世達賴馬前卒，揮軍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sup>12</sup>，而康熙也一如五世達賴所料，率軍北上親征噶爾丹，雖然獲勝，噶爾丹也因數度被剿，部眾盡死，臨終前曾歎稱：

「我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為五世達賴喇嘛煽惑而來。由今觀之，是達賴喇嘛陷我，我又陷眾人矣。」<sup>13</sup>

而清朝也因討伐準噶爾損兵折將死傷頗重，就五世達賴喇嘛看來這只不過是死道友不死貧道，而且確實延緩了清廷對青藏地區的經營，五世達賴喇嘛在這一場博弈中可以說是一個大贏家，較諸一般政客更精於算計，他更是一個戰略家，只是與我佛慈悲普度眾生的理想背道而馳罷了，或許在阿旺洛桑嘉措的心靈深處並沒有佛陀的影子，有的是無盡的權力欲。

## 二、十三世達賴喇嘛從親俄到親英

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第巴桑結嘉措曾隱匿其死訊，對外只宣稱達賴閉關修行，任何人不得打擾，一切事物只能由桑結嘉措稟報和傳達，這一封鎖，就是整整十三年。青海和碩特的達賴汗原本就不關心藏地政務，加上年事已高，任由第巴桑結嘉措恣意妄爲，不過五世達賴喇嘛生前曾頒布過一個告示指稱：桑結嘉措的任何行爲，都與達賴喇嘛本人的行爲沒有區別，所以桑結嘉措之所爲，也等同五世達賴喇嘛之所爲。1701 年（清康熙四十年）和碩特達賴汗死，初由其長子丹津旺秋嗣立，但三年後，其弟拉藏魯巴勒（或作拉藏魯白）發動政變，毒殺丹津旺秋，自立爲和碩特汗，此即有名的拉藏汗，他入藏後就要收回被五世達賴喇嘛所竊去的政治權力，而此際五世達賴喇嘛已去世的消息已爲外界所知，桑結嘉措立即找

<sup>12</sup> 有關五世達賴喇嘛鼓動準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詳情，請參見劉學鈞《額魯特蒙古與達賴喇嘛》，一文，該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158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2004 年 6 月，之後於 2011 年輯入劉氏《少數民族史新論—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台北南天書局，列頁 113~150，2014 年 7 月南天書局再度改版發行該文列頁 83~108。

<sup>13</sup> 見溫達等所著《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 25，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但此處係轉引自日人若松寬著、馬大正等編譯《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87。

來倉央嘉措爲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於是桑結嘉措與拉藏汗之間形成權力鬥爭的局面，其過程頗爲複雜，桑結嘉措竟以重金收買拉藏汗王府中人，在食物中下毒，事爲拉藏汗所發覺，衝突表面化，進入戰爭狀態，最後拉藏汗殺了桑結嘉措<sup>14</sup>，並且廢黜桑結嘉措所立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清廷也與拉藏汗合作，於 1706 年（清康熙四十六年）派統領席柱、學士舒蘭入藏，敕封拉藏汗爲「翊法恭順汗」，賜金印，冀其能穩定西藏局勢。

拉藏汗要廢黜倉央嘉措，希望能取得各大寺院首領支持，因而召集會議，但是會議並不成功，不過五世班禪支持拉藏汗，1706 年清廷詔令執「假達賴喇赴京（指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拉藏汗以武力押解倉央嘉措赴北京，一說走到青海湖邊貢噶洛地方時病故；一說倉央嘉措被送往內地後，清廷將之軟禁在五台山；更有一說倉央嘉措行抵青海貢噶洛後，趁風雪之夜遁去，先往青海，復回西藏，最後至內蒙阿拉善和碩特旗台吉班自爾扎布家，就在當地弘法<sup>15</sup>。究竟以何說爲是，迄今仍無定論。拉藏汗於 1707 年立益希嘉措爲第六世達賴喇嘛，1710 年清廷冊封益希嘉措爲六世達賴喇嘛並給以印冊。之後各世達賴喇嘛類多其壽不永，其中甚至有未滿二十歲就辭世。十二世達賴喇嘛於 1875 年（清光緒載湉元年）圓寂，經藏地依傳統方式尋找出土登嘉措最具靈異，認定是十二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報呈清廷請准免於金瓶掣籤，清光緒三年（1877 年）三月，清廷在此項奏折後批示：

「工噶仁青之子羅布藏塔布克甲木錯（按即土登嘉措）即作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按即轉世靈童），毋庸掣瓶（即金瓶掣籤）。」<sup>16</sup>

這個土登嘉措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1879 年（光緒五年）五月，光緒帝頒下聖旨准許土登嘉措坐床「聖旨」全文曰：

「達賴喇嘛轉世已經確定，今年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時舉行

<sup>14</sup> 詳細過程參見《西藏佛教史》，頁 478~479。

<sup>15</sup> 《《西藏佛教史》頁 479。

<sup>16</sup> 《光緒實錄》，卷五二，頁 2。



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現賜達賴喇嘛黃哈達一條，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鈴杵一套，達賴喇嘛坐床之後，可啟用前世達賴之金印，並將用印時日上奏。前請乘用黃轎及黃色鞍轡均予准用。佛父貢噶仁欽封為公爵，賞戴寶石頂子，著孔雀翎，依旨遵行，欽此。」<sup>17</sup>

十三世達賴喇嘛坐床時年僅三歲（渠生於 1876 年），生活起居均需專人照顧，於是任用俄羅斯境內布里雅特蒙古喇嘛德爾智為侍讀，在名稱雖頗典雅好聽，實際就是年幼的土登嘉措的保姆，照顧十三世達賴喇嘛生活起居，工作雖然瑣碎，但卻得以朝夕都在土登嘉措身邊，因此有必要將德爾智其人酌加介紹。德爾智生於 1853 年，全名為洛桑、阿旺、德爾智，俄名為多爾日耶夫，藏名叫郭芒洛桑阿旺，還有許多化名如：陶什夫、倉倪什夫、鐸爾智、德支埃、阿完·特爾及甫等，在西藏一般文獻不記其名，而用其喇嘛官銜，稱他村曉、村曉堪欽、古嘉村曉堪欽、村曉格西等，也有銜名並用者，如古嘉村曉堪欽洛桑阿旺<sup>18</sup>。係俄羅斯境內布里雅特蒙古族，自幼入阿佐科茲基寺為喇嘛，他接受沙俄政府發給的「使者證書」，於 1873 年到西藏拉薩<sup>19</sup>，充當沙俄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秘密交往的使者，此人相當聰明（能充當間諜沒有不聰明的），得到拉讓巴格西學位<sup>20</sup>，入藏時攜帶大量金錢，向藏地僧俗官員行賄，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是人，而謀得十三世達賴喇嘛十個侍讀之一，由是在西藏社會具有相當地位，在佛教的預言中，指佛教未來將被他教所欺凌，面臨滅絕危機，那時北方將有一人為佛菩薩化身，出而拯救佛教而入於北方理想之地，這個地方就叫「強祥巴拉」，祥巴拉，一般稱之為香格里拉，或者可以意譯為「世外桃源」，這原本只是佛教的一項預言，但德爾智既身負

<sup>17</sup> 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95。此處係轉引自陳慶英等編著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541。

<sup>18</sup> 王遠大《近代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年，頁 155~156。

<sup>19</sup> 爾德智究竟何時入藏，有不同說法，此處採註 18 所引書說法。

<sup>20</sup> 「格西」係「格西喜聯」之簡稱，係藏語，其意為「善知識」，為喇嘛教經院學位名稱，分四等，依序為拉讓巴格西、曹然巴格西、林瑟格西及日讓巴格西。」

「重任」，便捏造所謂「強祥巴拉」就是俄羅斯，而俄國沙皇就是強祥巴拉的君主<sup>21</sup>，因此「對俄國沙皇不能敵對，只能尊崇」<sup>22</sup>，德爾智對年幼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夜以繼日的灌輸其親俄思想，同時也反復強調清廷日就衰弱已不可恃，而英國謀藏日亟，必須起而反對，這種親俄、離中、反英的思想逐漸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心中生了根，幾乎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潛意識，而德爾智居然成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政治智囊，不僅如此，西藏地方政府為爭取俄國援助，竟於 1898 年（清緒二十四年）派德爾智為代表前往俄都彼得堡向俄國政府進行試探，此人原是俄國派在西藏的「秘使」，而今搖身一變居然成為西藏向沙俄政府試探的代表，而且還獲得俄國沙皇接見，不僅一次，1900 年德爾智再次代表西藏率團赴俄，這種「角色扮演」的把戲一再出現，充分顯示清廷所派駐藏大臣的無能。中國歷朝歷代邊疆地區發生問題，絕大部分是因邊臣疆吏無能瞞頂貪瀆苛虐所造成。

二十世紀初，英國仍是世界最大最強的帝國主義者，殖民地遍布全球各地，有「日不沒落國」之稱，當時與俄國競逐中亞，英俄雙方都意識到西藏居世界屋頂具高屋建瓴的地緣優勢，控制西藏有利於掌握中亞，因此都分別「經營」西藏。俄國由於境內有布里雅特蒙古族，這些蒙古人都信奉喇嘛教格魯派，且在種族上與藏人同屬蒙古利亞種（俗稱之為黃種人），有此兩大有利條件，所以在德爾智操作之下，十三世達賴喇嘛乃至西藏地方政府倒向俄國，英帝國屢次想直接與西藏地方政府打交道，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眼見俄國先鞭一著取得優勢，心有未甘，於是就以最原始也是最野蠻的方式要以武力打開西藏的大門，1903 年冬以榮赫鵬（Yonghusband F.E.）為首組成所謂「西藏使團」，另以麥克唐納（Macdonal G）率領軍隊在旁保護「使團」之安全，此種以武力為實，以談判為幌子，節節進逼，此一侵略部隊一路前進至位於亞東北部曲來雄古山巔繼續向東推進，沿途受到藏軍激烈抵抗，至次年（1904 年光緒三十年）八月三日終於攻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於英軍攻入拉薩前夕，率部

<sup>21</sup> 見周偉洲《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年，轉引科切托夫《喇嘛教》一書，頁 169。

<sup>22</sup> 日本間諜喇嘛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卷十，東京出版，1904，頁 173~174，此書曾譯為中文。

分親信向內地逃亡，經青海、甘肅逃往外蒙古，德爾智也在逃亡隊伍之內，其最終目的是要進入俄國，十三世達賴喇嘛一行於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七日到外蒙古之三丹加德林寺，九月三十日抵甘丹德林寺，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得知達賴抵蒙消息，特派卓尼、則桑、喀拉切等四人前往迎接向之獻哈達，更迎至外蒙首府大庫倫，受到清廷所派駐庫倫辦事大臣，外蒙僧俗之盛大歡迎，原擬進入俄國，只是當年日俄戰爭，俄國大敗，不敢接待十三世達賴喇嘛入俄，達賴原可在庫倫停留等待中英有關藏事談判完成後再回拉薩，但十三世達賴喇嘛人格特質異乎常人，作客庫倫，卻與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能和睦相處<sup>23</sup>，無法續留庫倫，此際中英仍在談判，英國堅拒此時讓十三世達賴喇嘛返藏，而渠又不願返回內地，因此只好游走三音諾顏部（注意此部不稱汗）各旗，名為弘揚喇嘛教法，實為吸收蒙人供養，此時清廷始察覺如任令十三世達賴喇嘛逗留外蒙，一旦入俄，情勢將更難收拾，於是命御前大臣博迪蘇及內閣學士達壽二人，以赴外蒙考察喀爾喀游牧事宜為名，前往外蒙，實則為勸阻達賴喇嘛不得赴俄，並立即離蒙反回內地，博迪蘇一行輔以馬隊三十人，由李廷玉帶領，行前似奉有「密諭」，其內容為「達賴果不歸藏，即便宜行事」<sup>24</sup>，至此十三世達賴喇嘛不得不返回內地，拉薩一時無法回去，清廷命其暫駐青海塔爾寺，但不久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能，清廷為息事寧人反將阿嘉活佛調到北京「當差」，自此十三世達賴喇嘛鳩占鵲巢獨占塔爾寺，未幾靜極思動奏請朝廷要到五台山禮佛，清廷仍曲予同意，並命沿途各地官員應盡心接待，及至赴五台山消息外露後，各國駐華人員不辭辛勞（當年登五台山極為艱辛），紛赴五台山，盼與達賴喇嘛會晤，自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發現己身是一「奇貨」，既是奇貨，就應將其邊際效用極大化，遂派人到北京向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rdon. J）探詢中英有關藏事談判情況，朱爾典告以：「英政府對於達賴回藏問題之見解如

<sup>23</sup> 有關十三世達賴喇嘛與哲佛不睦及其後游走三音諾顏部各旗歛收供養等詳情，請參見劉學鈺《英軍侵藏與十三世達賴喇嘛入蒙》一文，該文輯入中國文化大學蒙藏學術研究中心，中國邊政協會主編之《二十世紀之蒙藏問題》一書，台北南天書局，2002年，頁139~170。

<sup>24</sup> 見李廷玉《游蒙日記》，此書手抄本，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日本東京景印出版，1990年北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正文中雖未提到有此「密諭」但在自序中明白指出確有此一密諭。

何，渠尙不得而知，惟達賴出走期間，藏印關係確有進展。」<sup>25</sup>之後達賴喇嘛要求進京陛見，清廷也准其所請，於是在 1908 年晉京，英國政府爲游說達賴喇嘛，特別調來熟知中國情形之殖民老手莊思敦（R. F. Johnston），英印政府西藏事務官鄂克納（Oconor. C.）及精通藏語文之印度人達斯（Das S.C.）及當時哲孟雄王子等到北京，配合朱爾典對達賴喇嘛進行游說，可能以許其回藏爲餌，十三世達賴喇嘛態度由是作一百八十度轉變，自反英而全面倒向英國，會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十一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相繼崩殂，達賴喇嘛趁清廷忙於處理國喪之際，奏准返藏，臨行前一日（1908 年十一月二十日）派兩名親信赴英國駐華公使館，向朱爾典表示：「希望能與英國印度當局保持友好關係。並稱這是其北京之行的最重要的收穫之一。」<sup>26</sup>十三世達賴喇嘛及其所領導之西藏地方政府從此走向親英之路。

### 三、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坐床至逃亡

十三世達賴喇嘛返藏後，在心裡上已從反英轉而親英，而清廷渾然不覺，時清廷正在各地推行新政，駐藏辦事大臣趙爾豐（實際並未到任）又提出在西康推行改土歸流，事實上以當時客觀環境而言，無論青、康、藏都沒有推行新政與改土歸流的條件，其受到抵制，乃是事所必然，據傳十三世達賴喇嘛指使川邊康巴人（指在西康之藏人）反抗趙爾豐之改土歸流，川滇邊務大臣以武力收平康巴之亂，並爲鞏固藏地邊圉，經奏准調川軍入藏以爲鎮攝，這批川軍於宣統二（1910）年二月入藏，在藏地胡作非爲，十三世達賴喇嘛於是逃往印度，這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第二次出走，關於川軍入藏及在拉薩之作爲，夏格巴在其所著書有如下之描述：

正月初三日（按 1910 年二月），川軍先頭騎兵到達拉薩，駐拉薩滿洲安班的勇營（滿洲安班，係指駐藏大臣；勇營則指兵營，蓋清代稱兵爲勇）衛隊前往拉薩河拉東渡口迎接中國軍隊，晚茶時，騎兵和步兵排成隊，從花園、鐵崩崗、關帝廟、

<sup>25</sup> 榮赫鵬著、孫煦初譯《英國侵略西藏史》，台北學生書店，1973 年，頁 306。

<sup>26</sup> 《英國議會關於西藏文書》頁 171~172，但此處係轉引自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

霍爾康新樓……安班的衛隊向各崗哨的警察開槍，打死打傷一些警察，到達（大願法會）講經場時，多次向大昭寺射擊，到達魯布時，大願法會基巧台吉（均為藏地官名）彭康巴·札西多吉和孜准絳央堅讚從布達拉宮奉命出來前往大昭寺參加會議，雙方相遇，安班衛隊舉槍射擊，台吉彭康因有護身符未受傷，孜准絳央和彭康的一名僕役和彭康的坐騎被打死，台吉被毆打後拉入衙門，又向達賴喇嘛居住的布達拉宮齊射（指全體軍人同時開槍射擊）<sup>27</sup>

以往漢文資料或各家論著，往往只提到入藏川軍軍紀不良，鮮少說出詳細情況，格巴此段抽述有具體的人名、地名當屬可信，中國軍隊軍紀不佳，可說是其來有自，因此秋毫無犯，常被歌頌。面對川軍之惡行，十三世達賴喇嘛選擇出走，就在當天黃昏時，召喚甘丹寺現任法台策麥林呼圖克圖阿旺洛桑丹白堅讚前來，交待任務並任命為攝政，另以大堪布柳霞·欽饒彭措為其助手，當天深夜十三世達賴喇嘛決定二次出走，在司倫謝扎、雪康、羌欽、近侍基巧堪布鄂細瓦、噶倫薩炯瓦、代理噶倫桑珠頗章、代理噶倫貢塘·丹增旺波及三十名警衛陪同下，經熱瑪崗渡口出奔，清廷駐藏官員次日（初四）早上得悉達賴喇嘛業已山走，立即派三百名精騎追趕，但已無法追及，達賴喇嘛一行則經則里拉山口，到達印度的噶倫堡，不丹的噶基烏多吉待之如貴賓，以自己的公館作為達賴喇嘛的住所，後來此一房子被稱為「果直雪」，一周後，達賴喇嘛一行前往大吉嶺一個稱為巴達堡的地方，錫金總督查爾斯·貝爾（Charles Bell）代表印度政府予以接待。幾周之後，達賴喇嘛一行乘坐專車（火車）及恒河上的輪船前往加爾各答，到達加爾各答火車站時，英國政府鳴放禮炮，在歡迎儀仗隊的引導和警衛護衛下，乘坐四匹馬拉的馬車，應邀作為印度政府貴賓，住進印度總督赫斯汀大廈（Hasting House）<sup>28</sup>。英、印政府簡直把十三世達賴喇嘛視同一個國家的元首，以接待元首之禮儀接待之，完全無視於西藏乃中國領土的事實，而當時竟未見清廷駐外單位或外交部門向英國提出

<sup>27</sup>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101。

<sup>28</sup>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103。

抗議，可見清廷缺少外交人才。之後民國肇建，英國立即蠱惑十三世達賴喇嘛趕返西藏，效顰外蒙而宣告西藏獨立，更於民國二年（1913 年）與外蒙在簽定不倫不類的所謂《蒙藏條約》，十三世達賴喇嘛背叛民國，全面倒向英國及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三世達賴喇嘛終於告別擾攘的大千世界，化入涅槃，經三大寺四大林推舉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依藏地格魯派傳統尋找轉世靈童，並電告南京國政府，幾經尋覓找到青海靈童拉木登珠為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以此一靈童靈異特具，經報呈蒙藏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准其免於金瓶掣籤，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 年）二月五日核定免於掣籤，特准繼任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其時攝政熱振呼圖克圖頗具國家民族意識，深知西藏不宜受外國蠱惑而脫離中國，因此與中央保持良好關係，罷黜地方政府中親英派官員，因而遭親英派分子之忌恨，在英印政府的操作下，竟將熱振呼圖克圖毒害而死<sup>29</sup>，西藏地方政府又為親英分子所把持，此時國共內戰方殷，無力處理西藏問題，而西藏地方政府竟以防共為名，發動驅逐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所有人員，以及在拉薩漢人教員、商人，此即所謂「驅漢事件」<sup>30</sup>，在英國操作下，又想趁國共內戰時搞西藏獨立。

未幾中華民國全面撤出大陸，中共宣佈建政，立即由北京與青海、西寧廣播電台宣布西藏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宣稱將派人民解放軍入藏，當時（1949 年 10 月）西藏拉薩廣播電台居然廣播說：

「中國和西藏僅僅是施主和福田的關係，西藏根本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西藏也沒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sup>31</sup>

拉薩電台這一分廣播，完全是趁國民政府退出大陸、中共雖已建政尚無力進兵西藏的混亂之際，妄想搞獨立，我們不禁要問清代所派駐藏大臣

<sup>29</sup> 關熱振事件請參見劉學鈞《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與熱振呼圖克圖》一書，蒙藏委員會，1994 年出版。

<sup>30</sup> 關於「驅漢事件」可參見羅家倫《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該文輯入羅著《交響樂的震盪》，頁 57~87，台北雲天出版社，1971 年，按羅氏撰該文時為 1950 年 9 月 22 日，距驅漢事件僅一年多，而羅氏時任駐印大使，曾接待駐藏辦事處處長陳錫章等被逐人員。

<sup>31</sup>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230。

作何解釋？而駐藏大臣衙門的諸多職權如涉外事件管理權、藏地行政管理權、在藏地駐兵…等<sup>32</sup>，又豈是施主和福田關係所能解釋的，廣播中聲稱西藏也沒有帝國主義的勢力，則英人黎吉生一手操導之驅漢事件又作何解釋，總之拉薩電台此一廣播純屬夢中囈語一派胡言。

由於時局的混亂，藏地決定讓十四世達賴喇嘛提前親政（依傳統慣例二十歲親政，1950年十四世達賴喇嘛才十五歲），於1950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布達拉宮舉行親政典禮。按中共建政後，據說曾派人到青海西寧附近喇嘛教塔爾寺，對時任該寺堪布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胞兄當采活佛土登諾布（當采或作當才，即諾爾布，據說此人早被美國情報單位收買）進行遊說，促其作為代表到拉薩勸說達賴喇嘛及噶廈與中共合作，但土登諾布到拉薩後反而宣稱中共迫害宗教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等<sup>33</sup>，由是西藏當局對中共產生疑慮，噶廈與西藏會議於藏曆十月二十四日（陽曆似為1950年十一月三日）透過仍滯留印度噶倫堡之夏格巴，促其速向聯合國投訴，期望聯合國能關注西藏問題，甚至歡迎聯合國派調查團前往西藏，當然一時之間沒有結論，由於土登諾布的危言聳聽，使西藏會議對中共充滿疑慮，為保障達賴喇嘛的安全，一致建議達賴喇嘛宜暫時前往亞東，於是在1950年十二月一日，達賴喇嘛一行離開拉薩前往亞東。之前希望聯合國關注西藏問題，由於印度不支持，結果不了了之，西藏當局對此自是感到遺憾，居然認為「英國和印度政府卻不支持正義，有意把六百萬藏人交給紅漢人的強權控制之下，這一惡果給印度及其鄰近的許多國家的自由、和平、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危險。」<sup>34</sup>在無外力支援下，只得回過頭來與中共談判，談判的目的仍然訴求西藏獨立，或至少中共軍隊不得入藏，而且希望在昌都談判，但中共認為以在北京談判為宜，最後在北京談判，在談判過程中，自然不免有所爭辯，但最後於1951年五月二十三日雙方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有十七條，一般簡稱為《十七條協議》，依據此項協議第二條規定：「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於是中共命張經武為中共中央

<sup>32</sup> 關駐藏大臣職權，可參見《大清會典、理藩則例》等相關文獻。

<sup>33</sup>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248。

<sup>34</sup> 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250。

駐藏代表，張經武一行於 1951 年六月二日、十三日分兩批進藏，達賴喇嘛與噶廈都派出代表出亞東十公里處迎接張經武一行，十六日上午（夏格巴書稱十七日）張經武會晤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七月二十日達賴喇嘛回到拉薩，十四世達賴喇嘛與中共之間並無任何不愉，依照《十七條協議》規定中共軍隊分批進入西藏，至是西藏各重要城鎮及邊防要地，都有中共軍隊駐守<sup>35</sup>。

至此原本應該相安無事，但後起的帝國主義者美國，本其獨霸的單邊主義，見中共軍隊入藏，深恐中共坐大，影響其領袖世界的霸權地位，以以其無孔不入且無惡不作臭名昭彰的中央情報局介入西藏事務，土登諾布早已與 CIA 有所接觸，至是更暗中吸收康巴，美國中情局以印度噶倫堡為基地，廣泛收集西藏情報，1951 年七月，把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美國中情局之贊助下，接到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之間秘密聯絡人<sup>36</sup>，1951 年之後，美國仍與西藏當局保持秘密接觸，由夏格巴、索康（按應為蘇康旺欽格勒，此人後來來台，為「噶倫辦事處」與宇托扎西頓珠二人為該辦事處負責人）都曾充當過美國駐印使館與西藏聯繫的中間人（同註 36），美國中情局還在流亡藏人中挑選身強力壯者，施以初步游擊戰訓練，為西藏未來埋下動亂種子。

當中共進軍昌都時，曾與康巴藏人發生戰鬥，康巴不敵，昌都因之「解放」，部分康巴戰士逃往拉薩，由於戰鬥失敗而又失去家園，對中共自是充滿仇恨，很快的就與西藏地方上層分裂勢力一拍即合，在噶倫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支持下，組成「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在台灣多稱之為「四水六嶺」）<sup>37</sup>，提出西藏獨立的主張，並且攻擊中共所設機關、部隊、搶掠財物、殘害人民、奸淫婦女<sup>38</sup>，中共駐藏單位一再責成西藏地方政府應負責懲辦這些搗亂分子，以維持社會治安，並未採取反制行動，但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以及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反而認為中共軟弱可

<sup>35</sup>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 年，頁 97~100。

<sup>36</sup>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世界知識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55。

<sup>37</sup> 所謂四水，指金沙江、瀾滄江、怒江、雅魯江、六崗（嶺）指擦瓦崗、芒康崗、麻則崗、木雅繞崗、色莫崗及澤貢崗，也就是青康藏地區的總稱。

<sup>38</sup> 《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頁 164。



欺，揚言：「九年來，漢人動也不敢動我們最美妙最神聖的制度；我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只要我們從外地調一大批武裝到拉薩，一打漢人準跑，如果不跑，我們仍就把達賴佛爺逼往山南，聚集力量，舉行反攻，奪回拉薩，最後不行，就跑印度。」<sup>39</sup>可見西藏一場暴亂終不可免」。

1959年二月七日，十四世達賴喇嘛主動向中共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提：「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安排一下。」於是預定三月十日下午三時在西藏軍區禮堂演出，達賴喇嘛將前去軍區看表演，但是沒想到三月九日晚上拉薩市的「墨本」（市長）卻煽動市民說：達賴喇嘛明天要去軍區赴宴，看戲，漢人準備了飛機，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他要每家都派人到達賴喇嘛駐地羅布林卡，請求達賴喇嘛不要去軍區看戲。把一件很單純的文康活動，扭曲成西藏軍區要把達賴喇嘛劫往北京，到了十日早晨，四水六崗的一批搗亂分子二千多人去羅布林卡，隨後那些分裂分子召開所謂「人民代表會議」、「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拉薩市區已是一片混亂。在三月十日至十六日之間達賴喇嘛與中共駐藏代理代表，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還保持著聯繫，達賴喇嘛曾前後三次親筆致信譚冠三<sup>40</sup>，信件由阿沛、阿旺晉美遞交，從達賴喇嘛的三封信中看不出有絲毫不滿意，且對三月十日不能前往軍區看表演，他說：「昨天我決定去軍區看戲，但由於少數壞人的煽動，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隨其後，進行阻攔，確實無法去訪，使我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如所措的境地……」這是三月十一日的信，再看看三月十六日給譚冠三的信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前天藏曆二月五日（公曆三月十四日）我向政府官員等的代表七十餘人講話，從各方面進行了教育，要大家認真考慮，目前和長遠的利害關係，安定下來，否則我的生命一定難保。這樣嚴厲指責之後，情況稍微好了一些，…」從這三封信可看出當時達賴喇嘛似乎並不贊同藏地高層一些分裂分子及四水六崗的西藏獨立主張，而且還要對搗亂分子進行教育，然而那些四水六崗分子已經失去家園，又在外力蠱惑之下，仍然堅持西藏獨立，期冀能從中共手中奪回家

<sup>39</sup> 同註 38 所引書頁 165。

<sup>40</sup> 此三封信譯文見《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一書見頁 166~168。

園，西藏地方部分高層僧俗官員，原本就是親英分子，自然支持四水六崗的叛亂言行，何況實際從事叛亂行動的都是遠道而來，離鄉背井已一無所有的康巴，讓他們去衝鋒有何不可，這兩股很自然的結合起來包圍了十四世達賴喇嘛，再加上達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次兄嘉樂頓珠早被美國中情報局收買，在這種內外情況影響下，而達賴喇嘛本人當時已經被這幾股勢力給「保護」起來，因此他的態度是搖擺的，拉薩街頭的動亂越演越烈，三月十七日夜裡，在蘇康、柳霞、夏蘇三位噶倫與副經師崔簡等人之安排下，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家族、隨員、藏軍六百多人。從羅布林卡附近渡過拉薩河，從此走上流亡之路。

#### 四、近年藏情與達賴言行

十四世達賴喇嘛之逃亡印度，究竟是主動出走，還是被動流亡，至今仍是不解之謎<sup>41</sup>，但出逃是既成的事實，已無回頭的可能，十四世達賴喇嘛之點慧較之三世、五世、十三世毫無遜色，自從流亡之後，公開主張西藏獨立，企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流亡前三十年，其言論尺度與國際對中共態度成比，也就是說：國際上對中共態度強硬時，達賴喇嘛主張獨立的聲調也拉高<sup>42</sup>，反之也然，之後中共結束文革提倡改革開放，無論經濟、軍事都有大幅度改善，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也日見重要，尤以近十年來，大陸不僅是世界工廠而且還成為世界市場，各國對中共也不得不加以重視，但是達賴喇嘛至為點慧，作出不同訴求，如訴求西藏獨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乃至中道，名稱雖然一變再變，然而其內涵仍然是藏獨，不過是玩舊酒裝新瓶的把戲，希望能得到世界各國的支持，然而到目前止

<sup>41</sup> 據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307~308，引達賴於 1959 年四月十八日起程前往印度提斯浦爾火車站時，有媒體前來採訪達賴喇嘛發表了一篇談話，在末段主動提及他之出走是「我決定同意他們的請求（指出走），而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不無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另師博主編《西藏風雨紀實》在頁 156 明指：「他（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被動出逃已是真相大白。」此書係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 年出版，按師博系集體撰者之筆名，實際係張國安，宋大川，王新興三人策劃主編，參與撰稿者有宮玉振、吳江、陳永剛、張禮祥、張學誠、陳涌清、施克燦、戚明筠、張會軍、杜繼剛等人。

<sup>42</sup> 關於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後之前三十年，其言行，可見參見劉學鈔、葉伯棠、蕭金松、黃澎孝、陳又新等人撰著之《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後達賴喇嘛言行之研究》蒙藏委員會，1986 出版。

並無任何國家承認藏獨，這是他的無奈，可是他依然周遊列國並得諸多國家政治領袖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接見，在世界各大媒體的曝光率始終不衰，這是他揣摩到西方國家時時不忘「中國威脅」的潛意識，總想加以抵制，所以達賴喇嘛的造訪，在不過份刺激中共的情況下，刻意製造「不期而遇」的場景，而達賴喇嘛也想藉此增加其與中共談判的籌碼，他的點慧較諸十三世達賴有過之而無不及。

「達賴」就是「智廣如海」，而十四世達賴又是累積了之前歷世達賴的智慧，可以說是天生睿智，對於西方國家玩「達賴牌」當然心知肚明，何妨順水推舟，也把西方國家玩弄於股掌之上，當西方國家講人權時，他就控訴中共如何迫害西藏人權，但是對密宗舉行某種特定儀式時，要用人腸、人頭、多種血以及整張人皮作為祭品，這種慘不忍睹的殘酷行為，就密而不宣絕口不提了，反正基督教世界對喇嘛教諱莫如深；當西方世呼籲注重環保維護自然生態，他就如斯響應高呼反對中共闢建青藏鐵路；當世界重視文化滅絕問題時，他立即指控中共大量把漢人移民西藏，意圖滅絕西藏文化；像這樣能夠掌握世界脈動而與之配合，若非智廣如海，何克臻此。

然而自中共「和平崛起」後，中國大陸不僅是世界的大工場（廠），同時也成為世界大市場，畢竟經濟是最現實的，目前中共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外匯存底更是全球第一，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在國際上具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如 2012 年底達賴喇嘛訪英時，歐洲正陷於金融風暴，為順利取得中共對歐元經困基金注入資金，英國首相卡麥隆不惜禁止英國政府閣員與達賴喇嘛接觸，迫使兩名保守黨國會議員取消與達賴喇嘛的私人午宴<sup>43</sup>，俗語說：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這是不是第一張骨牌，端看往後中共的經濟是否依然蓬勃向上發展而定，但毫無疑問，英相卡麥隆的作為，象徵達賴喇嘛的國際空間已經被壓縮了。

達賴喇嘛是轉世活佛，即使是才被認證是前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不論是三歲五歲，或十歲八歲，照喇嘛教的說法，這位轉世靈童已經承襲了前此各世達賴喇嘛的靈性跟願景，所以目前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擁有之前各世達賴喇嘛的一切，再加上他本身的修為，使得所有的藏人（除去為數

<sup>43</sup> 2012 年十二月四日，台北《中國時報》A13 版。

極少的穆斯林）對他都是無條件的崇拜與服從，達賴喇嘛的態度可以決定藏人的一切，這一點西方各國都看得很清楚，這也是何以流亡在外的藏人不過十幾二十萬人，卻能夠經常在國際上製造事端，因為這十幾二十萬藏人有一個精神領袖，只要這個精神領袖有任何意思因表示，所有流亡在外的藏人都會響應他、服從他，而國際想分化、裂解中國者，很容易找到支持對象，達賴喇嘛當然明白自己是西方國家眼中的奇貨」，既是「奇貨」，就得將它邊際效應發揮到極致，試看十四世達賴喇嘛沒花一分一毫錢，而能夠經常出現在世界各大平面或電子媒體，這證明他能把「奇貨」這個角色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不得不許之為國際公關高手。

依照喇嘛教轉世活佛的說法，每一個轉世活佛都累積了之前諸世活佛的點慧，十四世達賴喇嘛理所當然的也累積了之前所有達賴的點慧，當世界談種族滅絕時，他強烈抨擊中共大量移民西藏，意圖滅絕西藏民族與文化；當世界講維護自然生態時，他又猛烈批評中共開發西藏是對西藏自然環境的破壞，當西方世界高唱人權時，他指責中共藐視人權不遺餘力（但當對美軍虐待伊抗克戰俘時，他選擇性的忘記評論），像他這樣時時都能跟著世界潮流走、投西方人之所好，在當今世界政壇上，可算是一頂尖人物。他頂著格魯派法王（他自稱佛教徒，但佛教絕不講雙修，所以只能稱之為格魯派法王）與藏地政治領袖的雙重光環，使向來備受爭議的諾貝爾和平獎，又落到他頭上，這三道光環讓他游走世界各國備受禮遇，而從可見其外交手腕如何高超。

當然中共入藏後，一本其無神論之意識形態，與一千多年來西藏人唯喇嘛是崇、唯神佛是拜，將宗教與生活融為一體，兩者可說是對立的，再加上英、美、印各國的蠱惑、挑撥，1959年三月所發生的暴亂事件，並不意外，十四世達賴喇嘛出逃後，美國中央情報局更直接插手西藏事務，如美國支付「四水六崗衛教軍」經費（由達賴喇嘛二兄嘉樂頓珠轉交<sup>44</sup>，按嘉樂頓珠曾多次來台，與蒙藏委員會多有接觸，此人早年曾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就讀，其妻為漢人，此人擁有億萬身家），因此在西藏境內經常製作所謂動亂事件，同時在西藏流亡政府支使及西方帝國主義分化中國（不管那一個政權的中國，只要是統一的就要加分化甚至裂解）的意

<sup>44</sup> 見《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頁290。

識形態下，在海外各地製造反華事件，茲將 2008 年三月十四日至同年四月十九日，僅一個月又六天，就製作了一連串動亂事件，茲將之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sup>45</sup>：

時間	事件
2008.03.10	數百位哲蚌寺、色寺僧侶在拉薩街頭示威遊行，要求釋放去年遭官方逮捕的僧侶，遭軍警歐打、圍困寺院及逮捕。
2008.03.11	約六百名僧侶再上街遊行，要求釋放十日被捕僧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認定喇嘛遊行是「妨礙社會穩定的違法事件」
2008.03.12	哲蚌寺兩名僧侶割腕、色拉寺僧侶絕食抗議，中共武警部隊開始包圍拉薩各佛寺。
2008.03.13	甘丹寺、曲桑寺數百名僧兵、女尼欲赴拉薩遊行，遭軍警圍困，中共關閉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證實西藏近日有僧侶滋事，企圖製造動亂，但已穩定局勢。
2008.03.14	拉薩市區爆發大規模暴動，數百名僧侶、群眾上街遊行抗議，藏人攻擊漢人、回人、打砸搶燒及毀壞部分商家，中共出動大批警察與武警鎮壓，並關閉布達拉宮、大昭寺等歷史古蹟。
2008.03.15	大批武警與各式裝甲車、軍車進駐拉薩，展開全城搜捕，中共官方宣稱動亂造成十人死亡，下令拉薩實施宵禁並警告涉及動亂者限期二天內自首。
2008.03.16	拉薩全城封閉，外國觀光客被要求離境，西藏動亂擴散至鄰近的青海、甘肅、四川境內等藏人居住地區。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譴責中共施行恐怖統治與文化滅絕，呼籲國際調查西藏動亂。
2008.03.17	自首期限到，解放軍在拉薩全城挨家挨戶搜捕涉及動亂者。聯合糧秘書長潘基文會見中共駐聯合國大使，表達對西藏動亂關切。
2008.03.18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指控達賴集團策劃煽動西藏動亂；達賴否認主導並揚言若西藏暴力衝突持續惡化致失控，將辭去西藏流亡領導人職務。
2008.03.19	英國首相布朗通電力促中共總理溫家寶結束西藏動亂，溫家寶保證願意在達賴放棄暴力及西藏獨立等兩項條件下與達賴對話。
2008.03.25	法國總統沙柯吉明白表示因中共鎮壓西藏將抵制出席 2008 年北京

<sup>45</sup> 此表係時在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已是名記者黃敬平於其專題報告中所整理列出，特此致謝。

時間	事件
	奧運開幕典禮。
2008.03.26	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電話會談時首度打破沉默關切西藏動亂，並要求胡錦濤全面開放西藏讓外界觀察採訪。
2008.03.27	中共安排媒體開放採訪西藏動亂真相，大昭寺數十名僧兵趁機向媒體陳情泣訴遭中共軟禁。
2008.04.12	達賴宣稱已致函中共表明並未與漢人敵對、支持北京奧運及盼望停止鎮壓西鎮。
2008.04.19	不滿或總統抵制北京奧運開幕、奧運聖火經巴黎遭藏獨抗爭及法裔家樂福支持藏獨，中國大陸各地爆發漢人群眾包圍家樂福並抵制抗議事件，漢人對西方支持西藏起民族主義反彈情緒。

2008 年北京主辦奧運，依例奧運聖火繞行世界主要城市，於是海外藏人對聖火隊伍如影隨形進行干擾示威，試想如果幕後沒有有組織的機構在發動，以及那些國家在支持，怎麼可能辦得到？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美、英、法、德等國都脫不了干係，所謂聖火也不過只是一把火炬罷了，值得如此勞師動眾的抗爭嗎？

之後，大陸藏區藏人對中共當局的抗爭方式，有了明顯的改變，從或徒手或持刀、槍的武裝抗爭，轉化為極端自虐式的自焚，據媒體報導自 2009 年至 2013 年二月，大陸藏區已有百名藏人且多為喇嘛自焚<sup>46</sup>，如果喇嘛教還算佛教的話（近年來喇嘛教多自稱是佛教，而兩岸學界也多以「藏傳佛教」稱之，原來之「北傳佛教」，則另創「漢傳佛教」一詞代之，如深加推敲，似不妥適），如所周知，佛教戒殺生，自殺更是殺戒中之最大之惡，相傳佛教稱凡自殺者，永世不得超生，藏人無論喇嘛或俗人，未有不知此理者，而其仍勇於自焚，必然別有一番說詞，這個說詞很可能是：為反抗中共，為維護喇嘛教而自焚是殉教不是自殺，不是殺生，因此不但不會永世不得超生，而且其靈魂可以立刻升上西方極樂世界。建立理論不難，要使人相信則不易，必須出自權威之口，否則難以引起共鳴，這是合理的推論，在上項藏人自焚人數上百消息披露後，果不其然在不到一個月之後，台北有一位向以筆鋒犀利著稱，在其以《司馬觀點》的

<sup>46</sup> 見 2013 年 2 月 15 日，台北《蘋果日報》A40 版。

小方塊中，對西藏人自焚一事以《浴火袈裟》為題，寫了一篇專欄茲為存真起見，全文引錄如下（小標題應係編輯所加，刪去，照錄全文者，蓋免被指責斷章取義）：

「穿著袈裟的僧人滿身著火，在藏人驚駭的尖叫聲當中倒在街道上，任何人看到這場景，靈魂都會受到震撼。但是 100 多位圖博相繼自焚，中共卻把責任推給達賴集團了事，中國知識份子保持可怕的沉默，台北雖上千人上街聲援，但顯得形單影孤，很難引起社會回應。

中共把自焚當作自殺，是非常重的殺戒，違反佛教不殺生的教義，甚至說它是西藏流亡政府在幕後操縱的陰謀，許多自焚者的家人親友因此被判刑。

自焚是用最慘烈和絕望的方式表達抗議，和自殺是兩回事，說它是開殺戒，更是無稽之談，不過如何回應這件事，連達賴這麼有智慧的人也感到左右為難。

如果他對自焚發表負面看法，自焚家屬將會感到更悲哀，因為自焚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他作出正面評價，北京更會對他譴責。其實他曾公開宣布反對自焚，北京仍然把髒水倒在他頭上。

說漢人知識界對此漠不關心也不公平，因為此事牽涉到歷史、民族、民主、宗教、文化、經濟等問題，沒有研究不敢發言，而且自焚太慘烈，面對如此眾多年輕藏人的犧牲，自己民族身分帶來原罪感，道德責任太沉重。結果是一片沉默。」<sup>47</sup>

在這篇《浴火袈裟》，作者稱「自焚是用最慘烈和絕望的方式表達抗議，和自殺是兩回事，說它是開殺戒，更是無稽之談。」這一段話不知出自何典，自焚與自殺是兩回事，只是文字遊戲，回想三十幾年前，越南有幾個和尚自焚，怎麼沒見到作者說那不是自殺，更不是開殺戒，對同型態的價值判斷，應該用同一個標準，越南和尚自焚，三十多年來從未見有人說過那不是自殺，台灣有太多這種只說只寫一人理的名嘴，名筆，似乎是

<sup>47</sup> 見 2013 年 3 月 12 日，台北《蘋果日報》A5 版，該文由江春男具名。

樣樣都懂，但就是不懂喇嘛教，不值得多事批評。

現在且就此間媒體近兩年（2013~2014 年）所披露有「海內西藏情勢及十四世達賴喇嘛言行的報導：

報導日期	事件或言行概要	報導媒體	備註
2013.1.28	控教唆自焚 審判二戒人	蘋果日報 (A19)	括號為刊載版面
2013.2.15	藏人境內自焚，人數破百	蘋果日報 (A40)	
2013.3.12	《浴佛袈裟》專論，意指自焚是抗議，不是自殺更不是開殺戒	蘋果日報(A5)	係專論小方塊
2013.3.30	拉薩災，83 人活埋	中國時報 (A15)	
2013.3.31	藏礦區山崩活埋 83 人	蘋果日報 (A22)	
2013.4.18	老靈魂在微笑	壹周刊 (P74~81)	為專題報導性質
2013.4.23	中共達賴對話，台灣搭平台	聯合報(A15)	為讀者投書性質
2013.5.21	西藏問題之五大癥結	中國時報 (A14)	係專論性質，由謝劍具名
2013.6.14	法記者挺西藏，中國竟跨境恫嚇	蘋果日報 (A29)	
2013.6.19	社會友善，但政府不給藏人機會	蘋果日報 (A18)	
2013.7.10	川藏慶達賴生日，中國軍警掃射二傷	自由時報 (A12)	
2013.7.11	藏人自焚 袁紅冰：盼警醒台灣	大紀元報(A7)	
2013.8.2	達賴將返國？習近平悄探新政	聯合報(A19)	係專論性



報導日期	事件或言行概要	報導媒體	備註
			質，由林中斌具名
2013.9.5	聲援西藏圖博學聯促馬蹄共	自由時報(A6)	
2013.9.23	談旅遊西藏經驗	蘋果日報 (A16)	標題為： 天涯海角 走一回
2013.10.24	袁紅冰：今日的西藏就是明日的台灣	自由時報(A5)	
2013.10.29	北京維穩如臨大敵	中國時報 (A13)	
2013.11.3	藏漢雙語手機吸晴	旺報(C2)	
2013.11.16	以西藏為鑑 袁紅冰籲台勿簽和平協議	自由時報(A4)	
2013.11.21	滅絕西藏種族 西班牙通緝江澤民、西班牙通緝江澤民，控滅藏族李鵬也在列中方抗議	自由時報(A1) 蘋果日報 (A29)	頭版頭條
2013.11.27	想念家鄉味 藏族女孩開店煮	聯合報(B2)	
2013.11.21	非綠即敵（批評綠營媒體以誠品書店不把袁紅冰有關西藏書的上架為非）	旺報(C5)	以短評方式刊載
2013.11.19	蒙藏會影展播中國統戰片	自由時報(A2)	
2013.12.2	英相訪中「近期不見達賴」	蘋果日報 (A21)	
2013.12.3	率團訪陸卡麥隆不支持西藏獨立	聯合報(A2)	
2014.1.10	中共嚴打藏人 籲馬政府重視	大紀元報(A2)	附記者會 圖片
2014.1.11	四川佛院失火，150 多間僧舍遭毀	旺報(A17)	
2014.1.12	香格理拉克城遭火噬 香格理拉獨克宗古城大火，消防栓	蘋果日報 (A22)	附圖片

報導日期	事件或言行概要	報導媒體	備註
	無水救火 香格里拉古城付之一炬 慘!雲南古城失火千年古蹟成灰	中國時報 (A11) 自由時報 (A10)	附圖片  附圖片
2014.2.12	江澤民滅藏族遭西班牙通緝	蘋果日報 (A18)	
2014.2.21	歐巴馬今晚白宮會達賴	聯合晚報 (A28)	
2014.2.22	歐巴馬見達賴 陸跳腳抨干政 美反 藏獨獨 鼓勵直接對話	蘋果日報 (A28) 聯合晚報(A2)	
2014.2.26	達賴稱贊習近平（完全以反諷語氣 撰文）	蘋果日報 (A41)	以《司馬 觀點》小 方塊刊出
2014.3.7	無標題，仍以批判中共對藏措施達 賴表態 不反對同志婚	蘋果日報 (A24) 蘋果日報 (A28)	同上
2014.3.10	白瑪赤林：西藏絕不會亂起來	旺報(A6)	
2014.3.21	甘孜州雅康高速路年內動工	旺報(A21)	
2014.3.27	敏感密雪兒上西藏餐館	蘋果日報 (A25)	
2014.4.7	火噬麗江古城，14 內第四起	蘋果日報 (A16)	附四次四 災簡表
2014.5.28	震災重建間隙 未料引漢藏摩擦	中國時報 (A13)	
2014.6.3	印度與藏人領袖	蘋果日報(A6)	列《司馬 觀點》
2014.6.15	美國欲從台灣破九段線（其中有一	中國時報	係專文，

報導日期	事件或言行概要	報導媒體	備註
	段牽涉美國要中華民國放棄對西藏的主權)	(A11)	由徐和謙具名
2014.6.15	港誠品下架西藏書	蘋果日報(A3)	
2014.6.19	藏族女作家唯色遭軟禁 現已獲釋	大紀元報(A4)	
2014.7.24	藏西南捷運 拉日鐵路快通了 中共建假推特帳號宣傳西藏政策	中國時報 (A11) 大紀元報(A5)	附地圖
2014.8.10	災難連兩起 達賴為台灣祈禱 西藏尼木縣大車禍	自由時報(A2) 中國時報 (A12)	附地圖
2014.8.11	西藏遊覽車墜谷 44 死	蘋果日報 (A15)	附圖
2014.8.16	拉日鐵路通車，搭去賞珠峰四川藏人示威 運警開槍鎮壓	聯合報(A12) 大紀元報(A5)	
2014.8.17	拉日鐵路啓用，來往時間減半	聯合報(A12)	
2014.8.17	中方施壓，達賴喇嘛訪蒙被拒	旺報(A7)	
2014.8.22	拉日線通車 印媒憂陸控邊界建設西藏打造戰略鐵三角 陸高原最貴鐵路 拉動宗教觀光 台旅會北京辦 促藏鬆綁出境管制 西藏來台團院 二年半掛零 三座大山阻礙台藏交流	旺報(A3) 同上 同上 同上(A8) 同上 同上	
2014.8.29	班禪賜福 阿壩紅原機場 28 日通航	中國時報 (A19) 旺報(A20)	僅有圖片及說明
2014.8.30	藏人遭中共軍警槍殺 孕妻自殺抗議	大紀元報(A4)	
2014.9.10	普廷「自我中心」達賴喇嘛說	自由時報 (A13)	中英對照
2014.9.11	達賴：將結束 450 年轉世制度	大紀元報(A5)	

報導日期	事件或言行概要	報導媒體	備註
2014.9.16	西藏軍區演習 展示大批新坦克 藏童台北熱舞 高原海洋交流	旺報(A6) 旺報(A17)	附圖片 附圖片
2014.9.18	達賴喇嘛流亡 55 年返藏有望	蘋果日報 (A17)	附圖片
2014.9.19	莫迪釋善意 不允藏人在印反華	旺報(A6)	
2014.9.20	港媒示警 蘇獨或給台獨、藏獨靈感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啓示	旺報(A3) 聯合晚報(A2)	附圖片
2014.9.30	五台山菩薩頂如拉薩的布達拉宮	聯合晚報 (A12)	附圖片
2014.10.14	立委批蒙藏會：中國統戰部代理人	自由時報(A8)	
2014.10.17	達賴訪台 陸委會改口歡迎	自由時報 (A16)	
2014.10.19	吳育昇：達賴訪台算回中國	蘋果日報 (A17)	附圖
2014.10.24	願見、緣至 巧遇達賴思親圓夢	聯合報(A10)	
2014.10.22	達賴 班禪同來台 讓兩岸更穩定	聯合報(A18)	
2014.10.24	謬論吳育昇：達賴訪台等於回中國 六字箴言遭踐踏藏傳佛教徒抗議	自由時報(A1) 自由時報 (A18)	
2014.10.27	達賴訪台的政治目的	自由時報 (A15)	係專文雲 程具名
2014.11.10	拒濫捕三藏人判刑 藏生遊行救藏語	大紀元報(A5)	
2014.11.26	西藏建水電站 印度憂斷水 陸建壩引東南亞旱災學者駁斥	旺報(A7) 同上	
2014.11.27	看太陽花與占中「青年掌握來未」 達賴專訪 80 大壽達賴想在台慶生	蘋果日報(A8) 同上	
2014.12.5	道路暢通甘孜主要景區營運正常	旺報(C3)	
2014.12.11	歐中人權對話 提香港占中和西藏等	大紀元報(A3)	

報導日期	事件或言行概要	報導媒體	備註
	問題		
2014.12.13	怕惹惱北京 教宗避見達賴	聯合報(A17)	
2014.12.16	教宗教人演講 達賴與會遭拒	大紀元報(A3)	
2014.12.18	達賴：轉世制度恐終止	蘋果日報 (A19)	
2014.12.19	「我可能是末代達賴」達賴不要蠢人接棒	自由時報 (A11)	
2014.12.18	達賴喇嘛：轉世傳承將會告終 達賴：繼承制度應視藏人意願	中國時報 (A15) 旺報(A11)	
2014.12.19	達賴喇嘛：西藏自治中共內部意見紛歧	大紀元報(A3)	
2014.12.25	抗議中共高壓治藏 19 歲藏女自焚身亡	大紀元報(A5)	

以上是兩年來（2013.1.28~2014.12.25）台北七大平面媒體：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旺報、聯合報、大紀元報及聯合晚報（係台灣仍維持發行之唯一晚報），共刊載有關海內外藏情及十四世達賴喇嘛言行之報導共 99 篇，（其一篇《老靈魂在微笑》刊載於向以八卦，色癮為主之《壹周刊》，其內容自然無足採信），九十八則分別刊載於上列七家平面媒體，其情形為：

媒體名稱	聯合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旺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大紀元報
出現則數	9	3	10	23	16	25	13

就上列七個媒體屬性約略可分為以下幾種情形：聯合報及聯合晚報為同一媒體集團所有；中國時報與旺報為旺旺集團蔡氏所有；自由時報為林

氏財團所有；大紀元報為法輪功分子曹氏所有；蘋果日報則為港商黎氏所有，這七家報紙中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號稱台灣四大報，聯合晚報為台灣唯一晚報；旺報主要報導大陸消息；大紀元報為小報（星期天不出報），如就各報的立場型態看，大約可為以下幾種型態：

（一）但求聳動，並無特定政治立場，完全以商業利益取向，則非蘋果日報莫屬，經常以聳動的標題、配上大幅彩色圖片，以求引人注目，該報經常誇稱零售量第一，而且也是唯一售價十五元的報氏（其他各報均售十元），其張數之多也是各報之冠。但近來偶有小方塊專蘭，說了些外行話。

（二）不支持台獨，維護中華民國，認為兩岸終將透過傳統歷史、文化及自由、民主的方式統一，聯合報系各報（含聯合晚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旺報（該報系尚有工商時報）都屬於此一型態，台獨分子則稱之統派媒體。

（三）逢中（共）必反，倡言台灣獨立型，是則非自由時報莫屬，該報創辦人林氏原是國民黨黨員，該報於陳水扁執政涉嫌貪污而控稱有所謂「南線專案」時，該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確有此「專案」，並在台北市一女中前交付款項，其情節有如間諜片，最後法院審理結果並無所謂「南線專案」，而該報所稱在一女中門前受款者，也堅稱概無其事，此一烏龍新聞至今未見澄清，該報似已將媒體的服務業轉為製造業。

（四）徹底反中共，並支持藏獨，並且經常爆出比內幕消息更「內幕」的報導，如報導中共習近平之大力肅貪，是習、江（澤民）惡鬥，此是大紀元報，其創辦人曹氏似為法輪功之受害者，該報似乎在中共高層有相當綿密的人脈，否則何得來如此深不可測的超內幕消息？

上列有關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問題，按活佛轉世制度，是噶舉派所創，格魯派抄襲之，世俗相傳宗喀巴寂滅時，命其八大弟子中之根登珠巴、凱珠二人，以「呼畢勒罕」<sup>48</sup>世其傳（也就是師法噶舉派的活佛轉世制度），其意為「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職位」，

<sup>48</sup> 「呼畢勒罕」係蒙古古語，意為自在轉生，也即再來人之意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 1961 年，頁 34。

達賴即根登珠巴的轉生，班禪即凱珠的轉生<sup>49</sup>，這是一種說法，卻未必是藏人格魯派的說法，按宗喀巴大弟子根登珠巴自己曾說他自己後世將在漢地轉生<sup>50</sup>，但是當根登珠巴辭世（1542 年）後，他生前說過的話（漢地轉生），弟子們並不一定會遵從，所以根登珠巴的弟子頓月巴就說：「雖然有根登珠巴後世將在漢地轉生的說法，但是那裡佛法不興盛，想來不會在那裡轉生，要是轉世，想來應該在這附近地方轉世，……」<sup>51</sup>，可見一個人的「遺囑」，並不一定約束得了未死的人，這正應了所謂「人死原是萬事空」，何況佛教原本就講「空的」哲學，十四世達賴喇嘛想要對他轉世問題作決定，看來還是逃不過一切都成空的結局，但是他幾十年來，他明知生前決定不了身後事，但還是經常對他身後的轉世問題，提出看法，而且每次說法不同，之所以如此，幾乎都有其政治作用，如 1970 年回答記者時，他說：「我可能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sup>52</sup>，當時他年事尚輕想以不轉世爭取格魯派信徒的不捨而獲得更大、更強有力的擁戴，以加大他藏獨的訴求與能量。同年他又回答另一位洋記者的訪問如下：

問：「人們相信達賴喇嘛能決定自己的轉世，你計劃另一次轉世嗎？」

答：「那要由達賴喇嘛此職對西藏是否有用而決定。」

問：「你對十四世以後的達賴喇嘛職務將停止有何看法？」

答：「這是沒有根據的臆測，只要有用，達賴喇嘛將會存在，如果作用消失了，達賴喇嘛就沒有用處。像活佛一般，我的轉世長久存在。但是如果達賴喇嘛無益於西藏，為何要予以此一名稱呢？因此，十四世達賴喇嘛將是最後的，我想那是最

<sup>49</sup> 胡耐安《邊教宗教史》頁 34~35。

<sup>50</sup> 據《根敦珠巴貝桑布傳》記載，是根據根敦珠巴自己說他以後要轉生到漢地，此是係轉引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3，註 1。

<sup>51</sup> 見《二世達賴喇嘛自傳》收入《歷輩達賴喇嘛傳記匯編》，印度達蘭薩拉鉛印本第一冊，頁 342，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 33~34。

<sup>52</sup> 見「Advertiser Adelaide Australia 14, October 1967, Visiting by John Slee」

好的。我認為我不是最好的達賴喇嘛，但也不是最壞的。所以  
做最後是最好的」<sup>53</sup>

達賴喇嘛既然是轉世活佛，而且是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職位，完成前世未竟淑世度人之志，怎麼可能會有「最壞的」呢？可見轉世之說，他自己也未必相信。再看 1995 年四月十九日他接受史追雲藏語專訪以《執中道之道：達賴喇嘛看漢藏糾結》為題的漢文譯文：

問：「台灣媒體報導，您的下一世靈童不再來了，這真的嗎？」

答：「…西藏舊社會是不是如中共所說得是一個『野蠻大黑獄』，我不知道，但是舊社會有很多缺失，是一個退步的社會，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大部分的西藏人民覺得不需達賴喇嘛，就不需要再來，我就成為最後一位達賴喇嘛了；反之，如果大部分的西藏人民覺得需要達賴喇嘛就可以再來，但我個人不但會繼續投胎轉世，生世不可能就此中斷……」<sup>54</sup>

細讀這段話，他個人不但會繼續投胎轉世，生世不可能就此中斷，但如果大部分西藏人民覺不需要達賴喇嘛，就不需要再來，這令人很不解，如何把達賴喇嘛個人與達賴喇嘛作個切割，「個人」是會投胎轉世不可能中斷，但「達賴喇嘛則視西藏大部分人民是否覺得需要，而決定是否轉世，這個高空打得漂亮，讓聽閱者無法掌握答案究竟是什麼，事實上「達賴喇嘛」這個名號，是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俺答汗）賞給索南嘉措的「宗喀巴三傳弟子」，與西藏人民何關，而五世達賴喇嘛是從青海和碩部蒙古固始汗及其子孫年中剽竊治藏的權力，也與西藏人民無關，但黠慧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卻把其權力的來源與西藏人民掛上了鉤，說穿了只是附會天賦人權，以討好「民主」之說而已。類似的說法頗多，不必多舉，但 2010 年十一月有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說說法，他說：

<sup>53</sup> 1970, by Maryse Choisy, 但此處係轉自《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後達賴喇嘛言行之分析》一書，頁 123。

<sup>54</sup> 1995 年四月十九日台北《聯合報》。



「除了傳統方式解決（達賴）繼任人選問題，或許也可像天主教會選教宗一樣，由一群高層領袖任命未來的達賴喇嘛。」<sup>55</sup>

這個說法顯然是爲了迎合西方天主教文明圈，討好西方人的想法，而與活佛轉世的「身死後，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世職位」傳統理論基礎背道而馳，可見這位十四世達賴喇嘛臨機應變隨口應答的本事有多高！同時西藏大部分人民的需要與否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了，但是如所周知，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說過的必留下紀錄，這是不是妄話、謊言、由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己回答。且再看 2011 年九月二十四日宣布：

「西藏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昨天（2011.9.24）宣布，他將在九十歲時對達賴靈童轉世制度做出決定。」<sup>56</sup>

這個說法等於否定了他之前的各種說法，他之所以把轉世問題往後延到他九十歲時才作決定，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所期待，日本、歐美總有個別的「學者」，認爲中共終將崩解，台灣李登輝（基本上應將之歸類爲日本鬼子）也曾說過中共將瓦解爲七塊，因此十四世達賴喇嘛希望以拖待變，這就形成中共崩解或達賴喇嘛圓寂的時間競賽，然而自從日本「未來學家」預測中共將崩解（骨子裡自認是鬼子的李登輝也東施效顰的說七塊論）的十多年來，中共非但沒有崩解，反而從世界工廠轉而成世界市場，2014 年更躍登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又有一些美國專家預測到了 2030 年，中共的綜合國力有可能超越美國，不管此項預測是否正確，屆時十四世達賴喇已是九十高齡，所以他說他的轉世靈童問題，要等到他九十歲時再作決定，可見他不是隨口應答，我們很願意看到十四世達賴喇嘛高壽百歲，屆時果如美國專家所預測中共綜合國超越美國時，十四世達賴喇嘛將如何決定其轉世靈童問題。

2014 年九月十一日，十四世達賴接受德國《周日世界報》（Welt Sonntag）訪問時「首度」透露，他希望在他死後，藏傳佛教信徒不再尋

<sup>55</sup> 2010 年十一月 24 日，台北《聯合報》。

<sup>56</sup> 2011 年九月二十五日，台北《中國時報》。

找下一任達賴喇嘛，結束 450 年來的達賴喇嘛轉世傳承<sup>57</sup>，以上是台北一家平面媒體的報導，稱「首度」未免與事實不符，其實他說不再轉世已經說了好多次了，舊飯回鍋再炒還是舊飯。再看 2014 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北平面媒體報導十四世達賴喇嘛「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之夜》節目專訪時表示，在他之後是否會有第十五世達賴喇嘛，得視他辭世後的情況而定，且將『取決於西藏人民』……」，「報導引述達賴喇嘛的談話表示，『沒有人能保證，今後不會出現一位愚鈍的達賴喇嘛，令其本人蒙羞，那將非常可悲。因此，何不讓這一古老傳統終結在一個備受歡迎的達賴喇嘛手中呢？』」<sup>58</sup>德國與英國不一樣，因此在德國與在英國講的話也會有不同，在時間上只相隔兩個月又一個禮拜。如果說活佛轉世真得不昧本性，怎麼可能「會出現一位愚鈍的達賴喇嘛」？如果這句話是真的，那麼活佛轉世說法就是假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請你明白的告訴大家，究竟何者為真。其實他作此宣布仍是有針對性，即使轉世活佛能不昧本性，承繼了前世甚至若干世的靈性，但自古以來從沒有不死的肉身，目前他在跟時間賽跑，當然他希望中共政權在他寂滅前崩潰瓦解，這樣他可以在他的喇嘛王國裡繼續命王稱帝，威福自作，但是就現實情勢來看，中共政權似乎毫無崩解的跡象，為避免他一旦寂滅後，以他一再宣稱不再轉世，其目的是不讓中共在他死後，尋找轉世靈童，也就是對他身後事打了一劑預防針，既預告中共不必插手其轉世靈童問題（宣稱不轉世，所以沒有尋找靈童問題）其實重要的用意是要迫使中共跟他展開談判，畢竟格魯派在藏中有一定影響力，如確實不轉世，是否會產生某些後果，目前任誰都無法預估，十四世達賴喇嘛想以此對中共施壓，想逼中共就範，算盤打得如意，但能否得逞，且看：很少人能夠決定自己死後之事，依照藏地習俗，前世達賴喇嘛寂滅後，由其門徒組成靈童尋找小組，這個小組才有權決定是否要轉世以及誰是轉世靈童，譬如一世達賴喇嘛根登珠巴（是追尊的）生前分明說過要他的後世在漢地轉生，但他的門徒認為那裡佛法不興盛，想來不會在那裡轉生<sup>59</sup>，可見十四世達賴喇嘛此時說轉世不轉世或者

<sup>57</sup> 見 2014 年九月十一日，台北《大紀元報》。

<sup>58</sup> 見 2014 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北《旺報》。

<sup>59</sup> 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轉給誰，都不是重點，一旦十四世達賴喇嘛辭世，只要北京覺得有需要，自然會組成靈童尋訪小組，依照傳統儀軌尋訪靈童，經由十一世班禪認證，報請北京核定，就成為十五世達賴喇嘛，照格魯派傳統習俗，達賴、班禪互為師徒，如此十五世達賴喇嘛注定要成為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徒弟，看來十四世達賴喇嘛這算盤白打了。

由於中共的綜合國力日益壯大，對國際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強「德國有一項研究首次發現，中國崛起後，進口貿易有所謂明顯受政治影響的『達賴效應』，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旦獲某國領導人接見，之後該國對中國出口額就會走下坡，且此負面效應長達兩年，『受害國』兩年對內中出口額減幅平均達 8.1%」<sup>60</sup>，美國有線電視網（CNN）報導也有類似結果，德國人的研究向來踏實，鮮有打高空的，這項研究結果是否說明以十四世達賴喇嘛來向中共施壓的邊際效用正在遞減，甚至已經出現了反作用，也因此達賴喇嘛不得不以不再轉世，作為最後一擊，另一方面又想起玩「台灣牌」這一招，他在 2014 年十一月接受《蘋果》採訪時說：「只要台灣政府允許，我隨時做好去台灣準備。」「他更期盼明年（按係指 2015 年）八十歲生日祝壽活動，『可在台灣舉行』。」<sup>61</sup>這則新聞很怪異，他在 1998 年明白的說：「與中共對話，比訪台重要」<sup>62</sup>，怎麼此刻又說「我隨時做好去台灣準備。」是他看準台灣人好騙，還是他忘了之前說過「與中共對話，比訪台重要。」此其一，其次幾乎沒有人會把自己的生日活動，說成是「祝壽活動」，連這一點謙虛都沒有，但願這只是翻譯上的錯誤；其三，十四世達賴喇嘛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出家人，是佛教比丘，出家人四大皆空，怎麼還念念不忘自己的八十歲「壽誕」呢？難道他六根還未清？或許他已經發覺在國際上已很難再像以前一樣呼風喚雨，好在台灣還有一群人抱持看「台獨與藏獨，大家不孤獨」心理，認為「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來台訪問，的確對台灣獨派形象莫大鼓舞。……」<sup>63</sup>，所以還是回過頭來玩玩台灣牌，不但可以炒熱新聞，而且以「八十歲生日

---

33。<sup>60</sup> 見 2010 年十一月五日，台北《聯合報》<sup>61</sup> 2014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北《蘋果日報》。<sup>62</sup> 1998 年七月十七日，台北《中國時報》。<sup>63</sup> 1997 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立晚報》。

祝壽活動」還可狠狠大撈一筆生日禮金，一舉兩得何樂不爲。我們且看逢綠必軟的馬政府對十四世達賴喇嘛「要來台辦八十歲日生祝壽活動」如何接招了。

## 五、結語

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已經五十六年（1959~2015 年），他很努力的把西藏問題炒作成國際問題，他似乎辦到了，其中歐美日各國在潛意中要分化中國（指文化的、歷史的中國，絕不僅指中共而言），而對流亡的達賴喇嘛刻意予以拉抬，使他成爲國際媒體寵兒，增加了西藏問題的能見度，另一方面中國歷朝歷代的邊疆或民族政策不夠周延，而所任命的邊疆吏良莠不齊，造成邊疆民族的怨懟，這些固然是造成西藏問題的顯性原因，僅是如此，還不足以讓西藏問題受到世界的重視，因爲還有一個穩性的原因。

自上個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歐美年輕人成了「迷惘的一代」，他們想尋找一個理想的天地，就像《聖經》中的伊甸園、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如中國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然而這些都只是理想，事實上並不存在，然而此時喇嘛教中傳出「祥巴拉」的一個理想世界，一般將之譯爲「香格里拉」，把香格里拉與西藏等同起來，將過去的西藏想像成是一個和平、自由、精神、博愛、智慧、慈悲、環保、男女平等，沒有階級，不分貴賤，非暴力，非物質的人間淨土<sup>64</sup>，當十四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後，也以西藏是香格里拉自居，這就引起西方人的重視，事實上香格里拉一如伊甸園、烏托邦、桃花源一樣，只存在於文字記載裏，在現實的世界中，從無香格里拉這回事，且看大約 1950 年前後，在拉薩達賴喇嘛夏宮羅布林卡，一個外國人的親眼所見大昭寺門口的情景：

「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他們深知人在神面前是慈愛又體貼的。在西藏，如同在多數其他地方，乞丐是一項公害。在我建壩那段時候，政府決心化乞丐為人力。他們集合拉薩千名乞丐，從中挑出七百位合於受雇者，安排上工，支付其

<sup>64</sup> 沈衛榮《妖魔化與神化西藏的背後》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 年，頁 44。

食物、薪資。詎料，第二天就跑掉一半人，再過幾天全跑光了。可見這些人並非因為找不到工作才成為乞丐，多數人也沒有身體殘疾。純粹只是因為懶而已。乞討在西藏是項好營生，沒有人會趕乞丐。即使從每位客戶那兒只能得到一些糌粑、一點點錢，兩小時下來的「工作」收入也夠他過一天了。接著他往牆角一靠，在陽光下快樂地打起呼來。許多乞丐患重病，處境堪憐，他們利用自己的病態，非要路人關懷不可，這一點又令人不敢苟同。」<sup>65</sup>

這是西藏的真實面貌，但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出逃之後，就投歐美人之所好，宣稱舊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於是只好一路香格里拉下去，雖引起西方人對西藏問題的重視，但西藏畢竟不是香格里拉，可是一般西方人對西藏認識太少了，由於香格里拉使西方人重視西藏問題，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十四世達賴喇嘛雖然很成功把西藏與香格里拉等同起來，讓西方世界重視西藏問題，但是卻被這個說法給綁架了，等於是香格里拉的囚徒<sup>66</sup>，現實世界裡沒有香格里拉，十四世達賴喇嘛要如何去變造出一個西方人想像中的香格里拉？

既然歐美有些國家人民誤把西藏認為就是香格里拉，因而重視西藏問題，那麼就應該把所謂的西藏問題講明白，首先達賴喇嘛自流亡之後，對西藏的未來翻來覆去，從堅持西藏獨立，繼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乃至中道，始終沒有說清楚其真正內涵是什麼，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訴求的還是藏獨，只是換了包裝而已，如果達賴喇嘛果真如他近年所說的不再追求西藏獨立，他與中共之間仍存有若干難以解開的結，此間知名的民族學者、礁溪佛光大學名譽教授謝劍先生於 2013 年曾撰有《西藏問題的五大癥結》一文<sup>67</sup>，極具參考價值，這五大癥結是：國族認同問題、政教分離問題、民族語文問題、大西藏認同差異問題以及撤離漢人移民問題。如果照達賴喇嘛所堅持的說法，那就是藏獨，以國族同而言，達賴喇嘛始終否認

<sup>65</sup> 這是海因利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撰《我與少年達賴》的一段譯文，引自 1997 年三月十七~二十日，台北《自由時報》所載，由刁筱華漢譯。

<sup>66</sup> 見註 64 所引書頁 50。

<sup>67</sup> 此文刊載於 2013 年五月二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A14 版。

藏族是中國人，他與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看法一樣，認為中國就是漢人，所以藏人不是漢人，他不知道中國人在邏輯上是上位概念，漢人、藏族，蒙古族、維族、傣族……等，都是「中國人」的下位概念，試問今天在美國的印地安人、黑人、亞裔、拉丁裔……是不是美國人？一般歐美日國家爲了分化、裂解中國（指文化的、歷史的中國），刻意把中國人與漢人等同起來，這樣就便於對藏、維吾爾、蒙古……等民族進行分化，「中國人」就如同「美國人」一樣，不是指某一個民族而言，這個邏輯概念，學過因明，唯識的達賴喇嘛不可能不明白，其仍強調藏人不是中國人，顯見別有居心。

再看所謂大西藏問題，達賴喇嘛所謂大西藏不只今天的西藏自治區，還包括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省全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甚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崑崙山北麓的所有綠洲，但是他完全忘了拉達克、布魯克巴（今不丹）、錫金都曾經屬五世達賴喇嘛保護者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及其子孫的駐牧之地，還有回族、哈薩克等族，豈可算是純藏族地區，如再往深一層看，

古往今來從沒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到這世界來  
時帶來寸土尺地，事實上連一顆泥砂也不曾帶來，說  
某地屬於某個人或某個民族，純然是無稽之談，人，  
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從來不屬於人；

如果達賴喇嘛的說法是對的，那麼在美洲的白人是否要全部撤走？他敢對美國這樣說嗎？何況在他所說的大西藏範圍內，非藏族比藏族多多了，如何要他們撤離，謝劍先生的專文更直指「達賴宣稱已有七百五十多萬漢人移殖，使當地的西藏人淪爲少數民族，這真是天大的謊言和玩笑」謝氏又稱：「筆者根據自身的經驗，發現除拉薩有少數漢人，其他地區漢人多半是形單影隻，遍查各種資料，包括七六年（美國）CIA 解密報告，漢人連軍隊在內，也不過二十三萬四千人，約爲西藏自治區人口的12%。」可見十四世達賴喇嘛所宣稱，西藏有七百五十多萬漢人移殖，不但是笑話，而且還是謊言，他平常所說的話大多類此。儒家說不誠無物，佛門稱出家人不打誑言，十四世達賴喇嘛是否應該管好他的嘴。

由於十四世達賴喇嘛春秋已高，縱有不滅的靈魂，從無不死的肉身，而中共的國際影響力日漸增大，以達賴喇嘛來制衡中共的邊際效用，則漸見減弱，有些政治領袖已避免與達賴喇嘛會面。如 2014 年 12 月 12 日達賴喇嘛到羅馬參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會議時，梵蒂岡教宗方濟各就避見達賴喇嘛（見 2014 年 12 月 13 日台北《聯合報》A17 版），但方濟各上任後曾會晤猶太教、東正教領袖，更曾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齊聚梵蒂岡，而且計劃訪問斯里蘭卡與其佛教領袖會面，獨獨避見達賴喇嘛，顯然與達賴喇嘛政治光環日益就弱有關，另有一份平面媒體向以反中共著稱，對此以《教宗私人演講 達賴與會遭拒》為標題，報導此事（見 2014 年 12 月 16 日台北《大紀元報》A3 版），從用字遣詞可看出「遭拒」顯然帶有負面意義。再看，美國已經行之數十年的「祈禱早餐會」，達賴喇嘛雖受邀出席（共有三千六百人出席），僅與美國總統歐巴馬「隔空致意」（見 2015 年 2 月 6 日台北《蘋果日報》A30 版），這種政治行情「利空」，顯然還會往下探底，達賴喇嘛聰明絕頂，每當他行情下跌時，就會想起玩台灣牌，所以他早在去（2014）年 11 月就放出空氣說，想來台過八十歲「大壽」（見 2014 年 12 月 27 日台北《蘋果日報》A8 版），緊接著台灣有媒體報導「蔡英文遣密使蔡得勝赴印邀達賴五月訪台」，民進黨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一無所悉（見 2015 年 2 月 7 日台北《大紀元報》A5 版），令人奇怪的是，這麼「怪異」的消息，何以不由民進黨發言人出來澄清，而由地方首長來發表意見，看來不無藉此試探社會反應。更有媒體報導蔡得勝因赴印密邀達賴來訪，而痛失可能出任國安會秘書長之職（見 2015 年 2 月 10 日出刊之《周刊王》，頁 34-38），果而確有受託赴印邀訪達賴之事，則太令人不可思議，蔡得勝曾是上將，且曾任國安局長，是否忘了在官校時曾高唱：怒潮澎湃，黨旗飛舞…的校歌、軍歌，而為 2016 年「或許」民進黨會在大選中獲勝，屆時「或許」賞以國安會秘書長之職，而由藍轉綠，果而如此，文天祥的正氣歌應該棄之如蔽履了，氣節、忠貞都抵不過一個職位，這也難怪在百貨公司、大賣場什麼都買得到，就是沒賣氣節與忠貞，如果獲得職位（這個職位是在兩個「或許」的或然條件下，才會得到）真的那麼重要，二三其德也就無所謂了。

回過頭來看達賴喇嘛之所以要到台灣來，一則他多次派代表與北京接

觸，想以不同的包裝、動人的口號，什麼五點和平計畫、斯特拉斯堡宣言、中道思想等，都沒有改變其藏獨本質，中共並沒有上當，原本只有：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放棄西藏獨立訴求這兩個底線，可是 1997 年達賴首度訪台之後，又增加了一個要達賴承認台灣是中國（指中共）的一部分，才會與達賴作進一步的商談，自是達賴喇嘛之想返回大陸，遂成為無解方程式，在時間沒有站達賴這一邊，今（2015）年他已經八十高齡了，所以又想起玩台灣牌，而台灣一些老想拋祖棄宗的政客，甘願被達賴玩弄，認為台獨，藏獨掛鉤，可以壯大聲勢，所以才有傳言民進黨要於五月邀請達賴來台，2014 年 10 月他已放出想來台灣過八十「大壽」（出家人談過壽，豈不奇哉怪也），如果台獨黨邀他來台，這對達賴而言豈非正中下懷，他之所以又想來台，一則與台獨合流，用以壯大藏獨聲勢，畢竟台灣還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二、三十萬軍隊，合流之後可以增加其與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再則今年適逢他八十「大壽」，來台過壽正可以海撈一筆（首次來台時，光是為群眾灌頂加持，說白了就只是摸頭而已，就摸走了三千萬新台幣），其三，在他政治行情下滑時，台獨黨的邀訪，無異是對行將熄滅的爐子加柴添薪，何樂不為。

至於台獨黨之想到邀訪達賴，這些個政客當然不是白癡，也經過精心評估，此間有知名政治學學者石之瑜教授以《結合達賴反中 小英走鋼索》為題，對民進黨與達賴搭上，提出以下看法：

傳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安排達賴 5 月訪台，若成，將是國民黨無力阻擋，華府無從介入的事。而無論成否，這必然是判斷台獨國際大戰略的重要依據。台藏相互提攜，是蔡英文兩岸政策的重要環節。民進黨在 2016 執政後將冷凍兩岸關係，主攻國際宣傳的基本方針，漸露端倪。

達賴謀求與北京談判未果，返藏之路遙遙無期，轉而接受民進黨邀訪，或是不得已的戰略選擇，也是每次達賴遭遇北京的嚴拒後，都會接觸台灣模式重現。達賴對台灣關心基本上是戰略性的，這種工具性思維，與他為在台信徒弘法祈福並不牴觸。達賴同時是政治上的戰略高手與宗教領袖。



相形之下，過去台獨的國際戰略始終不成熟，游擊戰的成分超過其間整體性或一致性。近年由於台獨成功阻擋了國民黨開展兩岸進一步交往的任何政策，確保在兩岸關係上，國民黨已不可能有任何超越民進黨的可能後，民進黨自己的大陸政策為何，勢必成為下一個課題。這不僅是台灣選民在好奇，大陸在等，更是國際上殷切期盼答案的問題。

民進黨要說服各界的是，在國內繼續推動台獨如何確保兩岸和平穩定？華府希望台灣透過兩岸多交流來穩定台海現狀，但這對國民黨選情有利，民進黨絕不同意，那民進黨要怎麼辦？蔡英文原本認為只要選民益加堅定拒統，年輕世代直覺反中，大陸終究會調整。但是夜長夢多，難保不擦槍走火，她乃需要周延的國際大戰略。

台藏聯盟勢必激怒北京，升高對立，這恰是蔡英文大戰略的重點。對台獨而言，中斷與北京任何新協議後，爭取國際奧援勢在必行。台獨片面挑釁的話，國際不同情、美國不接受，若能抓住達賴一起，華府為之語塞，就不便指控是台獨在挑釁，那就只能是北京在壓迫。台獨的國際戰略核心思維，就是營造中國威脅，爭取國際輿論同情，牽制北京，再擴展台灣國際空間。（見 2015 年 2 月 9 日台北《旺報》D3 版）

看來民進黨也在玩達賴牌，但是似乎忘了「達賴」也者，其本意雖只是蒙古語「海洋」之意，但延伸解釋就是「智廣如海」之意，何況據喇嘛教的解釋，轉世活佛的智慧是世世累積的，當今這個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累積了之前十三世的智慧，蔡英文能否玩得過他，不無疑問；再者自 1959 年流亡印度之後，已超過半世紀，這半個多世紀，他周旋於世界各國，始終是媒體寵兒，固然西方世界想以達賴以及西藏問題來刁難中共，但達賴喇嘛也利用西方世界這種心態，把西藏問題炒熱了，其手腕圓滑縱橫裨闔於國際間，騙到一個諾貝爾和平獎，試問蔡英文國際經驗能勝過他嗎？玩達賴牌要惦惦自己的斤兩，同時也是在玩火，稍一不慎就會燒到自

己，他自己玩火自焚不打緊，何苦把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往火裡推，何況還有一個中共政權要對付，所以石教授在專文中又提到：

「過去，總是達賴在利用台灣，不論在金錢或政治上。達賴借用台灣的統獨之爭，成為台獨壓制國民黨的內鬥手段，俟國民黨礙於信徒壓力讓步，台獨藉此迫使國共關係與兩岸關係降溫，一舉數得。如今，反中勢力已取得主導，即將執政，為何仍然執意破壞兩岸關係？這不能從政黨利害關係理解，而必須從蔡英文的台獨信念理解。對堅定的台獨來說，台獨的最後一步，就是國際承認，所以她與北京之間，已經沒有交道可打。

北京可能的因應之道很多。就事論事的話，可以採取直接制裁，就算忤逆國際輿論或台灣民情，為了大是大非在所不惜，如此或可嚇阻國際介入。當然，北京也可採取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方式，停止兩岸外交休兵，接收台北在太平洋與拉丁美洲的殘餘邦交，意在不言中，而不直接針對台藏互絡。」

（見 2015 年 2 月 9 日台北《旺報》D3 版）

這個分析的相當貼切，蔡女士應該好好的想一想。這個黠慧的十四達賴喇嘛早就說過：「與中共對話，比訪台重要」（見 1998 年 7 月 17 日台北《中國時報》），現在之所以想到台灣過其八十大壽，想必是與中共對話觸礁了，所以想以訪台來激怒中共，迫使中共與之對話，就達賴而言，不失是一招好棋，只是台灣成了其手中的一枚棋子，除非蔡女士也想激怒中共，迫使其對台展開文攻武赫，藉此讓台灣人民對中共反感，有利於其 2016 年的選情，這是在走鋼索，一旦中共如上引石之瑜所稱「為了大是大非在所不惜」採取直接制裁，屆時蔡女士是否能率領民進黨諸公扛起武器，與中共打上一戰，政治固然是高明的騙術，但無視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安危，只為了一人一黨的權力慾，午夜捫心自問，能睡得安穩嗎？更何況中共是否會如蔡女士所想像的反應，是操諸中共之手，未必是蔡所能左右，總而言之邀訪達賴，只能成為達賴手中的一枚棋子。

（本文於 2015 年 2 月 15 日投稿，於 2015 年 3 月 3 日審查通過）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牛奶靠人擠出來，莊稼靠人種出來（維吾爾族）

馬、牧人的翅膀（柯爾克孜族）

管不好牛羶，喝不上酸奶（哈薩克族）

騎馬需要韁，捕魚需要釣竿（蒙古族）

善事可做，惡事莫爲（壯族）

山不轉路轉，影不歪人歪（景頗族）

惡鳥不能當黃鸞，惡狼不能當家狗（壯族）

寒冬不凍勤勞人，五荒六月吃糯團（瑤族）

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壯族）

錢財不會生仔，汗水泡看全碗（哈尼族）

人懶雜草壯，人勤莊稼子（彝族）

要想長久富，不怕吃大苦（壯族）

如果沒有才德，位高只是羞恥（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霧社事件及其餘生遺族的歷史記憶—— 兼評《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

方素梅

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人，壯族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 摘 要

關於霧社事件的研究，在海峽兩岸一直存在多元的觀點。尤其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著臺灣政治解嚴和原住民運動的興起，以及電影《賽德克·巴萊》的上映，霧社事件重新走入公眾視野並引起更加廣泛的討論。在此過程中，無論學界還是媒體，都無法忽視賽德克族人的意見與聲音。本文即以霧社事件餘生遺族後裔新近出版的《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為案例，對霧社事件及其餘生遺族的歷史記憶進行探究，並試圖瞭解多元文化結構中“我族”歷史觀的興起及其價值。

**關鍵字：**霧社事件 賽德克族 歷史記憶 文化價值 族群關係

20 世紀 30 年代初期爆發的霧社事件，是臺灣原住民反抗外來統治的一次重大活動，對日本的殖民政權和臺灣原住民社會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並構成中國抗日戰爭史敘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自霧社事件爆發以來的 80 多年間，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討論因著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的變化而有潮漲潮落之勢，但從未退出人們的視線。特別是最近十餘年來，隨著臺灣政治解嚴以及原住民運動的興起，霧社事件的書寫和詮釋儼然成為熱點。在這些書寫和詮釋中，不僅出現了以“主位元”視角來刻畫和理解

霧社事件的作品，霧社事件當事人後裔——賽德克族<sup>1</sup>亦頻頻發聲，“紛紛提出賽德克族的‘內部觀點’，進而慢慢建構出賽德克族觀點的霧社事件”<sup>2</sup>，引起了學界的熱切關注。本文以賽德克族餘生後裔郭明正 2012 年出版的《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為中心，對霧社事件餘生遺族的歷史記憶進行探究，並試圖瞭解多元文化結構中“我族”歷史觀的興起及其價值。

## 一、霧社事件及其餘生遺族狀況

霧社事件，大陸一般稱為“霧社起義”，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的書寫大多納入“少數民族革命史”範疇，鮮見深入的調查和研究。一直到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大陸關於霧社事件的進一步詮釋才逐步展開。因此，有必要對霧社事件進行簡單描述。<sup>3</sup>這一事件指 1930 年臺灣霧社地區賽德克族六社發動的抗擊日本殖民者的活動。賽德克系音譯，大多標注為“Sediq”，其意為“人”。賽德克族內部分為三個語群，一般音譯為德路固（Truku）、德固達雅（Tgdaya）、都達（Toda）。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霧社員警分室所領原住民包括四大部族，即屬於賽德克族的德路固群、道澤群（都達群）、霧社群和屬於泰雅族的萬大群。霧社群即指德固達雅語群，其自稱“Sediq Bale”，意為“真正的人”，德固達雅則是德路固、都達對他們的稱呼，意為“內山的人”。霧社群共 11 社，當時人口近 2200 人。參與舉事的為 6 社，即督洛度呼（Drodux）、固屋（Gungu）、斯固（Suku）、馬赫坡（Mehebu）、波阿侖（Boarung）、度魯灣（Truwan）。<sup>4</sup>霧社群的其他社也有部分人員參與了舉事。

霧社地處臺灣中部今南投縣仁愛鄉，屬中央山脈地段，境內山高林

<sup>1</sup> 賽德克族原本被包括在泰雅族中，2008 年 4 月 23 日經臺灣“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認定，賽德克族從泰雅族獨立出來，列為臺灣原住民第十四族。

<sup>2</sup> 林文德：《霧社事件影響賽德克三群間族群關係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第 2 頁。

<sup>3</sup> 關於霧社事件的常見敘述，可參見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第 60 卷 3 期，2010 年。

<sup>4</sup> 根據郭明正的意見，霧社群原本有近 40 個部落，日本人為便於統治劃分為 12 社，臨近舉事時減為 11 社。參加舉事的賽德克六社中，除了度魯灣社，均有各子部落。見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初版，第 137、160 頁。以下所引該書版本同。

密，形勢險要。歷史上，當地原住民依靠狩獵和山地農業為生，日本佔領臺灣後，於 1906 年派兵進入霧社地區進行討伐和實施威權統治，對原住民的社會文化造成了極大衝擊和威脅。原住民多次進行抵抗，均遭到日本軍警的殘酷鎮壓。日本統治者以霧社為台中州能高郡行政中心，修建了員警駐在所、員警分室、學校、診室、郵政、道路等設施，企圖將霧社打造成“理蕃政策”統治下的典範。然而，就在日本統治者為所謂“理蕃”成績沾沾自喜的時候，卻爆發了震驚國際的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發生於 1930 年 10 月 27 日，延續至當年的 12 月中旬左右。事發當日，以上述六社為主的 300 多名賽德克族男子在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Mona Rudaw）等人的帶領下，利用能高郡役所在霧社地區舉行聯合運動會的時機，對霧社地區各員警駐在所、員警分室、日人機構以及設立在霧社公學校的運動會場進行突襲，殺死日本人 134 名，殺傷 26 名，誤殺 2 名穿著和服的漢人，燒毀 13 所員警駐在所，繳獲槍支 180 挺、子彈 2.3 萬餘發。日本統治者調集數倍於舉事者的正規軍和員警，在飛機大炮等現代化武器的裝備下，對賽德克族六社展開瘋狂報復，甚至罔顧國際公約使用毒瓦斯。據統計，在事件中戰死或自縊或遇害或病亡的六社族人計 644 人，其中男性 332 人，女性 312 人。不僅如此，日本人還採取“以夷制夷”手段，以賞錢等形式唆使挑撥賽德克族其他部落參與圍剿，最終於 1931 年 4 月 25 日釀成慘烈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六社遺族計有 195 人在收容所遇害，19 人自殺。<sup>5</sup>至此，參與舉事的賽德克族六社僅有倖存者 298 人，近乎滅族。

霧社事件被鎮壓後，日本人於 1931 年 5 月 6 日將六社餘生者由海拔 1200 公尺的祖居地遷徙至海拔 420 公尺的北港溪與眉原溪匯流處，並將之命名為“川中島”，進行嚴格的監視和改造。但日本人仍難平心頭之恨，以所謂“和解式”和“家長會”的名義，於 1931 年 10 月 15 日和 16 日，分別將賽德克族六社餘生者中的青壯年及巴蘭、卡丘固和度咖南等其他社參與抗暴的數十名族人逮捕，隨後殺害。<sup>6</sup>

<sup>5</sup> 臺灣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社區“霧社事件餘生紀念館”資料，2014 年 4 月 27 日筆者拍攝。

<sup>6</sup> 在這次清算中遭到逮捕和殺害的賽德克族人數，估計在 30-50 人之間。參見郭明正

經過一系列的鎮壓、報復和清算，日本殖民統治者徹底摧毀了賽德克族的抗日力量。舉事六社餘生遺族家家痛失親人，戶戶殘缺不全，生活在極度的悲傷和絕望之中，不少人選擇自殺，或因疾病死亡，至 1937 年僅餘 230 人。日本統治者通過實施軍事化管理和皇民化運動，嚴格控制餘生遺族의思想和行爲。1937 年，日本人在“川中島”設立神祠，供族人祭祀。在這種情境之下，劫後餘生的賽德克人爲了保存部落僅有的人丁，忍辱負重，披荆斬棘，開墾荒地，在鄰近客家人和泰雅族眉原部落的幫助下，慢慢在“川中島”繁衍生存下來。而曾經的慘痛經歷及日本人的嚴密監視，使得餘生遺族集體選擇了“遺忘”，回避對霧社事件的談論和回憶，其後輩子孫對此事件竟至陌生。

1945 年日本投降之後，臺灣回歸祖國。1950 年，“川中島社”易名爲“清流部落”，隸屬於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清流部落以傳統務農爲主，部分從事建築業的體力勞動。隨著農業社會的變遷與轉型，部落原住民的就業壓力逐步增加，而 1999 年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無疑使原鄉地區的經濟發展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清流社區的賽德克族人開始重新審視原住民部落的整體發展及永續經營的觀念。他們除了踴躍參加各單位的基礎設施重建工作，亦積極開展各項軟體設施建設，包括部落人文史實的記錄、原住民傳統技藝的傳承等工作，用清流社區發展協會的話來說，“社區的居民逐漸凝聚一股共同參與社造的規劃來提升部落的生活環境的共識，一起打造如今清流部落”。<sup>7</sup>目前，清流部落約有 110 余戶居民，500 多人口，<sup>8</sup>他們努力朝著農業、人文、休閒、生態、原住民文化產業等方向發展，期待能夠營造一個永續發展的原住民部落。

---

《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227-228 頁。

<sup>7</sup>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清流社區發展協會·單位簡介》，懸掛於清流部落清流社區發展協會辦公樓大廳，2014 年 4 月 28 日筆者拍攝。

<sup>8</sup> 由於族際通婚的關係，今日清流部落居民並非全爲餘生後裔或賽德克族人；因工作關係遷出清流部落的餘生後裔也有近百人。見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271 頁。

## 二、霧社事件的歷史解讀：他者與自者的視角

霧社事件，無疑是 20 世紀 30 年代初期震驚國際的一次重大事件，不僅在當時引起極大關注和討論，時至今日仍然是學術界的一大熱點。而在臺灣島內和中國大陸，不同時期、不同物件和不同框架的解讀，其觀點有相似相近，也有相左相右，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

霧社事件爆發後，統治臺灣的日本殖民政府盡力推卸責任，而將事件的肇因歸到原住民身上。“根據臺灣總督府的調查報告，指出霧社事件並不是原住民對日帝的‘理蕃’政策上的個人恩怨，乃是‘蕃社’與生俱有之群體意識的排他性強，很難與異族和諧相處，對於外來的政權，不但採取不合作主義，而且愚昧地進行抗爭，因而視日本為異族，將之集體殺害。……日帝與其御用的史家們，在當時往往將霧社事件的真相故意地抹殺，而歸咎於‘蕃族野蠻的除草的惡習’。”<sup>9</sup>當時，日刊報紙對於不准派記者到霧社以及停止刊載有關事件原因的記事等強烈不滿，臺灣總督府於是花費共計 1.2 萬日圓，對那些獲准進入霧社的記者進行賄賂，藉由收買而使事件的報導沉靜下來。<sup>10</sup>而臺灣民眾對於原住民抗日壯舉的同情與頌揚，一樣遭到嚴苛的檢查。<sup>11</sup>

作為 19 世紀末從中國割讓出去的臺灣，大陸民眾並沒有將其忘記，更沒有視為與己無關的“他國”。霧社事件的發生同樣震撼了大陸，各類報刊雜誌紛紛報導，進行書寫和解讀。對此，戴國輝進行過詳細梳理，指出霧社事件的爆發可以說引起了中國大陸各界的注意，包括針對農民、學生、兒童、普通民眾教育的刊物，都轉發了關於此事件的新聞，並根據不同的讀者物件作了編輯和評論。認為報刊“用從來沒有過的形態，把（霧社）蜂起當新聞，連續加以報導，大舉刊登有關高山族的介紹性報導，啓蒙性論文，它的影響或許不容忽視”。<sup>12</sup>賈益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也依

<sup>9</sup> 布興·大立：《寧死不屈的原住民——霧社事件的故事神學》，嘉義，信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 頁。

<sup>10</sup> 吉良芳惠：《日本近現代史的霧社事件研究狀況——以元臺灣總督伊澤多喜男的資料集刊行為契機》，邱若山譯，載 Yabu Syat、許世楷、施正鋒主編《霧社事件——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前衛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1 頁。

<sup>11</sup> 參見賈益《近代中華民族認同與臺灣“原住民”少數民族身份的形成——以近代期刊資料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第 36 頁。

<sup>12</sup> 戴國輝：《霧社蜂起與中國革命——漢族系中國人社會內藏的少數民族問題》，載



據這些近代期刊資料，把當時大陸對霧社事件的解說放到“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進行分析。他認為，在臺灣民族革命的話語中，霧社事件無論在民族革命，還是漢“蕃”聯合的歷史敘述中，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尤其是在 1931 年九一八事件後，隨著中國大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臺灣民族運動的興起，臺灣人民的抗日運動被納入中國“抗日共同體”的鬥爭中進行書寫，以霧社事件為代表的漢、“蕃”聯合進行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成為這一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sup>13</sup>

臺灣光復後，國民黨當局將日本人設立於“川中島”的神祠廢除，並於 1950 年在神祠原址興建“餘生紀念碑”。1953 年，臺灣當局在霧社櫻台建“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及“碧血英風”牌坊，辟有多處歷史遺跡供人憑弔。1973 年，馬赫坡首領莫那魯道的骸骨被迎回霧社安葬。1995 年，立莫那魯道銅像於“霧社抗日事件紀念碑”園區。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後，仁愛鄉公所將餘生紀念碑加以改建，並建“霧社事件餘生紀念館”，將霧社事件及清流部落歷史發展之史料於館內公開展覽。可以說，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裡，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對霧社事件的解說主要沿襲著“抗日共同體”敘事的模式。

另一方面，由於曾經的傷痛以及複雜的原因，關於霧社事件的各種詮釋裡很難聽到來自賽德克族的聲音。姑目·荅芭絲（賽德克族）認為：“霧社事件爆發之後的賽德克部落，對於這個歷史事件有著不同的反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佔領臺灣之後，一股強烈的反日仇日的氣焰喧囂塵上躍上紀念日的舞臺。賽德克部落無論是仇日或是親日的立場，他們終究還是無法坦然地流露出他們心中愛恨情仇的情緒，霧社事件的歷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似乎成為耆老們心中難以碰觸的歷史禁忌，他們除了顧及到主流價值喧賓奪主的言論，同時他們不希望後代子孫承受這個歷史包袱。很多的口述資料透露他們只有在私密的空間，談論他們過往的這段歷史經驗。”<sup>14</sup>姑目·荅芭絲的確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如霧社事件對

---

戴國輝編著《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上冊，魏廷朝翻譯，臺北，國史館印行，2002 年，第 317 頁。

<sup>13</sup> 參見賈益《近代中華民族認同與臺灣“原住民”少數民族身份的形成——以近代期刊資料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第 33-49 頁。

<sup>14</sup> 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I），臺北，

賽德克族群關係的影響、抗日共同體敘事模式的限制等等。也正因為如此，在戰後的數十年時間裡，只有少數賽德克族的餘生遺族對霧社事件進行過書寫，其中高愛德和高永清於 20 世紀 80 年代在日本出版的回憶錄最受矚目，同時由於其精英的身份而導致評價不一。<sup>15</sup>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隨著臺灣政治解嚴和原住民運動興起，臺灣社會對於霧社事件的敘事出現了多元的聲音。臺灣學者周婉窈說道：“關於霧社事件的書寫、論述和研究，從戰後到現在累積不少作品，其間有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不同群體、不同世代、不同部落（和性別），及其和不同的政治、社會、文化條件交錯的結果。”<sup>16</sup>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嘗試從賽德克族人角度詮釋霧社事件的作品，如邱若龍的《霧社事件——臺灣第一部調查報告漫畫》（1990 年），鄧相揚的《霧重雲深——霧社事件後，一個泰雅家庭的故事》（1998 年）、《霧社事件》（1998 年）和《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2000 年），舞鶴的《餘生》（1999 年）。這些作品不再簡單地將霧社事件納入“抗日共同體”的敘事範疇，而是試圖從“內部”探索霧社事件。周婉窈認為他們的作品“將戰後臺灣人對霧社事件的認知提升到另一個層次”。<sup>17</sup>

與此同時，來自賽德克族內部的自我解讀亦逐步升溫。2000 年，在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主辦的“霧社事件 7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賽德克族的內部觀點得到集中展現。<sup>18</sup>以此為標誌，不僅六社餘生的遺老們努力揭開塵封已久的記憶，賽德克族其他部落的耆老們也頻頻發聲，從傳統的社會結構、文化信仰、經濟生活以及女性觀點等諸多層面，

---

翰廬圖書，2004 年初版，第 338 頁。

<sup>15</sup> 高愛德和高永清的回憶錄分別為《証言霧社事件——台灣山地人の抗日蜂起》（アウイヘツパハ著、許介麟編，東京，草風館，1985 年）和《霧社緋櫻の狂い咲き——虐殺事件生き残りの証言》（ピピワリス著、加藤実編譯，東京，教文館，1988 年）。其評價參見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 卷 3 期，2010 年。

<sup>16</sup> 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 卷 3 期，2010 年。

<sup>17</sup> 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 卷 3 期，2010 年。

<sup>18</sup> 參見 Yabu Syat、許世楷、施正鋒主編《霧社事件——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前衛出版社 2001 年版。

對霧社事件進行書寫，從而使霧社事件的敘事呈現出更加多元的視角。在這些關於霧社事件的敘事中，賽德克族的族群關係始終無法繞開，並導致其內部對於霧社事件的不同認知。譬如六社之外的其他部落可能不會將莫那魯道當作是英雄人物，甚至覺得霧社事件紀念日的活動不利於族群關係的改善，因而提出舉行賽德克族部落傳統和解祭儀式的倡議。<sup>19</sup>對此，六社餘生後裔也發表了觀點，認為凡是經歷霧社事件中的賽德克人不論是 Toda 群、Tgdaya 群、Truku 群，或是親日、抗日，在這場事件中都是受害者。“我們非常樂見也非常尊重對霧社抗日事件的各種不同見解；但是歷史不能篡改，歷史不容曲解，‘錯誤的見解’將對捐軀的祖先們極大的誣蔑，也將挑起族群對立的亂源。”<sup>20</sup>正如他們在為祖先英靈祈禱時所說：

“你們所創下的壯舉，實在是難以筆墨來形容，您們反壓迫、反奴役的成就，是無法超越的。不論當時日帝政權是如何的欺侮我們，您們透過我族祖訓 gaya 予以重擊，雖然我們獻出了無數先人及兄弟姐妹的寶貴生命，那是為我族祖訓尊嚴而戰不可避免的。身為爾等後輩的我們，將秉持著您們的精神生存下去，決不懼怕、退縮。我們會將您們光榮的事蹟，永遠記在我們內心深處，並傳知我們的萬世子孫，讓您們護佑我們，引導我們直到永遠。”<sup>21</sup>

### 三、《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的主要論點

《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以下簡稱《又見真相》）由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11 月出版發行。該書作者漢名郭明正，族名 Dakis Pawan。這是近年關於霧社事件調查與研究的影響非凡的著作，其特殊意義不僅在於它是近年來第一本由賽德克族人撰寫的霧社事件中文著作，更在於它與舉事餘生遺族密切相關。換句話說，該書是一

<sup>19</sup> 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I），臺北，翰盧圖書，2004 年初版，第 306、323-338、350 頁。

<sup>20</sup> 林文德：《霧社事件影響賽德克三群間族群關係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第 136 頁。

<sup>21</sup> 邱建堂撰：《為英勇祖先祈禱文》，2014 年 4 月 27 日筆者拍攝于清流社區“霧社事件餘生紀念館”展廳。

本通過採訪餘生族人遺老撰寫而成的著作，其作者也是出生于 20 世紀 50 年代的馬赫坡社第二代餘生後裔。

《又見真相》的資料準備及撰寫過程長達 20 餘年，其殺青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之後，社會上關於霧社事件的討論正沸沸揚揚。實際上，郭明正作為賽德克族歷史及賽德克語的指導，全程參與了《賽德克·巴萊》的拍攝，並將拍攝感悟記錄下來，形成《真相·巴萊》一書，作為該電影上映之前宣傳活動的組成部分而推出，並產生極大反響。針對社會上關於霧社事件以及賽德克族的討論，郭明正將多年來對族人遺老的追訪，加入個人的思考及觀點，撰寫為《又見真相》一書，謂其目的為“記錄遺老的餘音，傳續族群的文化”<sup>22</sup>。實際上，該書不僅僅是對族人遺老的回憶的記錄，更是反映了其所代表的戰後出生，特別是 20 世紀 80 年代臺灣政治解嚴後成長起來的一代賽德克族知識份子對“我族”歷史與文化的認知和解讀。

該書以問答形式鋪陳開來，其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即“賽德克族的文化與生活”、“賽德克族的歷史與傳說”、“霧社抗暴事件”、“重生”，最後是結語和附錄。從書的結構可以看出，作者力圖通過這樣一種安排，希望讀者在全面瞭解賽德克族文化與歷史的基礎上，去解讀霧社事件及其對餘生遺族的影響。而霧社事件的起因、霧社事件對賽德克族群關係的影響、對莫那魯道的評價等等，是當前霧社事件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要點，也是《又見真相》一書著墨頗多的部分。

關於霧社事件的起因，在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包括奴役、壓榨和以夷制夷等，這一點已經取得共識。即使是事件中的“味方蕃”（親日蕃）都達部落族人也不否認。近年來，由於賽德克族知識份子的崛起，以及民族意識的復興，學術界對賽德克族人抗日原因的解讀，有了更深的視角，如從文化的差異（部落制度、祖靈信仰、狩獵文化、獵首習俗等等）來探究。《又見真相》通過對賽德克族社會結構和文化特點的詳細解讀，進一步闡明瞭霧社事件的起因。作者多次表明，傳統社會瓦解、傳統文化 Gaya 崩塌，是霧社事件爆發的深層原因。“對於‘以 Gaya 立族’的賽德克人而言，Gaya 是本族的族律、社會規範，是族群的生存法則。然而，

<sup>22</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自序”，第 22 頁。

日人佔領我們的土地、以殺戮方式強收族中男子視為第二生命的獵槍、無視我們的傳統祭儀活動、玩弄部落婦女於淫威之下、公然燒殺部落族人及奴役族人等行爲，無一不觸犯本族恪守的 Gaya。對賽德克族人而言，凡擾我部落、越我領域者唯獵首之，因為保護部落、捍衛傳統領域是 Gaya 賴以承繼的基石；僅就日人‘佔領土地’一事，先祖們即足以透過 Gaya 懲戒入侵的日本人”<sup>23</sup>。作者還申明，霧社事件是“居住於霧社地區的原住民遭受殖民政權的壓迫及奴役，爲了爭取平等、爭取民族尊嚴，因而起義抗暴”的舉動。<sup>24</sup>從傳統社會資源中挖掘根源，將事件定性爲“抗暴”，似乎都是爲了避免“抗日共同體”的敘事模式，而突出原住民的主體性，並表明對“我族”歷史的自我體認。

如何看待臺灣原住民的族群關係，以及霧社事件給族群關係造成的傷害，是霧社事件研究中的一大難題。在“抗日共同體”的敘事模式中，這一問題往往被忽略或有意回避。直到“部落”發聲的時代，人們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又見真相》如此說：“‘霧社事件’固然是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與日本殖民者之間直接衝突的歷史事件，但它也牽連了當時埔裡和霧社地區的許多族群，尤其牽動著賽德克族內部三語群之間的族群情結；不論是來自外部或發自內部的族群芥蒂，真可謂剪不斷、理還亂，實非三言兩語、你說我道即可講得清楚、說得明白。”<sup>25</sup>作爲抗日部落的餘生後裔，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來對這一問題進行說明和解釋，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首先，作者試圖通過闡釋賽德克族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特點，來理解霧社事件中的族群關係。他認爲：“強烈的部落意識是賽德克族傳統生活的重心，部落型態的組成基礎及族人的互動模式，都是透過部落的凝聚而形成”；“‘部落意識’是賽德克族人堅守的認同，是堅定捍衛的集體共識，舉凡族內公共事務皆以‘部落’爲核心單位。若以現代的行政用語來描述，部落是一個獨立自主、獨立行使自治權的行政單位”。<sup>26</sup>他甚至把

<sup>23</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45 頁。

<sup>24</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34 頁。

<sup>25</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275 頁。

<sup>26</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34、39 頁。

這些部落視同“國”，“在部落時代，各個族群之間的關係猶如‘國與國’的關係”<sup>27</sup>。而在過去的年代裡，各族基於族群的繁衍與發展，就會面對他族的競爭，從而導致不同族群之間經常處於敵對狀態。<sup>28</sup>不過，在族律的規範中，除非周邊族群恃武來犯，強佔其傳統領域或越區狩獵，否則賽德克人不會隨意起兵攻打周邊族群，或者佔領別人的部落。“不論是族群內部或與其他周邊族群所引發的爭端，賽德克人終究會透過‘饗宴、賠補’的儀式，以彌平、解決雙方的爭議”。<sup>29</sup>

因此，作者認為賽德克族的三個語群（即德固達雅群、都達群和德路固群），尤其是前二個語群之間，沒有所謂的“世仇”問題。“現今非原住民的一般人，無論是否曾有原住民經驗，都常以主觀的認定，隨口說出‘原住民之間哪一族與哪一族是‘世仇’，這樣的說法是原住民難以接受的。”<sup>30</sup>他進一步指出，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後，餘生者從未憎恨襲擊六社遺族的都達人，或伺機報復他們。相反，數十年來餘生遺族與都達人的通婚不曾間斷。<sup>31</sup>以此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符合事實。

那麼，如何解釋“第二次霧社事件”的發生？作者認為部落時代各個族群之間互不統屬的關係，“卻在日人的巧詐利用、撥弄之下，成為治台‘理蕃’的利器，即‘以蕃制蕃’、‘以夷制夷’。”<sup>32</sup>作者指出，“以夷制夷”是日本人慣用的統治手段，例如在霧社地區，1903 年的姊妹原誘殺案，“實際上這是日方以慣用的‘借刀殺人’伎倆，利用布農族人與德固達雅人之間的競爭之心所獲得的‘成果’”；1920 年的紗拉茂事件，“日警為了平定這次事件，再次運用‘以蕃制蕃’的伎倆，派遣泰雅族人和賽德克族霧社群（德固達雅群）族人前往紗拉茂地區”參與鎮壓。<sup>33</sup>及至霧社事件發生，“都達與德路固人在日方的慫恿、離間及懸賞金的利誘下，紛紛加入‘以蕃制蕃’的獵首行動。當然並非所有的都達與德路

<sup>27</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43 頁。

<sup>28</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39 頁。

<sup>29</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39 頁。

<sup>30</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39 頁。

<sup>31</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40 頁。

<sup>32</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43 頁。

<sup>33</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 121-131 頁。

固人都支持這次行動，但往後都得背負著‘味方蕃’（親日蕃）的罵名”。<sup>34</sup>

作者對於歷史上屢次發生的族群問題，也頗感傷痛並發出吶喊：“我不禁要問，每每有外力介入原住民族之間的傳統競爭時，我們怎麼總是輕而易舉地受到外來者的挑動，引起族群之間的衝突？究竟原住民各族群之間的矛盾何在？原住民容易受到操弄是族群的特質嗎？抑或原住民何辜？這類問題，實在需要今日的臺灣原住民一起來省思。”<sup>35</sup>作者的吶喊，實則表達出謀求族群關係和諧的強烈願望。

關於莫那魯道的評價，作者力圖表明態度而又言辭謹慎。作者提出：“就如同有人問到：‘莫那·魯道究竟是民族英雄，抑或民族罪人？’賽德克族人亦有不同的解讀與不同的疑惑。”<sup>36</sup>作者通過為瓦曆斯·布尼正名，婉轉地批評了“抗日共同體”敘事模式的局限。瓦曆斯·布尼是賽德克族巴蘭社鹿澤子部落頭目，也是德固達雅群‘播種祭師’的嫡系主祭者。在霧社抗暴事件中，瓦曆斯·布尼採取“主和”的立場，不贊同攻擊日本人，也極力勸阻巴蘭部落族人參與抗暴行動。而發生霧社事件後，日人有意殲滅起義抗暴六個社餘生者，瓦曆斯·布尼極力居中斡旋，日人終於同意採取“迫遷川中島”的提案。作者感歎：“今日，清流部落族人之所以能夠浴火重生，且維繫了抗暴遺族的生機，瓦曆斯·布尼的歷史抉擇是德固達雅後世子孫不可或忘的。”<sup>37</sup>因此，作者認為“論及對德固達雅群的貢獻，瓦曆斯·布尼絕不遜于莫那·魯道，他倆在世時，瓦曆斯·布尼的社會地位也高於莫那·魯道。戰後以來，執政者盡是突顯‘霧社事件’中的莫那·魯道，而高居德固達雅群總頭目之位的瓦曆斯·布尼，反倒漸漸淹沒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中”<sup>38</sup>。通過對瓦曆斯·布尼的高度評價，作者表達出霧社事件的書寫不應只有過去所熟知的莫那·魯道，而是六社一千多族人的總體抗暴行動，今日清流部落的每個家庭都傳述著各自的悲歡故事。這也體現了其寫作此書所基於的“若能彙集清流部落每個家族的霧社事件點

<sup>34</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204頁。

<sup>35</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118-119頁。

<sup>36</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202頁。

<sup>37</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141、141-142頁。

<sup>38</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142頁。

滴史，或可成為‘霧社事件’最有力的證言”之信念。<sup>39</sup>

#### 四、結語

薩義德在其《東方學》卷首題詞中引用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政變記》中的一句話：“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人表述。”<sup>40</sup>或許罕有比這句說辭更能揭示“主體性”的價值及其缺失。通過霧社事件餘生遺族的歷史記憶，不僅能夠彌補以往這一事件的書寫與敘事中“主體性”缺失的遺憾，也使這些歷史記憶所帶來的自我認識的歷史觀得以集中展現。

在人類社會中，歷史記憶普遍存在，而對於弱小民族及無文字民族，歷史記憶的價值無法估量。近年來，隨著歷史人類學的興起，以及口述史的繁盛，歷史記憶（或曰集體記憶、社會記憶）研究蔚然成風。然而，歷史記憶並不完全等於歷史，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這種社會建構，如果不是全部，那麼也是主要由現在的關注所型塑的”<sup>41</sup>。康納頓則進一步指出：“控制一個社會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利的等級。”<sup>42</sup>因此，建構和敘述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也就是社會記憶是為支持現存社會秩序合法化即當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秩序的權力關係而服務的。與霧社事件歷史記憶建構有關的各種努力，同樣存在這一現象，例如各種解釋中的功利說、都達人對紀念日的不平衡等，姑目·荅芭絲在自己的著作中就直截了當地說：“挖掘記憶換回的不是歷史的再現，挖掘記憶其實是在重塑歷史。”<sup>43</sup>

<sup>39</sup> 郭明正：《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第172頁。

<sup>40</sup> [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初版，扉頁。

<sup>41</sup>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93、106頁。

<sup>42</sup> [美]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sup>43</sup> Kumu Tapas（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I），臺北，翰廬圖書，2004年初版，第1頁。



賈益在其關於“近代中華民族認同與臺灣‘原住民’少數民族身份的形成”的研究中，基於其對民族認同的理解，側重於一種關於身份的集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表現為關於現代民族及其成員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一套意義系統（也即一套敘事），包括固有的文化、歷史，重要的社會結構和符號象徵體系，並通過民族國家或者參與民族認同建構的個人以能夠被群體成員所理解、解釋，甚至內化的方式加以說明”。<sup>44</sup>從賽德克族的傳統文化中，我們能夠發現其身份的集體意識同樣表現為一套意義系統，特別是其祖靈信仰（Utrux）和社會規範（Gaya），對他們的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我們對霧社事件的認識或許會更加深入。

目前，“自我與他者”已構成當代人類學理論、文學乃至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命題，用“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取代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在對待異族或異國文化時，不再強調主次或主客之分；研究中闡釋者同物件的關係，不再是人與物的關係，而是“我與你”式的對話、交談和聆聽。<sup>45</sup>這些現象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根本觀念的轉變。歷史發展到今天，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體現世界多樣性的不同地域、民族、人種、制度、信仰、文化等等諸多代表異質性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我們認為，尊重差異，是當前國際上解決民族問題和族際衝突的先進觀念和積極主張。所謂尊重差異，就是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差異，達成和而不同的共生共榮。霧社事件餘生遺族的歷史記憶，為我們瞭解和研究霧社事件開啓了一扇具有重要價值的視窗。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賈益博士提供相關研究資料，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

（本文於 2015 年 2 月投稿，於 2015 年 3 月 2 日審查通過）

<sup>44</sup> 賈益：《近代中華民族認同與臺灣“原住民”少數民族身份的形成——以近代期刊資料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 年，第 10-11 頁。

<sup>45</sup> 參見盧曉輝：《自我與他者——文化人類學的新視野》，《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0 年第 2 期。

## 從中俄雅克薩之戰到黑瞎子島歸還

劉學鈞

前中原、輔大、文大兼任教授、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

### 摘要

在我國東北黑龍江與烏蘇黑江匯合處，江面寬廣，其中有一個島，稱黑瞎子島，此島時有黑熊出沒，東北人稱黑熊為黑瞎子，由是得名，地理上稱撫遠三角洲，東西最長處約有五十公里，南北最寬處約有十多公里，全島面積約有四百平方公里，比長江口的崇明島還大，比台北市的二百七十二平方公里更是不可相提並論。此島自 1929 年被蘇聯強行侵占後，經過漫長的八十年，終於在 2005 年中共與俄羅斯簽定《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議》，俄國同意將下瞎子島之半交還中共。按自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後，俄國藉由各種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領土約一百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約有四十個台灣大），最後只要回黑瞎子島之半（實際上尚不及一半，只有一百七十餘平方公里），因此大陸人民頗有不以為然者，也有認為能要回一點是一點，沒能要回的將來再說，也算相當務實。由於黑瞎子島位處中國大陸最東北處，黑龍江與伯力（俄國稱哈巴羅夫斯克）相對，國人鮮少注意到，但是國家領土被侵占的歷史不能因其位處邊陲而不予注意，本文擬就既有少量資料，對從雅克薩之戰到黑瞎子島歸還作一敘述。

**關鍵字：**雅克薩之戰、尼布楚條約、黑瞎子島

## 一、俄羅斯東侵與清廷之反應

蒙古自鐵木真成吉思汗崛起建立「伊克、蒙兀兒、烏魯斯」（大蒙古國）後，大事向外擴張，草原游牧民族向有向外擴大張的天性，這點與其所處的沙漠草原生存空間的自然生態，有密切關聯，也就是說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受其生存空間自然條件所制約，沙漠有向外擴張的天性，會吞噬草原，依賴草原游牧為生的民族，必須不停息地尋覓新草原以維持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試看有史以來的草原游牧民族，自匈奴、鮮卑、柔然、嚙噠、高車、突厥……以至蒙古，無不是不停的向外擴張，北亞洲最後一波游牧民族蒙古於十三世紀崛起後，其大汗成吉思汗本諸歷史所賦予向外擴張的天性，命其長子朮赤向北討伐眾多的林木中百姓，一路向西北挺進，所向無敵，掩有今西北利亞西部，歐俄及波蘭之一部分，由於朮赤早逝，由其次子巴都（或作拔都、巴禿，皆係蒙語「英雄」之意譯）在此廣袤地區建立金帳汗國（或作欽察汗國），從此蒙古人統治俄羅斯兩百多年，使斯拉夫人染上草原游牧民族向外無限擴張之習性，曾有西方史家稱：把斯拉夫人剝了皮，就是韃靼人，實指其向外擴張之野心，與草原游牧民族毫無不同。

俄羅斯其後推翻金帳汗國，建立莫斯科公國，西元 1547 年伊凡四世（1533~1584 年在位）加冕為全俄羅斯沙皇，從此俄羅斯也稱沙俄。事實上當伊凡三世推翻金帳汗國後，就開始向外擴張，越過烏拉山北段，掠奪鄂畢河下游西部地區；伊凡四世時更是大舉東掠，1581 年沙俄哥薩克頭目耶爾馬克率軍東侵，征服昔班汗國（巴都建金帳汗國時，以東部地區賜其胞兄斡爾達建立青帳汗國，青帳汗國後來分化為白帳汗國、昔班汗國；昔班汗國音近西比爾，所以又稱西比爾汗國，甚至有訛為西伯利汗國<sup>1</sup>），從此一路向東侵掠，如所周知有明一代除開國君王明太祖朱元璋及成祖朱棣之外，幾無明君，但知享樂毫無作為，對於俄羅斯之向東侵掠，竟然毫無知覺，自是談不上如何防堵沙俄之東侵。

稍後十七世紀初，分布於白山黑水之女真族，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統一女真諸部，於西元 1616 年在赫圖阿拉即位，建國號為後金，建元天

---

<sup>1</sup> 有關昔班或西比爾汗國進一步內容，可參看劉學銑《西比爾蒙古汗國》一文，該文輯入劉著《蒙古論叢》，台北金蘭文化出版社，1982 年，頁 270~274。

命，此時明朝內則盜匪遍地，外則後金虎視眈眈，準備問鼎中原，取明廷而代之，及至 1636 年（明思宗朱由檢崇禎九年），後金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爲清（此因女真完顏氏之金朝，在國史上評價不高，故易後金爲清），此時俄羅斯力量幾已到達西北利亞東端瀕臨鄂霍次克海，但貝加爾湖以至額爾古納河（亦黑龍江上游）之間仍屬中國所有。

西元 1640 年（明崇禎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極崇德五年），沙俄派哥薩克人（非哈薩克）保耀可夫（Poyarkoff）向中國黑龍江一帶進行侵略，而此年流寇張獻忠攻陷四川，李自成進入河南，清軍則下鄂爾多斯高原（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2001 年改市之前爲伊克昭盟），此際明朝可說是遍地烽火一片混亂，清朝雖日漸壯大，但尚未入關，明、清兩者均無力北向禦俄，當時保耀可夫雖只有官兵 127 人，譯員二人、鍛工一人，但持新式武器，仍能一路向黑龍江北岸挺進，而進入黑龍江與松花江會合處費雅克人聚居地方<sup>2</sup>，憑其優勢武器征服費雅克人，此一百多人就在當地暫住，至 1645 年（清順治二年，清已入關，定都北京，此年史可法死，清軍攻入南京），此際清廷正忙於消滅明朝殘餘勢力、致力於國家的統一，一時之間既無心也無力注意到北方的俄羅斯。

俄羅斯保耀可夫東來之後，又有哈巴羅夫（Ataman Habarov）率兵到黑龍江一帶，爲求得到更大利益，請求沙皇派遣軍隊六千人東來占領此一廣大地區，在沙俄大軍尚未東來之前，當地土著索倫族酋長洛夫加<sup>3</sup>曾率領族人奮勇抵抗，奈以武器落後而告失敗，俄羅斯人遂在當地建一小鎮名爲阿爾巴青（Albazin），但他們也知此地乃中國領土，必得中國政府認可才能合法長期居留，以是在 1654 年（清順治十一年）兩度派人到北京刺探中國政府情況，以便作更進一步的侵略，此時清朝已警覺到其龍興之地已然不寧，及至清康熙九年（1670 年），清廷曾兩度派人赴俄提出交涉，促其約束俄人不得在中國邊境製造問題，但俄羅竟然趁勢派出使者隨同清廷所派之人來到北京，希望中俄兩國劃定邊界並進行通商等要求，清

<sup>2</sup> 費雅克或作費雅喀，爲通古斯族之一支（通古斯非東胡），爲古肅慎系民族與女真族有血緣上之關係。

<sup>3</sup> 索倫係打牲部落，後爲滿族之一支，於清乾隆平定準噶爾之亂後，將索倫部派往新疆駐防，其後人至今仍在新疆。

廷均不同意，但此後俄羅斯更加緊其侵華行動，清廷此時面對吳三桂等三藩日益坐大（另兩藩爲尚可喜、耿精忠），台灣的鄭成功父子倡言反清復明，而西部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聲勢日盛，凡此都必須先予處理，如不能安內，將何以攘外，因此對俄羅斯之東侵，只能囑付東北地方官嚴加防範，並無出兵討伐的打算。

及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三藩之亂大致已平，台灣鄭成功父子先後亡故，由年僅十二歲之鄭克塽襲延平郡王（時在康熙二十年），台灣內部已有不穩情況，海疆情勢已在掌控之中，而康熙似已探知準噶爾部噶爾丹暗中勾結俄羅斯向東寇掠，因此準噶爾與俄羅斯雖爲兩事，實爲一體，而此時（1682 年）俄人已築雅克薩城以爲據點（此城今爲俄國阿爾巴津），因此康熙認爲必須加以抑制，否則會由蠶食而鯨吞，清廷派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等前往雅克薩一帶巡察俄國侵擾情形，同年底郎談奏明俄國犯邊情形，康熙乃命調兵演習、置造船艦製槍鑄砲、屯田備糧、增設驛站等戰爭的前置作業，同時建黑龍江（今瑯琿）、呼馬爾（今呼瑪）二木城，並派寧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前往此二城，次年（1683）又命在此二城之間建額蘇里木城（其地在今黑龍江省黑河縣北），並命寧古塔將軍仍駐烏喇（今吉林省吉林市）、副都統薩布素、瓦禮祐統兵往黑龍江城，此爲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之事，同年閏六月，俄軍頭目梅利尼克（或作機里郭禮）率六十七名兵丁，從雅克薩沿江而下，航至額蘇里地方被清軍包圍，梅利尼克等投降，清軍相繼收復雅克薩外圍之多倫禪、西林穆賓斯克及結雅斯克等地。清廷鑑於事態漸趨嚴重，必須加強部署，於此年（1683 年）九月設置黑龍江將軍使駐黑龍江城（今瑯琿），以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並令副都統穆素於次年（1684 年）三月率兵往修黑龍江城，自是從吉林至黑龍江設有十個驛站，以解決未來中俄一旦發生戰爭，物資的運補問題。

## 二、雅克薩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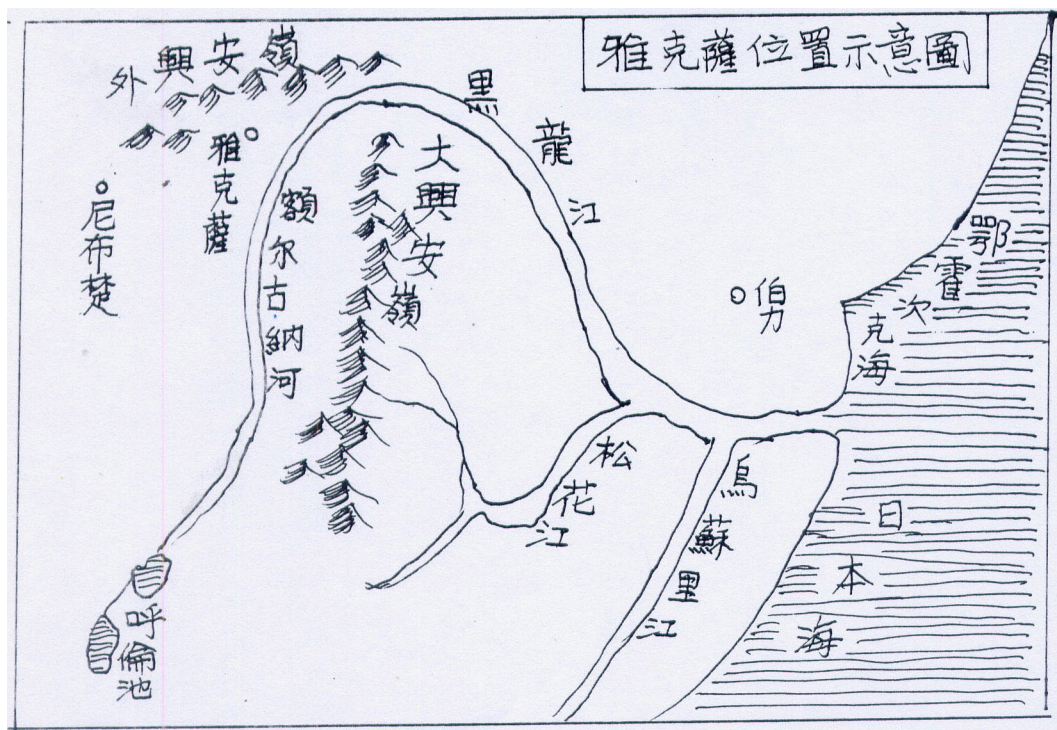
俄羅斯方面可能根本未察覺清廷已在備戰，停留在雅克薩、尼布楚的俄軍仍然不時擾邊，被中國沿邊土著民族（今多稱之爲世居民族）奇勒爾族（亦通古斯之一支）的奚魯噶奴等、鄂倫春族（習稱之爲使鹿部）的朱

爾鏗格等以及費雅克人（以上三族後來都納入廣義的滿族，至今內蒙古自治區仍有鄂倫春自治旗）起而抵抗，擊殺頗多俄兵，此時（1684）除尼布楚、雅克薩二地還留有俄軍外，黑龍江中、下游基本上無俄軍蹤跡。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正月，清廷命黑龍江將薩布素等回奏可於四月底江水解凍後，水陸並進到雅克薩城，對俄軍進行招撫，如不成，則以武力攻城，如果攻不下雅克薩城，則毀其田禾回師。朝議從之，康熙又告諭薩布素等說：

「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剎（清稱俄羅斯為羅剎）無故犯邊，收我逋亡，後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雅喀（即上文之費雅克）、奇勒爾諸地，不寧遑處。剽劫人口、搶虜村莊，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剎竟不報命，反深入赫哲飛雅喀一帶，擾害益甚。爰發兵黑龍江，扼其來往之路，羅剎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翦滅。今仰副天心，大兵逼臨雅克薩城，姑再以朕諭旨，遣人宣布羅剎，倘仍行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

於是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及佟實等參贊軍務，命建議侯林興珠、都督何佑等率福建籐牌軍（按台灣於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降清，於是年八月將台灣納版圖，初未設省，歸福建省管轄，福建之籐牌兵中應有台灣兵勇，而且極可能有台灣原住民族），並調直隸（今河北省）、山東、山西、河南等省火器兵前往協攻，又命蒙古科爾沁十旗（即漠南蒙古哲里木盟十旗，以其地處松遼平原，北距黑龍江較近，按當時尚未綏服漠北喀爾喀蒙古，也無內、外蒙古之名稱）送牛羊到黑龍江軍前以供軍需，顯然清廷已有作戰決心（雅克薩、尼布楚位置見所附圖）。同年（1685 年）四月清都統公彭春、都統郎談、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率滿、蒙、漢等官兵三千多人，由水陸兩路分出黑龍江城（今瑯珪）、卜魁城（今齊齊哈爾）向雅克薩出發，彭春等軍抵雅克薩城下，即向俄軍發出咨文，要求俄軍退出雅克薩城，歸還逃人，中俄雙方以雅庫（今俄國雅庫次克）為界；但為俄方拒絕。四月二十三日清軍開始佈陣，以「神威無敵大將軍」火炮置於陣前，並列置火器兵於其後，越明日、俄軍守將托爾布津（Alexei, Tolbuzin 或譯為圖爾布青）見不能勝，乃向後方乞援，於是有哥

薩克伯伊頓（Beiton）率六百多人前來支援，此六百餘人乘筏順黑龍江而下，而林興珠所率之籐牌兵激游江中，頭頂籐牌，手持扁刀、奮力殺敵，哥薩克兵勢絀而敗，是日晚間清軍水陸並進四面圍攻，經過一晝夜之鏖戰，俄軍傷亡慘重，二十六日，清軍郎談令積柴焚城，俄軍眼見即將走投無路，只得出城乞降，托爾布津誓言不再回雅克薩城，彭春將托爾布津及其所屬官兵、婦女、孩童全部釋放，於是清軍收復雅克薩城，俄羅斯殘兵敗將退回尼布楚（今俄國之涅爾琴斯克），清軍也班師回黑龍江城，雅克薩之戰暫告一段落，時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八月。



當俄軍托爾布津得知清廷大軍撤離雅克城後（此人前曾誓言不再回雅克薩城），於 1686 年春，又帶領五百多人重返雅克薩修築城堡，清廷得悉此事，又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率所部官兵前往攻打雅克薩城，共出動官兵二千一百多人，於是年五月二十八日，水陸兩路會師查克丹，逼近雅克薩城，俄軍退入要塞，挖地穴居，負隅死守，薩布素要求俄軍投降，托布爾津不作回應，至六月初薩布素下令攻城，郎談從北方以「紅衣大砲」向城中射擊，班達爾沙領步騎自南面猛，從夜至晝未曾停息，想來城內必然受創頗重，俄軍先後五度出城迎戰，想擊退清軍，但都被清軍逼回城

內，之後，薩布素命在城外三面掘壕築壘，壕外設木椿鹿角，分汛防禦，城西對江布水師，封鎖從尼布楚方向來援俄軍之航道，且雅克薩城中無井，城中飲水靠通向黑龍江之水道引水入城，雙方邀戰四晝夜，切斷城內水源，並以「神威無敵大將軍」大砲猛轟城內，俄指軍官托布爾津中彈斃命，由伯伊頓續任指揮官，雅克薩城被圍攻數月，缺水少柴，糧罄彈絕，官兵死傷殆盡，兼以發生瘟疫，眼見就要被完全殲滅，但因之前俄國曾派遣文紐可夫與法沃羅夫為使到北京，「乞撤雅克薩之圍」又有荷蘭使者從中斡旋，康熙別有考量，乃於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令薩布素撤回雅克薩之兵，但仍列陣於城外江邊，通知城內俄軍可以自由出入，等候俄羅斯使者到來再作定奪，同時清廷又派太醫到雅克薩城為俄軍治病，而且發給糧食以濟其困。歷時兩年之久的第二次雅克薩之戰在康熙刻意片面示好的情況下，劃下句點。

### 三、五世達賴鼓動噶爾丹東掠

在上述清軍情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本可一鼓作氣再度拿下雅克薩城，何以竟在俄使請求、荷使斡旋下，突然叫停，撤了雅克薩城之圍，不僅如此，更對雅克薩城內俄軍濟之以糧食，施之以醫藥，此種片面示好作為，必然有其用意，縱觀國史上幾百個帝王中，康熙可說是睿智天生，其高瞻遠矚的能力可說是百年難得一見，憑其敏銳之政治嗅覺，似已嗅出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聲勢日益壯大，且其人個性梟桀難馴，而又野心勃勃，雖仍不時「入貢」，但「貢使」往往多達兩、三千人，意在討賞及興販有無，更有不臣之心，如不予抑制，終將禍起蕭牆，康熙甚至已察覺噶爾丹可能與俄羅斯勾結<sup>4</sup>，彼此都向東侵掠，使清無法兩面作戰，康熙權衡利害後，認為準噶爾問題較俄羅斯問題更為嚴重，如不能妥善解決，一旦準噶爾坐大，漠南已歸附的各部蒙古，極可能受到影響，而漠南各部蒙古與北京近在咫尺，因而對俄羅斯先予妥協，趁雅克薩戰勝之聲勢，在談判時居有利位，中俄一旦簽妥和平條約，便可全力對付準噶爾，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問題，因此才會在雅克薩戰勝隨時可奪取之時，突然叫停，

<sup>4</sup> 關於噶爾丹勾結俄羅斯一事，其詳情可參看俄、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以及之後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的原因所在。

在探討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之前，似宜先把準噶爾部噶爾丹問題加以敘述，才能釐清中俄何以要簽該條約，事情必須追溯到自元帝脫懽帖睦爾（即漢文史料所稱之元順帝，但蒙文史料不承認明朝所諡的「順帝」之號，另諡之為元惠宗）退出大都之後，蒙古本支的力量日漸衰微<sup>5</sup>，而蒙古別支也就是衛拉特（明代稱之為瓦喇）力量則日就壯大，衛拉特主要分為四部：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此部為蒙古本支），另有輝特力量較小，明末以來衛拉特中以準噶爾部力量最為強大（「準噶爾」係蒙語「左」之意，以其牧地在左邊，故稱之為準噶爾部），時常為爭奪牧地而彼此不睦，因此大約在十七世紀初，土爾扈特部舉部西徙到裏海之北伏爾迦河東西兩岸駐牧，和碩特部則徙牧青海，土爾扈特部徙離國境，輝特部遞之，衛拉特仍為四部，清時稱之為厄魯特（或作額魯特），清初準噶爾部首長為巴圖爾鴻台吉，其第六子為噶爾丹，送到西藏當喇嘛，時西藏喇嘛教格魯派已是五世達賴喇嘛掌握政教兩權，仍想擴張其喇嘛王國版圖，因此對於準噶爾首長巴圖爾鴻台吉之子噶爾丹到自己門下出家當喇嘛，認為此乃「奇貨」，既是奇貨，就必須好好運用，噶爾丹甫當喇嘛，隨即給予「呼圖克圖」尊號<sup>6</sup>，可見佛門所說的眾生平等，到了五世達賴喇嘛眼中眾生未必平等；噶爾丹在藏期間，雖著袈裟，但心在塵世，據梁玠所著《西陲今略》卷七《噶爾旦傳》（按噶爾旦即噶爾丹）所載：「（噶爾丹）不甚學梵書（泛指佛經），顧時時取短檠摩弄」，可見噶爾丹絕非潛心向佛之人，試想一個出家喇嘛時常玩弄短檠的畫面，是如何可笑，但噶爾丹對當時大環境有頗為深入之瞭解，深知新興之女真大清帝國既已綏服漠諸部蒙古，雄踞準噶爾之東，且有北向西進之意，準噶爾無力纓其鋒，而俄羅斯位於其西及北，正積極向西北利亞東進，準噶爾為求自保兼求壯大，唯有向積弱不振且陷於內訌之漠北喀爾喀三汗進攻，奪

<sup>5</sup> 所謂蒙古本支是指自始就是蒙古族者，《元史》稱之為黑韃韃；其原非蒙古後被征服歸附於蒙古而蒙古化的各族，稱蒙古別支，如汪古部、克烈部、斡林木中百姓等都屬蒙古別支，《元史》稱之為白韃韃或野韃韃。

<sup>6</sup> 按「呼圖克圖」乃喇嘛教中極尊貴之稱謂，原係蒙古意為「明心見性，生死自主」詳解則為「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世再來」，見胡耐安《邊疆民族志》，蒙藏委員會，1970年，頁93。質言之，就是俗稱之轉世活佛。

得其地，南向威脅清廷，欲達到此目的，又必北向聯絡俄羅斯，雙方結盟同時向東擴張，清廷勢必因備多而力分，如是準噶爾、俄羅斯各能得其所哉，當時能有如此看法誠屬不易。

至於五世達賴喇嘛之所以優遇、容忍噶爾丹，心中也有所算計，五世達賴喇嘛聰明絕頂，渠盱衡當時局勢，已然看出大清帝聲勢日隆，有統一全中國之勢，如何阻止清廷向西南推進，保持喇嘛王國不受清廷統治，唯有將清軍引向北方，如何將清廷力量引向北方，準噶爾就成為可利用的對象，只要鼓動準噶爾向東攻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清廷必然要派出大軍北上，以防止漠南各部蒙古騷動，如能促成準噶爾與清廷發生戰，如論誰勝誰負，清廷都將損兵折將，反正死的都不是藏人，但待康熙百年之後，繼位者未必有如康熙一樣英明有為，如是五世達賴喇嘛仍在喇嘛王國中獨享尊榮地位，不但控制信徒有形的肉身，還控制信徒的心靈；因此當巴圖爾鴻台吉死訊傳到拉薩時，噶爾丹星夜趕回準噶爾，準備奪取領導權，行前五世達賴喇嘛特別給噶爾丹一個「博碩克圖汗」名號，這是滑天下之大悞，一個出家喇嘛憑什麼給別個民族一個世俗的汗號，顯然在五世達賴喇嘛心中他自認是高於汗、皇帝，出家人最忌諱妄自尊大，偏偏他就是這麼妄自尊大。

噶爾丹回到準噶爾時五世達賴喇嘛還派幾個高位階的活佛一起到準噶爾，以便為噶爾丹出謀劃策，可是當噶爾丹回到準噶爾時，準噶爾的首長之位已為他兄長僧格繼承，他只好等待，在這期間他始接觸俄羅斯官員，展現勾結俄羅斯的意圖，幾經周折噶爾丹終於在 1671 年（康熙十年）奪得準噶爾首長之位，其所以能奪位成功，俄國學者茲拉特金就指出：

「無疑的是，噶爾丹如果沒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幫助，就不可能指望在這場（指競汗位）的鬥爭中取得勝利。」<sup>7</sup>

從此噶爾丹就以博碩克圖汗之名發號施令，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準噶爾部力量日益壯大，表面上雖然仍向清朝納貢，但每年貢使往往多達兩、三千人，真正的目的不是朝貢，而是討賞與貿易，清廷對之頗為無奈，如不准其「入貢」，邊境立刻不得安寧，稍早因有三藩之亂、海疆未靖，只能

<sup>7</sup> 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頁 240。

曲於容忍，及至三藩之亂敕平、台灣已納入版圖，已有餘力對付準噶爾，偏在此際俄羅斯對東北地區進行騷擾，只得先行處理，待雅克薩之戰獲勝時，立刻進行和平談判，與俄羅斯簽定《尼布楚條約》以便騰出力量以對付準噶爾。

就在準噶爾日益壯大時，在噶爾丹身邊的西藏活佛秉持五世達賴喇嘛旨意，教唆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牧地，終於引致康熙三度親征準噶爾，設若康熙不是預測到終將有事於準噶爾，而先與俄羅斯簽下《尼布楚條約》，則當準噶爾東掠喀爾喀時，清廷可能無力處理，漠北喀爾喀蒙古也不可能成為中國領土，何以見得噶爾丹之東掠喀爾喀蒙古是受五世達賴喇嘛指使，且看噶爾丹在臨死前曾歎稱：

「我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為達賴喇嘛煽惑而來。由今觀之，是達賴喇嘛陷我，我又陷眾人矣。」<sup>8</sup>

從而可見噶爾丹之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實出於五世達賴喇嘛之慫恿，而五世達賴喇嘛之所以教唆準噶爾充當砲灰，其目的只是要延緩康熙向西南經營統一中國，一旦康熙龍馭上賓，繼任者未必英明有為，如是五世達賴喇嘛可高枕無憂，繼續統治其喇嘛王國，至於準噶爾與清廷因戰爭而死亡，傷殘者與他一概無關，這種「死道友，不死貧道」心態，與出家人慈悲為懷是背道而馳的。至於清康熙因要解決準噶爾在西北所造成的威脅，不惜在雅克薩之戰獲勝形勢一片大好情況下，鳴金收兵而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割讓額爾古納河以西之地予俄羅斯，使數十萬布里雅特蒙古族成為俄國人，更為兩百多年後泛蒙古運動埋下禍根，抑有甚者俄羅斯還訓練布里雅特蒙古喇嘛派其入藏潛伏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夜以繼日灌輸以親俄離中反英思想<sup>9</sup>，揆其源由實肇端五世達賴喇嘛之所為。中俄《尼布楚條約》雖非不平等條約，但中國卻喪失自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周邊一大片土地。如果把俄羅斯、噶爾丹、五世達賴喇嘛、康熙看成

<sup>8</sup> 溫達等《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五，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但此處係轉引自日人若松寬著、馬大正等編譯《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87。

<sup>9</sup> 關於泛蒙古運動，可參看劉學鈞《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4年，關於布里雅特喇嘛潛伏十三世達賴喇嘛身邊一事可參看劉學鈞《從歷史看清西藏問題—揭開達賴真實面貌》，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年。

一場博弈，只有俄羅斯是贏家。

#### 四、尼布楚條約

清廷雅克薩之戰獲勝，但爲了要解決準噶爾問題，必須要結束與俄羅斯的對峙，以便騰出兵力應付西北的準噶爾，於是雙方於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開始談判，清廷所派遣之談判使團爲：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佟國綱、尙書阿喇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由於馬齊建議，認爲與俄羅斯進行邊界談判，應有漢人官員參與，於是清廷增派兵部督捕理事官張鵬翮、兵科給事中世安參與談判；代表團的翻譯由在清廷供職的耶蘇會士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與法國人張誠（Franciscus Gerbillon）擔任<sup>10</sup>，談判代表團出發前向康熙請示談判機宜，奏稱：

「尼布潮（楚）雅克薩既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  
以尼布潮為界。此內之地，皆歸我朝。」

以當時清廷挾雅克薩戰勝之有利地位，如堅持此項主張，應能迫使俄羅斯同意，但康熙或已察覺準噶爾噶爾丹野心勃勃，即將東掠，必須儘速與俄羅斯談妥簽約，因此指示曰：

「今以尼布潮（楚）為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托之所，難以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為界。」<sup>11</sup>

可見康熙急於結束與俄國之爭執，以便集中力量應付準噶爾，因此已有向俄羅斯作出讓步之準備。

談判代表團於 1688 年五月三十日由北京出發，由索額圖爲首率八旗，前鋒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二百，經張家口歸化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越沙漠入喀爾喀界，七月六日至查哈馬克免，此時準噶爾部噶爾丹正率兵東掠喀爾喀，路途不平靜，代表團停止前進，索額圖派人通知俄使，因準噶爾之亂，目前無法前往色楞格參加會議，希望將

<sup>10</sup> 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年，上卷頁 103~104。

<sup>11</sup> 《清聖祖實錄》卷一四〇，頁 30。

談判時間延至明年，至於談判地點也另議，索額圖一行於九月七日返回北京。嗣後把會談地點改在尼布楚附近，索額圖一行於 1689 年六月十三日再度從北京出發，此次加派了黑龍江將軍薩布素，都統郎談率兵加入談判陣容。

俄羅斯方面派陸軍大將費要多羅（Feodor Alexendritoh Golovin）為特命全權公使，偕同尼布楚長官維拉索夫（Ivanzino Vlasof）及秘書庫爾尼次基（Semon Korniski）為代判代表，俄羅斯代表於八月十八日到達尼布楚，眼見中國大軍開到尼布楚，頗為緊張。八月二十二日雙方開始首度會面，俄使提出中俄兩國以黑龍江為界，江以南屬中國，江以北屬俄國；索額圖則主張東自雅克薩西至尼布楚及色楞格斯克，都屬中國領土，換言之就是自後貝加爾湖沿外興安嶺為中俄國界，但俄羅斯代表堅不接受，談判一度中止，次日續談，索額圖已瞭然康熙急於結束中俄爭執，因此作了讓步，主張以尼布楚作為中俄兩國國界，俄羅斯仍不同意，如是會議無法進行，此際翻譯徐日升與張誠居中斡旋，希望能打開僵局，經過索額圖一再讓步（按出發前康熙已諭知談判底線），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但俄方仍不同意，此時索額圖已是讓無可讓，如再不能達成協議，準備動用軍隊包圍尼布楚，或許俄方已偵悉索爾圖準備動武訊息，況且中方讓步使俄羅斯獲得布里雅特蒙古族駐牧之大片土地（約二十多萬平方公里，幾有台灣七倍大）於是態度軟化，雙方於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 年八月二十七日）締結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外條約，以其在尼布楚所簽定，故稱之為《尼布楚條約》，同年九月七日（陽曆）雙方舉行條約換文儀式，中俄雙方各繕寫兩種文本，中方繕寫拉丁文本，滿文本各一份，俄方繕寫拉丁文本、俄文本各一份，雙方各在自己的文本上簽字蓋章，又在對方的拉丁文本上簽字蓋章，目前所見漢文本之《尼布楚條約》當係從滿文譯出，此約對中俄國界作出明確界線，其要點如次：

一、將由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右大興安嶺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俄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俄羅斯房舍遷移北岸（按額爾

古納河大致為南北流，此處所稱河之南，北岸，應為東、西岸）。

一、將雅克地方俄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察漢汗係指俄國沙皇）。

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槍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

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俄羅斯之人，俄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

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sup>12</sup>

《尼布楚條約》就其簽訂背景看，並非不平等條約，但從實質面看，中國損失慘重，自額爾古納河向西直到貝加爾湖一大片土地約有二十三萬多平方公里，割讓予俄羅斯，而世居此地的布里雅特蒙古族成為俄羅斯國民，按蒙古族無論那一部都是構成中國民族<sup>13</sup>重要的一個支系，但布里雅特蒙古卻因《尼布楚條約》之簽定，而成為外國人，不過中國境內仍有布里雅特蒙古人，只是在清朝及民國時期稱為陳巴爾虎、新巴爾虎各有一旗，分布在呼倫貝爾部及布特哈部，中共建政後納入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原為盟，2001 年改為市），現有陳巴爾虎一旗，新巴爾虎左、右各一旗。前文曾提到布里雅特蒙古在後來的「泛蒙古運動」與十三世達賴喇嘛親俄、疏離中央，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詳情非本文所能涵蓋，不贅。

## 五、從珍寶島爭執到黑瞎子島一半歸還

《尼布楚條約》雖非不平等條約，但中國卻失去布里雅特蒙古族聚居

<sup>12</sup> 以上主要參採張習孔、田璜主編《中國歷史大事年表》北京出版社，1987 年，第五卷頁 116~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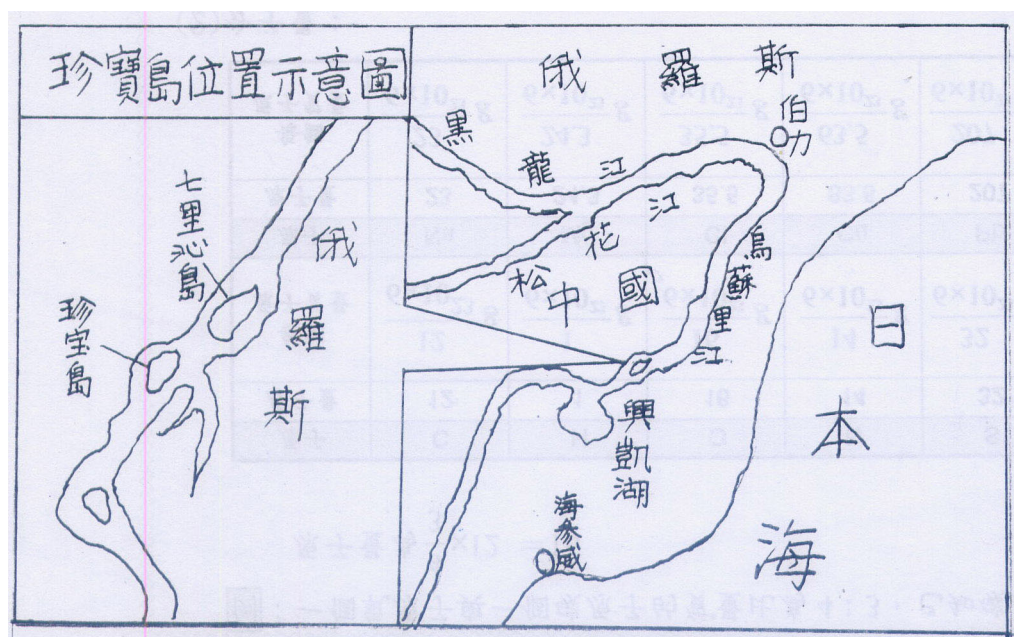
<sup>13</sup> 一般文獻多喜用中華民族，但中華即華夏，而華夏自古以來就與夷狄成為一組對立之名詞，試問凡「夷狄」（泛指非華夏各族）後裔，可肯甘心成為中華（華夏）民族之一分子？因此稱中國民族較為中性，蓋古往今來所有王朝或政權從未以「中國」為正式國號，因此「中國民族」一詞邊疆民族接受度較高。

地區廣達二十多萬平方公里，康熙之所以委曲簽訂此約，實因他已看出準噶爾部噶爾丹懷有東侵野心，果不其然噶爾丹在五世達賴喇嘛及其所派在噶爾丹身邊的濟農呼圖克圖教唆、蠱惑之下，於 1688 年即率鐵騎悍然向東侵掠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牧地及人民，沿途燒殺、姦淫可說是無惡不作，而濟農呼圖克圖也在噶爾丹軍中，並未加以阻止其殺人姦淫行爲，所謂慈悲爲懷，對濟農而言已然不存在。康熙早已料到準噶爾必然東侵；因而委曲與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以便全力應付噶爾丹而不致有北顧之憂，因此《尼布楚條約》之得失，很難簡單作出結論。自此約之後，中俄之間所簽任一條約，概爲不平等條約，每簽訂一條約，中國必失去一片土地，茲擇其要者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年代 (西元)	條約名稱	我國失地
咸豐八年 (1858)	璦琿條約	黑龍江以北約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
咸豐十年 (1860)	北京條約	失去烏蘇里江以東至海之地，約四十萬平方公里
同治三年 (1864)	勘分西北界約	失去新疆塔城以西約四十四萬平方公里
民國八年 (1919)	無任何條約	蘇聯強行占領外蒙古西北邊之唐努烏梁海，約有十六萬五千餘平方公里，現爲俄羅斯之下土瓦共和國
民國十八年 (1929)	無任何條約	蘇聯強行占領黑龍江、烏蘇里江匯流處江中的黑瞎子島，約有四百平方公里。

以上爲一百五十多年俄羅斯從我國掠奪約二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大約有五十七個台灣大，能不令人歎惜，中共建政後，對領土完整相當堅持，如 1969 年曾因在烏蘇里江中一個面積只有 0.74 平方公里的珍寶島，不惜與蘇聯守開火，蘇聯爲此把原來中蘇邊境駐軍由二十二個師，增加到五十五個師，總兵力達到一百多萬人，而中共則動員一百七十萬人之多，在人數上中共雖占優勢，但在武器裝備上中共落後蘇聯很多，中蘇大戰頗有一

觸即發之勢，茲且將此一事件酌為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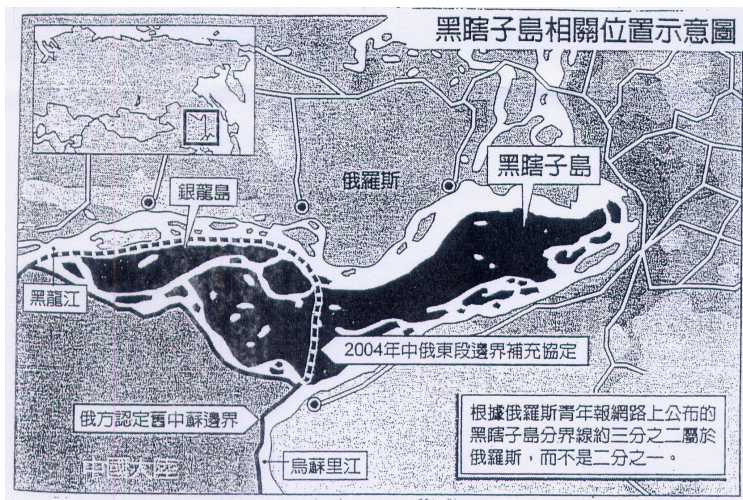
珍寶島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偏中國的一邊（見珍寶島位置示意圖），依照 1860 年（清咸豐十年）《中俄北京條約》所載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割讓予俄國，但對江中的小島究竟屬誰未作規定，但依國際慣例遇有此種情形，多以河流之主航道中心線為準，珍寶島位於主航道中心線偏中國一邊，自然屬中方，因此雙方都派有巡守員，只是中共建政之初，曾宣佈向蘇聯一面倒，因此蘇聯居於強勢，史大林死後，中共與蘇聯發生路線之爭，雖則如此，自中共建政至 1969 年近二十一年，中蘇共在珍寶島並未發生重大爭執，中共邊防守軍一向處於劣勢，雙方雖時有衝突，但只動用到大木棒，從未使用火器。但自 1959 年蘇聯片面撕毀中蘇共雙方於 1957 年所簽定：關於向中共提供原子彈樣品及有關技術的協定<sup>14</sup>，於是雙方有了裂痕，1963 年中共發表《九評》對蘇共展開猛烈抨擊，雙方關係正式破裂，終於在 1969 年二月六日到二十五日，雙方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蘇聯出動了十輛坦克及十七輛裝甲車掩護步兵企圖將中共守島分隊驅離珍寶島（其時烏蘇里江已冰凍，人員車輛可在河冰上行走），其中有

<sup>14</sup> 徐尚禮《珍寶島事件中中共說法：蘇聯一手挑起中國忍無可忍》，1995 年 8 月 4 日，台北《中國時報》



輛 T：62 型坦克車上配備有先進的科技裝置，如測距儀與電子液壓穩定器，結果偏就是這輛有先進裝備的坦克，被中共軍將其履帶炸斷，無法行駛，蘇聯不願這輛有特殊裝備的坦克，落入中共手中，於是動員七十多人在其他坦克強大火力掩護下登島，希望能拖回這輛 T：62 型坦克，但中共軍以更強大的力道阻攔，使蘇軍無法得逞，蘇軍改變策略，派遣一個爆破組，想把這輛 T：62 型坦克炸毀，以免落入中共手中，結果又被中共發覺，雙方猛烈交火，砲火轟破冰層，這輛坦克沉入江底，在戰爭結束後，中共將之打撈上岸，運往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公開展出<sup>15</sup>，並據以研發出中共七二型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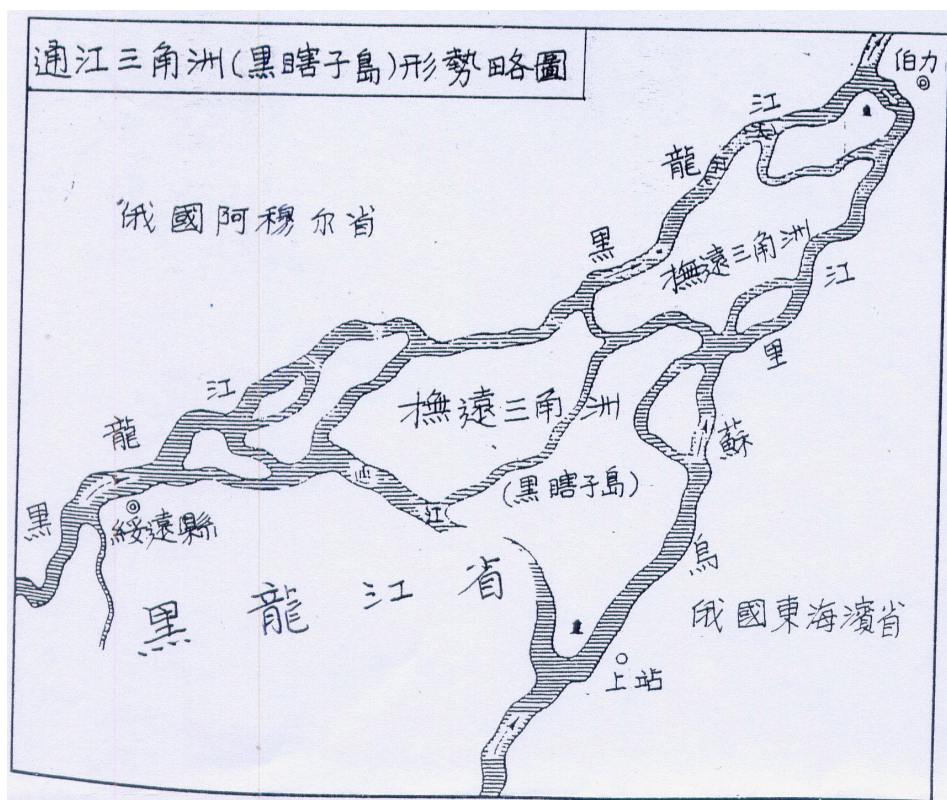
珍寶島軍事衝突事件發生後，中蘇雙方都調集部隊，大戰頗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共前線作戰部隊由瀋陽軍區副司令員蕭全夫負責，蕭氏在召開作戰會議時指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指示：「既要準備（與）蘇軍小打，也要準備（與）他們大打，既要準備（與）他們邊界戰，也要準備他們大舉入侵，在我國領土打全面戰爭」，可見中共已有為這個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島，打一場全面戰爭的心理準備，只是蘇聯不想為這個小島引發戰爭，蘇軍主動退出珍寶島，武裝衝突因之停止，但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勢並未隨之緩和，直到 1969 年九月，蘇聯總理柯錫金在北京機場轉機時，中共總理周恩來前往機場與之舉行會談，雙方就邊界問題開始談判，因珍寶島可能引起的戰爭危機始告解除。



<sup>15</sup> 包理述《珍寶島事件的真相》1995年8月4日，台北《中國時報》

中俄邊界綿延數千里，此處就有關東段珍寶島事件及交還黑瞎子島一半（事實上僅交還三分之一）酌予敘述，由於資訊獲得不易，難免有欠周詳之處，一則有待方家指正，再則希望未來有較多資料時再予補正充實。按黑瞎子島位於東經 134°24'至 135°05'，北緯 48°16'至 48°27'，是由幾個三角洲組成的，北臨黑龍江、東南臨烏蘇里江，西南連接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河汊通江子（也稱通江，俄國稱之為卡雜克維赤水道），通江子是中國內河，只是該河汊流向不定，黑龍江水大時，由黑龍江流入烏蘇里江，反之，則由烏蘇里江流向黑龍江，黑瞎子島是黑龍江、烏蘇里江與通江子之間的三角洲（可參看《通江子三角洲（黑瞎子島）形勢略圖》），其所以稱為黑瞎子島，可能因島上常有黑熊出沒，東北俗稱黑熊為黑瞎子，因而得名，以地理名詞，應稱為撫遠三角洲（因此三角洲在撫遠縣之東，而此縣舊名綏遠縣），東西最長處約五十公里，南北最寬處有十多公里，整島面積有四百平方公里，連同水域面積則為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較長江口的崇明島還大些（崇明島現設為崇明縣，屬上海特別市），比台北市的二百七十二平方公里要大多了，也比新加坡大。俄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侵占黑瞎子島，原先俄國阿穆爾船業公司在伯力（俄名哈巴羅夫斯克）附近烏蘇里江東岸別立坑窟設有船塢，只是到十九世紀末，此船塢泥沙淤積日甚，不便停泊船隻，俄國悍然不顧中國的領土主權，竟然擅自把船塢設在烏蘇里江西岸我國黑瞎子島東北角，而且一設就是兩座船塢，其一為布拉若內塢，另一為烏蘇里江口第二船塢<sup>16</sup>。不僅如此，俄國更派遣官吏向越界進入中國黑瞎子島盜砍木柴，割草之俄國人收稅，這種侵略行為，清政府外務部曾於 1911 年七月二十四日照會俄國駐華公郭索維茲，請其轉飭該地俄國官員，嗣後不得再有類似事件，然而俄國居然強詞奪理宣稱通江為中俄國界，因此黑瞎子島全在俄國境內，稍後辛亥革命爆發，清宣統宣佈退位，中華民國成立，百廢待舉，對黑瞎子島問題更無暇處理。

<sup>16</sup> 有關此二船塢設置經過，可參見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年，上卷，頁 215。



孫中山禪位於袁世凱，而袁世凱急於要各國承認中華民國，加以欲帝制自爲，因此在外交上均採抵姿態，僅止於外交書面交涉，俄國都不加理會，更進一步在通江子、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交匯處分別設立海關，向由黑龍江入烏蘇里江，或由烏蘇里江入黑龍江的中國船隻和貨物，徵收關稅；1912年繆學賢等編繪之《吉林全圖》在「附記」中稱：「俄人竟于三角洲地面（黑瞎子島）榷稅設防」<sup>17</sup>，俄國之強盜行爲袁世凱或後來之北洋政府，均無出兵予以驅趕；至於在廣州之國民黨政府，初期採聯俄容共政策，是則對俄國之侵占黑瞎子島一事，更不能會積極處理。及孫中山逝世，蔣介石改變既有聯俄容共政策，中共無法在國民黨內發展，1927年（民國十六年）中共開始在華南各地採取武裝革命，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蘇聯駐廣州副領事哈西斯（A. IL Hassis）直接指揮中共「廣州起義」，國民政府鑑於中共在各地的武裝「起義」，都是蘇聯在幕後操縱，爲了堵住動亂的源頭，於是在1927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與蘇聯斷交，中蘇雖已斷

<sup>17</sup> 《中國近代邊界史》上卷頁218。

交，但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並未停止，中蘇關係陷入緊張狀態。

及至民國十八年（1929 年）五月二十七日（按其時北伐完成，中國表面上統一了），我東北當局派軍警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並逮捕三十多名俄人，搜出共黨第三國際計劃侵華的各種證據，國民政府感到事態嚴重，於同年七月十日，國民政府決定收回中東鐵路，次日，中東路理事長呂榮寰立刻解除俄籍局長葉穆善諾夫職務，並立即任命中國籍副局長范其采為代理局長，同時將俄籍職員五十九人免職，遣送回俄，更封閉沿線蘇聯經營之「遠東貿易局」、「遠東煤油局」、「商船局」、「商業聯合會」等機構，蘇聯為保衛其在我國東北北部（所謂北滿）既得利益，對國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立刻開會解決有關中東路的一切問題<sup>18</sup>，要求所有被免除職務之俄籍人員立即恢復其職務，國民政府予以拒絕。於是蘇聯一方面於七月十七日宣佈與中國斷交，另一方面在中俄邊境集結八萬大軍，並悍然侵入我國東北，並將黑瞎子島全部占領，國民政府對之無可如何，兩年後（1931 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我國東北地區，次年（1932 年）策劃扶植遜清廢帝溥儀在東北建立傀儡式之「滿洲國」，東北落入日本手中，日本並未對黑瞎子島向蘇聯提出交涉。但日本扶植下的滿洲國，與蘇聯扶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相處並不融洽，這兩個傀儡政權的幕後主子（日本、蘇聯）都想擴大地盤，終於在 1939 年八月雙方爆發大戰，在日滿方面稱之為「諾門罕事件」，蘇蒙方面則稱之為「哈勒欣戰役」<sup>19</sup>，如從歷史角度看，似可視之為第二次日俄戰爭（第一次發生於 1904 年），這兩次日俄戰爭都發生在我國東北地區，第二次日俄戰爭日本大敗自然談不到追討黑瞎子島問題。1945 年抗戰勝利，但依聯合國規定東北地區由蘇聯接收之後再將東北主權歸還中國，此際國共內戰業已引爆，更無力處理黑瞎子島問題。

中共建政之初，一面倒向蘇聯正在蜜月期，要談黑瞎子島問題，未免忒刹風景，因而又擱置下來，直到 1969 年珍寶島發生軍事衝突後，蘇聯

<sup>18</sup> 有關中東路事件可參看陳世昌《中國近代史概要》，此書係陳氏自行出版，1984 年，頁 479~480。

<sup>19</sup> 有關此戰詳情可參看劉學鈺《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 2012，2014 兩度出版，頁 146~147。

總理柯錫金與中共總理周恩來在北京機場舉行會談後，認為邊界問題應以和平會談方式解決，不宜訴諸武力，在此共識下，中蘇雙方展開冗長的邊界談判，其後遭到蘇聯體、成立俄羅斯獨立國協，中亞五共和國脫離蘇聯各自獨立，邊界談判益增其複雜性，自 1991 年至 2004 年，中共與俄羅斯雙方舉行了三百多次國界談判，簽署三次國界協定，最後一個協定為《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為三百年來中俄邊界糾紛畫上句點<sup>20</sup>，在這協定中規定將黑瞎子島的一半及西邊的銀龍島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項《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的全部內容，中俄雙方都祕而不宣，其詳細內容究竟如何？至今仍是個謎。

黑瞎子島，俄國稱之為塔拉巴羅夫島，隔著黑龍江與俄國的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遙遙相望，歸還前，全島主要是一個軍營，還有幾個廢棄的農舍及養牛場。稍早報導稱島上「很多土地荒蕪，樹木不多，有的地方野草足有一人高。」<sup>21</sup>但稍後幾年有人實際登上黑瞎子島後的報導又稱：「剛踏上島，有如進入原始林地，岸邊周遭林木茂密，蘆草、野草叢生，接著有濕地，平原和小山丘，四處都被植被覆蓋，有如一片原生態的『處女地』」<sup>22</sup>，以上兩項報導出入頗大，但應以後者較為可信，畢竟是身歷其境後的「實況」報導。在島的東端，俄國人於 1999 年修建了一座東正教教堂，教堂大門面向中國大陸，紅磚外牆與金黃色穹頂，在荒涼的島上顯得格外醒目，據大陸邊境漁民說：「每隔一段時間，會有船隻將一些俄羅斯人送到這座教堂進行禱告」<sup>23</sup>，在教堂的南面約一百公尺處有一座方形小屋，就是俄羅斯駐軍居住之所。據說當黑瞎子島一半歸還中共時（其實只有三分之一），撫遠縣（原名綏遠縣，黑瞎子島隔江就是撫遠縣）地方當舉行了黑瞎子島回歸儀式，而且還邀俄國哈巴羅夫斯克歌舞團到撫遠縣城演出。

目前中共已經派出軍隊到黑瞎子島西半邊駐防，駐守著中共國境的最東端，既有其榮譽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滿目蒼涼與寂寥，以及較差的生活

<sup>20</sup> 2005 年 5 月 22 日，台北《蘋果日報》A21 版用語。

<sup>21</sup> 2004 年 11 月 3 日，台北《聯合報》A14 版。

<sup>22</sup> 2010 年 9 月 26 日，台北《聯合報》A11 版，陳東旭《黑瞎子島專題報導》。

<sup>23</sup> 2004 年 11 月 3 日，台北《中國時報》A14 版。



環境，這情形或許與我們中華民國派駐南海太平島的海巡戰士有頗多相似之處，相信假以時日，都會改善其生活環境以提升戍守者的生活品質。

## 六、結論

自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之後，從沙俄到蘇聯，從中國掠走的土地多達二百萬平方公里以上，這還不包括受沙俄、蘇聯蠱惑、操縱分裂出去的外蒙古與唐努烏梁海，而今只從俄羅斯獨立國協拿回一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島之半（事實上只有三分之一），到底是值得高興，還是更加悲傷？兩者都有相當的理論與感情依據，此處且酌予分析。

認為能要回一半黑瞎子島，儘管只有一百七十多平方公里，總比什麼都沒要到好些，何況以往失去的領土，都有條約規定（只有唐努烏梁海與黑瞎子島，在沒有任何條約的情形下，被俄國強行侵占，可惜當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知其詳者已經很少了），雖然這些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但畢竟還是條約，就如同「惡法亦法」一樣，在修改惡法之前，還是得受其約束，這是無可奈何之事，所以不平等條約仍是條約，這是現實問題。當1989年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坐滿示威的青年學生時，鄧小平仍然氣定神閑的與到訪的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會談，並發表了以《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為題的談話，他說：「鑑於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是通過條約規定的，同時考慮到歷史和現實情況，我們仍然願意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合理解決邊界問題。」<sup>24</sup>如所周知中共自建政至今，最具影響力的人，除了毛澤東，就數鄧小平，他既然認可清朝與沙俄所定的條約，並且願意以之為基礎來解決邊界問題，其後繼者聲望既不如他，且中共的國力也還未到可以壓倒俄羅斯的地步，試問如何有可能走出鄧所設的框架？何況中共當前正在全力發展經濟，積極設法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發展經濟最需的是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以及不可或缺的能源，如果中共不能與俄羅斯和平相處，俄羅斯豈肯將其油氣賣給中共，這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每一個中共高層領導都必須面對，絕不是一般民間學者，專家不必面對現實問題，可以引經據典，可以以民族尊嚴、歷史仇恨……而放言高論。從現實或務實的角度看，能要回半個黑瞎子島，總比什麼都

<sup>24</sup> 2005年5月27日，台北《中國時報》A13版。

沒要到來得好些，持這種看法者，自有其一定道理，一鳥在握，總比眾鳥在林來得實在些。

但是別具看法者，也有其一套說詞，認為早在江澤民時就與俄國簽定過中俄國界東段和西段協定，胡錦濤所簽的是東段補充協定（北段是與外蒙古界線），等於以這三個協定，把之前俄國以不平等條約所掠奪的廣大土地都合法化了，據媒體報導：「中國民族主義者更強烈撻伐，中國留學生組織『全美學自聯』抨擊該協定（按指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賣國喪權』<sup>25</sup>，海外華人、留學生這種反應是出於歷史的、民族的因素，我們應感到欣慰，因為這些海外華人，留學生並沒有忘掉自己的歷史和民族，但是我們更應該知道民族主義只是一種「氣」，還不能形成「力」，而國際政治談判，尤其是近代以來國際政治舞台更是只講「力」，而不講「理」，至於所謂《國際法》只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用以鉗制弱勢國家的遊戲規則，新加坡李光耀曾經講過一旦這個遊戲規則有礙於西方強國時，就修改這個遊戲規則，如果沒有「力」，只有「氣」是不能成事的，甚至最後很可淪為義和團式的民粹，只能敗事有餘。

自《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曝光後，有媒體稱「胡錦濤放棄的一半黑瞎子島，根本就是前蘇聯在 1929 年強占的，別人搶去的土地，如今承認別人擁有一半主權，有什麼好得意？」<sup>26</sup>這一段話是從另外一個面向看問題，這一套說詞也值得深思。此外當《補充協定》曝光後，此間有一份逢中共必反的媒體《大紀元報》於 2005 年六月三日，以《俄批准邊界協議，中國失領土》為主標題，另以《中共封鎖消息，俄、中國再無法提領土要求》為副標題，以頗大的篇幅報導了這件事，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引錄香港《明報》鐘國仁先生的專文（係中國人之諧音，見註<sup>27</sup>），鐘先生認為中共沒有公佈《補充協定》全部內容是有下三個原因：

「第一，中共在這個問題上連被它譏笑為賣國而趕下台的  
國民黨政權還不如。國民黨政府在領土問題上對蘇聯的鬥爭，

<sup>25</sup> 2005 年 5 月 22 日，台北《蘋果日報》A21 版。

<sup>26</sup> 2005 年 5 月 27 日，台北《中國時報》A13 版。

<sup>27</sup> 查此人原名為程翔，據悉此事見報後，江澤民下令國安單位抓捕程翔，2005 年 4 月 22 日，程翔以涉嫌間諜罪名，在廣州被捕並關押了近三年，詳見台北《大紀元報》2015 年 1 月 22 日 A4 版。

一直持續到五十年代初期，它退守台灣後仍然在 1953 年在聯合國提出控告蘇聯的提案。而中共雖然在建國之初就宣佈不承認列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然而對被蘇聯佔領的土地卻從來不吭一聲。

第二、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比共產黨其他領導人都不如。毛澤東主政期間，他和他的同事曾經多次公開提出蘇聯侵佔中國領土這一事實。鄧小平主政期間，在中蘇恢復領土問題的談判上，也要求蘇聯必須先公開承認它的部分領土是沙俄時代從中國掠奪的。到了江澤民時代，卻看不出他堅持鄧小平這個前提。

第三、這個標誌著中國正式放棄偌大一塊領土的條約，從談判的過程到最後簽署都沒有公開過。」

《大紀元報》對鐘先生的看法作了以下的析論：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江澤民以及中共都欠中國人民一個交待，因為領土不是一黨之私產，他和中共既然作出這個決定，就有義務和責任向人民詳細交待其理由。」

這個析論大致還頗可取，中共當局確實有義務與責任將《補充協定》全部內容向全體人民公布，這一部分本文對鐘氏與《大紀元報》都表示肯定。當《補充協定》消息曝光後，大陸也有民間人士以間接方式表示不滿，例如一向標榜弘揚愛國主義的「中華英雄網」的網友「就呼籲要成立「中國外東北歷史研究會」<sup>28</sup>，這是一個踏實而具創意的建議，要探討一個問題必須對問題的本身有相當的研究，翻開近代史看看，俄國奪我新疆、北疆、東北、日本掠我滿蒙，英印謀我西藏，這都是無從推翻的史實，但再看看俄國、日本、英國、印度對我新疆內外蒙古、東北、西藏的研究下了多少工夫，出版了甚多頗具深度的專書或論文，回過頭來看看我們自己，兩岸四地，甚至包括旅居歐、美、日、澳的中國人（或華人）有多少人對邊疆民族歷史，文化、宗教、語文……下過功夫？有多少這方面

<sup>28</sup> 2005 年 6 月 7 日，台北《聯合報》A13 版。



的學術專著問世？如果基礎工夫沒下夠，只靠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不能成事的，我們不能說：凡是從事中國邊疆研究的國家，必然會從事分化我邊疆民族、侵占我邊疆地區；但我們可以斷言，凡懷有分化我邊疆民族、侵占我邊地區野心的國家，必然從學術研究著手，證諸近兩、三百年歷史，當知此言不謬。因此與其高喊愛國主義，不如從基本研究開始。

最後本文要提出一個概念，領土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當《補充協定》簽定後，俄羅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亞科文科說：

「從法律角度來講，我們鞏固了自己的邊界。邊界條約批准後，任何的領土要求或是圍繞邊界的任何爭執都將不再可能發生。」

這一段話開宗明義指出「從法律角度來講」，可見俄羅斯明白《補充協定》只是法律上的一個程序，未來政治情勢如何變化，很難預料，《詩·大雅·民勞》中有這麼一句：「惠此中國」，很有道理，只要真正落實到惠此中國，自然就能「以綏四方」了。

（本文於 2014 年 12 月投稿，於 2015 年 2 月 10 日審查通過）

## 《滿洲實錄》滿、漢文本對勘研究

強光美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摘要

《滿洲實錄》傳播、使用最爲廣泛的版本是乾隆四十四年的上書房本。筆者通過對勘該版的滿、漢文本，發現漢文本相對滿文本，存在資訊缺失、資訊增補、資訊錯誤、資訊校正及資訊潤色等差異，這是由於翻譯過程的損益、政治力量的干預、歷史發展及認識水準的提高等原因造成的。漢文本在修正、補充、潤色滿文本的同時，也暴露了其資訊缺失、錯誤及過度潤飾的不足。開展《滿洲實錄》的重譯工作，能夠向學界提供更加符合原意的漢文本，多角度推進今人對於清前史的認知，引發學人對於《滿洲實錄》成書問題的新思考。

**關鍵字：**《滿洲實錄》；漢文本；滿文本；對勘；資訊差異；清前史

作爲清朝的第一部實錄，《滿洲實錄》蘊含豐富的史料價值，是清前史、滿族史、蒙古史等多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獻。《滿洲實錄》八卷，記載了滿洲興起至天命十一年（1626 年）努爾哈齊崩爲止的歷史。它先後共有四部，即乾清宮本、上書房本、盛京本、避暑山莊本。<sup>1</sup>目前

<sup>1</sup> 乾清宮本繪寫于天聰元年（1627 年），至天聰九年（1635）完成。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高宗命人依乾清宮舊本重繪二本，即上書房本、盛京本。避暑山莊本重繪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

通用的版本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的上書房本，見於中華書局 1986 年影印出版的《清實錄》（第一冊）。全書每頁分爲上、中、下三欄，分別用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並配有插圖。其中漢文本的傳播、使用最爲廣泛。近日，筆者在閱讀、重譯《滿洲實錄》時，發現滿、漢文本存在諸多差異，從中透露的歷史資訊，對於重新認知清前歷史、考察《滿洲實錄》的編修過程，均不無裨益。本文通過對勘《滿洲實錄》的滿、漢文本，具體指出兩個文本的內容差異，詳細分析這種差別出現的緣由，進而指出文本對讀及重新譯注的學術意義。

## 一、《滿洲實錄》滿、漢文本的差異

根據筆者的閱讀統計，《滿洲實錄》漢文本相對滿文本的不同記載約有 250 多處（重複之處及細微差異不計），大致包含資訊缺失、資訊增補、資訊錯誤、資訊校正、資訊潤飾五種情況。其中，資訊缺失與資訊潤飾的比例最高，分別約占 37%、50%，資訊增補、資訊錯誤、資訊校正的情況相對較少，分別約占 4%、6%和 3%。下面逐一給予介紹：

### （一）信息缺失

漢文本較之滿文本，存在大量的資訊缺失與遺漏的現象。具體體現在對歷史事件邏輯結構的破壞、對歷史事件重要資訊點的缺漏、對歷史細節的忽略、對滿文包含的語氣的缺損。

一是對歷史事件邏輯結構的破壞。滿文本行文脈絡清晰，對某一事件的描述往往十分詳細，前因後果交待得很清楚，具有較強的邏輯性和連貫性，而漢文本總體較爲簡略，經常省去一些重要前提或必然結果，影響讀者對具體史實的把握。下面試舉兩條前提條件缺失的例子，以便讀者體會其中的區別。實錄開篇追述滿洲先祖，言及仙女佛古倫誕下一男，滿文：

“abka i fulinggai banjibuha jui ofi / uthai gisurembi ||”（因乃承天命而生之子，故生而能言。）文中給出“生而能言”的前提，是承天命而生。漢文本則只有“生而能言”短短四字，忽視了天命這一前提。<sup>2</sup>再如萬曆十二年四月，有人來刺殺努爾哈齊，努爾哈齊藏於煙筒後，暗中窺視來

<sup>2</sup> 《滿洲實錄》卷一。

者，滿文本有這樣一段描述：“abka luk seme tulhun ofi / umai saburakū iliha bici / hūlha dosime jime hūlan i jakade isinjirengge / abka talkiyan talkiyafi / talkiyan i elden de hūlhai hanci isinjiha be taidzu sure beile teni sabufi ||”（天忽陰晦，立于彼時竟全然看不見。賊至煙筒，將入內時，天忽閃電，借著電光，太祖淑勒貝勒始見一賊將近。）該文生動地敘述了努爾哈齊先前因天色晦暗什麼都看不見，到天忽然閃電，借著電光看見一賊將近的全過程，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漢文本的介紹則相當簡潔：

“是夜晦暗，忽電光一燭，見一賊將近”，缺乏邏輯性，完全沒有顯示事件的變化過程。<sup>3</sup>此外，尚有一些對於事件結果給予簡化的例證。萬曆十二年，明將李成梁率兵攻克葉赫的都喀、尼雅罕二寨，漢文本說此役“漢兵亦損傷甚多”，而滿文本不僅有漢兵損傷甚多，還有“uthai cooha bederehe”（遂即班師）這層意思，<sup>4</sup>李成梁是因為損兵太多而班師的，所以才有隨後於戊子歲再度率兵攻葉赫納林布祿的軍事行動，漢文本的簡單化處理，割裂了整個事件的因果聯繫。又如天命七年，努爾哈齊伐明，佔領廣寧城後，駐軍十日，漢文本為“帝駐兵十日，乃移兵欲進山海關。”相對於滿文本，缺失了駐兵目的，即“coohai morin be ergembufi”（休養戰馬），原來努爾哈齊在廣寧駐兵，是為了使疲憊的戰馬得到充分休息，為下一個軍事行動——進軍山海關做好準備。<sup>5</sup>

滿文本的邏輯自洽性還體現在其對歷史事件的過程描述十分詳細、清晰，漢文本則有大面積缺失，略去了很多過程性的敘述。如實錄開篇即介紹了滿洲先祖布庫裏雍順的身世。布庫裏雍順順流而下，到達三姓地方，三姓人詢問其為何人，漢文本只有“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不見交談的具體內容。而滿文本則不厭其煩地將仙女佛古倫吞朱果感而成孕的故事復述了一遍。後來三姓人推舉布庫裏雍順為主，漢文本也略去了他們商議的場景。滿文則有大段的敘述，“ilan halai niyalma acafi hebdeme / muse gurun de ejen ojoro be temšerengge nakaki / ere jui be tukiye fi musei gurun de beile obufi / beri gege be sargan buki seme gisurefi || uthai beri gebungge

<sup>3</sup> 《滿洲實錄》卷一，甲申年四月。

<sup>4</sup> 《滿洲實錄》卷一，甲申年。

<sup>5</sup> 《滿洲實錄》卷七，天命七年正月。

sargan jui be sargan bufi / gurun de beile obuha || ” (三姓人會商曰：“吾等國主之爭可暫息，奉此子爲吾國之主，以百里女妻之。”議畢，即以名百里之女妻之，奉爲國主。)<sup>6</sup>

二是對歷史事件重要資訊點的缺漏，包括人物名號、官職、事件的時間、地點、方位、資料的缺失。滿文本十分重視人物的身份描述，一般提到某人時，都會冠以名號或者官職等能夠體現此人身份特徵的詞語。以太祖努爾哈齊爲例，漢文本從開篇到結束，幾乎都只稱“太祖”。而滿文本有太祖淑勒貝勒、太祖昆都侖汗、太祖英明汗三種尊稱。努爾哈齊未稱汗之前，滿文本一直敬稱“淑勒貝勒”。據實錄記載，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蒙古喀爾喀巴約特部達爾漢巴圖魯貝勒子恩格德爾台吉率五部喀爾喀諸貝勒之使進貢駝馬，尊太祖淑勒貝勒爲昆都侖汗。<sup>7</sup>此後，滿文本即採用“太祖昆都侖汗”的稱謂，直到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齊建元天命，滿文本遂將其名號改爲“太祖英明汗”。<sup>8</sup>這種名號的前後變化，是努爾哈齊身份、地位不斷提高的表現。除此以外，對於其他人物的身份表述，漢文本也多有缺失之處。如將“朝鮮主將都元帥姜功烈”略爲“薑功立”，“署理總兵官事副將朱萬良”略爲“署總兵事朱萬良”，“色特希爾台吉”略爲“色特希爾”，“巴布泰阿哥”略爲“巴布泰”，“哨探葉古德”略爲“葉古德”，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

滿文本在敘述歷史事件時，往往有較爲精確的資訊記載，特別是行軍作戰時，更是重視具體的時間、地點、方位、資料等的記錄，而漢文本卻忽略了許多重要資訊。時間上，如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明兵攻滿洲兵駐守的耀州城，漢文“夜半來攻”，滿文本則精確到具體時間“三更”。<sup>9</sup>地點上，天命四年（1619年），明兵征努爾哈齊，其中一路兵入清河路之呼蘭路（“cing ho i jugūn i hūlan i golo”），而漢文本則只有“清河路”，沒有滿文本精確。<sup>10</sup>方位上，“julergi amba ing ni cooha be dulembufi amargi uncehen de / sacime dosifi || ”（伺南大營兵半數往北

<sup>6</sup> 《滿洲實錄》卷一。

<sup>7</sup> 《滿洲實錄》卷三，丙午年十二月。

<sup>8</sup> 《滿洲實錄》卷四，丙辰年正月初一。

<sup>9</sup> 《滿洲實錄》卷八，天命十年八月。

<sup>10</sup> 《滿洲實錄》卷五，天命四年三月。

後，斬其尾。）漢文本爲“伺敵大兵過半，擊其尾。”<sup>11</sup>再如漢文本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爾哈齊率兵攻克瀋陽城後，哨探報曰：“渾河南有兵至。”而滿文本明明是“渾河南遼陽城方向”（*hunehe birai juleri liyoo yang hecen i ergi*）。<sup>12</sup>類似這樣方位資訊缺失的地方還有很多。數據的缺漏在漢文本中也屢見不鮮，如前面哨探奏報的渾河南遼陽方向而來的明兵，滿文本記載爲“*syicuwan i bai juwe tumen yafaha cooha*”（四川步兵兩萬），漢文本只有“四川步兵”，沒有資料顯示。漢文本描述這些步兵手執長槍，滿文本則指出明兵所執長槍長“三尺”。<sup>13</sup>

三是對歷史細節的忽略。如前所述，滿文本整體敘事詳盡、清楚，不僅體現在敘事的邏輯性較強，還體現在對許多細節的關注上。譬如，對財物等物品的記載，滿文本明顯比漢文本詳細。萬曆十二年（1584年），李成梁受哈達人賄賂，起兵攻葉赫，漢文本只有“受哈達國賄”，滿文本則記載了具體的受賄物品，包括青狐皮、黑貂皮、金銀等。<sup>14</sup>哈達國人鬧饑荒的時候，漢文本記錄是各以“妻子、奴僕、牲畜易而食之”，滿文本則不同。汗文本的“妻子”，滿文本是“*sargan*”，只有妻沒有子。另外，滿文本的“*jušen*”（諸申）、“*booī aha*”（包衣阿哈）也不是“奴僕”二字可以概括的。“牲畜”在滿文本中也被具體到“*morin ihan*”（馬牛）。<sup>15</sup>可見，對細節的記錄，滿文本儘量做到具體、準確，而漢文本則不似這般重視，往往採用籠統、模糊的用語。這種做法還體現在對一些形容詞、限定詞的省略上。如天命四年（1619年），努爾哈齊致書朝鮮王，提及自己活捉朝鮮官員之事，漢文本只是說活捉官員十員，滿文本則用了一大串的形容詞，“*cooha be gaifijihe amba ajige juwan hafan*”（率兵而來的大小官員十名）。<sup>16</sup>

四是對滿文包含的語氣的缺損。這裏所謂的語氣缺損，主要是指滿文本中大量的反問句式在漢文本中被改爲陳述句，從而大大削弱了說話人的

<sup>11</sup> 《滿洲實錄》卷五，天命四年二月。

<sup>12</sup> 《滿洲實錄》卷六，天命六年三月。

<sup>13</sup> 《滿洲實錄》卷六，天命六年三月。

<sup>14</sup> 《滿洲實錄》卷一，萬曆十二年。

<sup>15</sup> 《滿洲實錄》卷三，辛醜年。

<sup>16</sup> 《滿洲實錄》卷五，天命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語氣。滿文本根據滿族的語言習慣，在記載太祖努爾哈齊等人的言語時，多用反問句式，很多時候還會使用連續的反問句以烘托語氣的強烈，這也是滿文本的一大特色。漢文本變問句為陳述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語氣的缺失。例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九月，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蒙古等九部合兵討伐努爾哈齊，努爾哈齊卻不慌不忙，依然酣睡，袁代福晉對此表示不解，以為是努爾哈齊畏敵之故，努爾哈齊反駁說：“gelere niyalma de amu aisinjimbio / geleci bi ainu amgambi ||”（“畏懼者能安睡乎？若是畏懼，吾安得睡？”）連續以兩個反問句強調自己不是因為畏懼而睡，強烈的語氣顯示了努爾哈齊對局勢的了然於胸和對來犯之敵的藐視。但是，漢文本卻譯為“畏敵者必不安枕，我不畏彼，故熟睡耳。”語氣大大削弱，不足以彰顯努爾哈齊的成竹在胸、極其自信的狀態。<sup>17</sup>

## （二）信息增補

相對於滿文本來說，漢文本總體較為簡略，但也不乏有資訊增補的地方。鑒於這種情況較少，下面就將其一一列出。

出處	滿文本原文	翻譯	漢文本原文
卷一	emu niyalma muke ganame geneŋi / tere jui be sabuŋi / ferguweme tuwafi	一人去取水，見其子，驚異而視。	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貌非常。
卷一癸未年九月	fa i beren de jafaha jangkūi fesin be tengkifi / fa be tucire arame / fesheleŋi uce be tucire de / hū lha golofi burulame genere de	執刀柄擊窗框，作由窗而出之勢，又踢門欲出，賊驚嚇潰逃而去。	故將刀柄擊窗有聲作由窗而出之勢，仍由戶出，賊見出勢勇猛，皆遁去。
卷一甲申年九月	feye be hūwaitaci senggi ilirakū / gūwaliyandara aiturelame	裹住傷口，血猶不止，昏迷複醒。	將箭痕裹束，厚數寸，晝夜血猶不止，昏迷累次。
卷四天命三年四月	manju gurun i cooha bedereme geneŋi jase tucikebi / dahalame yarkiyame tuwaki seme genere de	時滿洲兵已回師出邊，乃躡後引誘觀視。	時滿洲兵已出邊，明國兵不敢逼近，但躡後觀視。

<sup>17</sup> 《滿洲實錄》卷二，癸巳年九月。

出處	滿文本原文	翻譯	漢文本原文
卷六天命 六年三月	daiming gurun i syicuwan i bai juwe tumen yafaha cooha be Cen ts' e gebungge dzung bing guwan gaifi / hūwang šan alin de ing ilifi bihengge / šen yang hecen de dain i cooha dosika seme donjifi / uthai dame jime / hunehe bira be doofi	大明國總兵官陳 策領四川步兵二 萬，原立營于黃 山，聞瀋陽城有 敵兵入，遂渡渾 河來援。	時四川步兵原立 營于黃山，總兵 陳策、參將張名 世聞我兵至瀋 陽，領兵渡河來 援。
卷六天命 六年三月	fujiyang hergen i dung jung gui / ts' anjiyang hergen i jang ming ši be wafi	殺副將董仲貴、 參將張名世。	殺副將董仲貴、 參將張名世、張 大門。
卷七天命 六年三月	cang jing / cang ding	長靜、長定	長靜、長寧、長 定
卷七天命 六年七月	tung yang jen i jui	佟養真子	佟養真子佟豐年

從上表可以看出，漢文本增補的內容不僅少，且相對集中，主要有三方面內容。一是增補了對滿族先世的讚頌、美化之詞，如讚美先祖布庫裏雍順“舉止奇異，相貌非常”。說到努爾哈齊與敵人搏鬥時，用“出勢勇猛”一詞。而描述太祖傷勢，漢文本“將箭痕裹束，厚數寸，晝夜血猶不止，昏迷累次”，增添了三個量詞“數寸”、“晝夜”、“累次”，突出太祖傷勢的嚴重程度，從而達到強化太祖英雄形象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在與政敵搏鬥時，增添一些揚我氣勢、貶抑對手的句子。如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明將知努爾哈齊兵攻克撫順等地，遂率兵追來，“時滿洲兵已出邊，明國兵不敢逼近，但躡後觀視。”滿文本則沒有“明國兵不敢逼近”這一句，顯然是漢文本爲了揚滿洲之勢而有意增添的。漢文本增添的第三方面內容則是關於明國方面的資訊，包括人物、人名、地名等。

### （三）資訊錯誤

筆者在重譯《滿洲實錄》過程中，還發現漢文本與滿文本在某些地方有出入，而這些資訊的出入很可能是由於翻譯不慎引起的。茲舉一例以作考辨。

萬曆十二年（1584年）六月，努爾哈齊以妹夫被殺爲由，起兵征納木占、薩木占、納申完濟漢，漢文本對此事的記述爲“直抵瑪爾墩山下，



見山勢陡峻，乃以戰車三兩並進。”這很容易讓人以為此次攻打物件為瑪爾墩山，而閱讀滿文本的時候，才發現其進攻物件原來是瑪爾墩山寨，滿文為“mardun gebungge šancin”（名瑪爾墩的山寨）。“tere šancin alin i ninggude arafi haksan ehe”（其寨築於山頂，形勢陡峻），滿文本清晰地告訴我們，瑪爾墩山寨築於山頂，形勢陡峻，而不是漢文本所說的瑪爾墩山山勢險峻。顯然漢文本在翻譯過程中把瑪爾墩山寨誤為瑪爾墩山。<sup>18</sup>

#### （四）信息校正

《滿洲實錄》的滿文本繪寫于天聰初年，由於歷史條件及認識的限制，滿文本有一些錯誤之處，對明朝方面資訊的掌握，有很多不精確的地方，特別是對明朝將領的人員、官職以及明朝地名等的錯記或缺載，漢文本進行了校正、補充，所以漢文本相對滿文本來說，很多表述更為準確。下表列出幾例以茲說明。

出處	滿文本原文	翻譯	漢文本原文
卷三戊申年	hodung ni bai liyoodung hecen i fujiyang / fušun šo hoton i wang bei ioi guwan i emgi acafi	會河東地方遼東城副將、撫順所王備禦官。	會遼陽副將、撫順所備禦。
卷四癸醜年	suweni daiming gurun be dailafi / liyoodung ni hecen be gaifi / ini beye tembi	伐汝大明國，取遼東城以自住。	侵汝明國，取遼陽為都城。
卷五天命三年十二月	guwangning ni ging liyoo yang hao	廣甯經略楊鎬	遼東經略楊鎬
卷五天命四年	liyoodung hecen i dutan yang hao	遼東巡撫楊鎬	遼陽經略楊鎬

從上表可以看出，滿文本與漢文本在地名上的出入，主要反映在遼東與遼陽的混用上。上表所列一、二兩條中，滿文本“遼東”的提法有誤。首先，遼東，泛指遼河以東地區，又稱“遼左”。<sup>19</sup>遼東地區有幾大重鎮，即遼陽、廣甯和開原，其中開原“是明廷在遼東對付蒙古和女真勢力南進的前沿堡壘。”<sup>20</sup>可見，開原是遼東所屬，而滿文本卻把遼東與開原

<sup>18</sup> 《滿洲實錄》卷一，甲申年六月。

<sup>19</sup>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878頁。

<sup>20</sup> 李治亭主編：《清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4頁。

並提，這是錯誤之一。其次，滿文本有“liyoodung hecen”（遼東城）的提法，據學者考證，早在隋唐時期，確有遼東城，645 年被唐太宗興兵攻克後，即改名遼州，次年又改為遼城州，到唐中葉，遼城州的州城改為遼陽城，此後，“遼陽”之名一直沿用。<sup>21</sup>由此可知，滿文本“liyoodung hecen”（遼東城）確實應稱為“遼陽城”。

此外，關於明將楊鎬的身份記載，滿、漢文本有出入。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 年）二月，明朝大軍四路挺進，企圖一舉消滅滿洲，由此引發了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此役四路總指揮為楊鎬。楊鎬，明末將領，萬曆八年進士，二十五年由山東右參政擢僉都禦史，經略朝鮮軍務，次年被劾罷官。三十八年複起遼東巡撫，不久乞休。那麼此時楊鎬是以何種身份坐鎮的呢？據《明實錄》記載，萬曆四十六年（1618 年）四月，由於遼東形勢急轉直下，大學士方從哲推舉兵部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以昔曾巡撫其地熟諳虜情故也。”<sup>22</sup>不久，萬曆皇帝下詔“起升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經略遼東”，又“鑄給楊鎬經略遼東等處關防一顆”。<sup>23</sup>次年二月，“給經略遼東楊鎬誥命”，“經略遼東楊鎬奏：‘臣受命東征，一切虛報不敢騰說以炫聽聞，亦不敢以軍中機宜顯然傳播遠邇，即皇上責臣以馳奏征剿方略，亦必待出師旬日之前，方敢奏聞，尤望將臣所請懸賞。’”<sup>24</sup>可知，此時楊鎬的身份確實是漢文本記載的“遼東經略”，而不是滿文本“廣寧經略”，更不是“遼東巡撫”，當時的遼東巡撫是周永春，萬曆四十六年（1618 年）八月，明廷降旨，“升周永春為遼東巡撫”<sup>25</sup>，次年二月，“上命戶部急解遼餉，無令匱乏，其本色糧草作速收買，不得仍前怠玩致誤軍機，從遼撫周永春之請也。”<sup>26</sup>另外，漢文本“遼陽經略”為“遼東經略”的誤寫。

<sup>21</sup> 參見肖忠純：《遼寧歷史地理》，吉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sup>22</sup>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68，萬曆四十六年四月。

<sup>23</sup>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69，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

<sup>24</sup>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9，萬曆四十七年二月。

<sup>25</sup>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3，萬曆四十六年八月。

<sup>26</sup>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 579，萬曆四十七年二月。

### （五）信息潤飾

漢文本在敘述時，對滿文本進行了大面積地潤飾，一方面是爲了使語言更加簡練、雅觀，另一方面也是爲了粉飾先祖，誇耀滿洲。

其一，通過語言的潤色及意譯的手法以達到達、雅、美的效果。由於語言自身的特點，滿文本的句子大部分比較樸素，用詞也很簡單、粗糙，敘述往往不夠簡練、優美，故而漢文本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其中的用字、用詞、句式等進行了一定的替換、調整與潤色，以使語言更加優美流暢。許多地方沒有直譯，而是採用意譯的手法，如“muke juwere dogon”（運水渡口）意譯爲“人居之處”，“duin sunja jergi”（四五次）譯爲“累次”、“再三”，“juwe yasai siden”（雙眼中間）譯爲“面額”，“loho gida niru sirdan i dube de bucere”（死於刀、槍、箭鋒）譯爲“死於鋒鏑”，“yehei cooha be enenggi jimbi / cimari jimbi seme donjiha ||”（聞葉赫兵今日來或明日來）譯爲“人言葉赫國不日兵來。”“tanggūha gebungge indahūn booi wargici ger sefi dergi de genembi / dergi ci ger sefi wargi de genembi ||”（有犬名湯古哈，自家西面吠向東面，又自東面吠向西面）譯爲“有犬名湯古哈，四顧警吠。”諸如此類，都是以意譯的手法改變滿文的原始性，以使文字更加達雅、美觀。

其二，通過曲筆的手法以達到粉飾、美化的效果。《滿洲實錄》的滿文本雖然幾經修改，但多少還保留了一些原始資訊的影子，而在譯爲漢文本時，則進行了多處修飾，以掩蓋其本來面目。

萬曆十三年（1585 年），明朝因誤殺了努爾哈齊的父祖，爲息事寧人，每年給滿洲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漢文本在介紹此事時，爲了抬高滿洲的地位，誇耀其威勢，記爲“自此每年與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和好焉。”給人一種明朝懾於其威勢，巴結求和之印象。而滿文本實際只是“weile wajiha”（事已息）。<sup>27</sup>

萬曆二十九年（1601 年），明萬曆帝勒令努爾哈齊放歸哈達國蒙格布祿貝勒之子武爾古岱，努爾哈齊沒有辦法，只好遵命。滿文本記爲“taidzu sure beile wan li han i gisun de eteraku”（太祖淑勒貝勒不可違抗萬

<sup>27</sup> 《滿洲實錄》卷一，乙酉年。

曆汗旨意),說明此時滿洲依然受明朝統治,明朝對滿洲還有一定的約束力,爲了掩飾這一事實,漢文本改爲“太祖乃勉從其言”,儘量將努爾哈齊與明朝萬曆皇帝放在平等位置。<sup>28</sup>

總而觀之,敘述上,滿文本更爲清晰、詳細、生動,漢文本則較簡略,敘事相對模糊。資訊傳遞上,滿文本傳達的資訊相對漢文本多得多,但在有關明朝地名、人物官職等資訊上也有錯誤之處,漢文本有所修正。語言上,滿文本更爲質樸、直率,漢文本則進行了多處潤色,語言更加優雅、簡練。立場上,滿文本更加貼近史實,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記錄,漢文本則完全站在滿洲的角度,別有用心地刪除或修改了一些對滿洲不利的資訊。從上述差異也可窺見,滿文本應是較原始的版本,漢文本是在滿文本的基礎上翻譯、加工而成的。關於這一點,謝貴安等人也作過專門研究,指出籠統地認爲《清實錄》先定漢文本,再譯成滿、蒙文本的觀點是不科學的,“滿、漢、蒙三種文本的修纂秩序,隨清朝漢化程度的加深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早期由於滿人漢化程度不高,再加上詔令、奏疏等檔案檔大都是用滿蒙文書寫的,故修實錄時,先撰寫滿文本,再譯成漢文本和蒙古文本。<sup>29</sup>《滿洲實錄》即是如此。

## 二、《滿洲實錄》滿、漢文本存在差異的原因

作爲一部帝王事蹟的記錄之書,《滿洲實錄》漢文本在形成過程中必然受到統治者的干預,歷次重修中也免不了被幾經刪改的厄運,因此,相對滿文本來說有所出入,也是情理之必然。滿、漢文本的不同,是由翻譯過程的損益、政治力量的干預、歷史發展及認識水準的提高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滿、漢文本的差異是翻譯活動的必然結果。翻譯作爲一種跨語言、跨文化活動,在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時,由於文化的不同及各種主觀、客觀因素的制約,必然造成文本的差異,因此,我們不能苛刻地要求兩個文本做到完全一致。

<sup>28</sup> 《滿洲實錄》卷三,辛醜年。

<sup>29</sup> 謝貴安:《〈清實錄〉稿底正副本及滿漢蒙文本形成考論》,《史學集刊》2008年第2期。

翻譯有多種手法，包括直譯、轉換、譯注、意譯和音譯等。<sup>30</sup>《滿洲實錄》在由滿文本翻譯成漢文本時，也採用了這些基本的翻譯手法，特別是轉換、意譯等手法的大量運用，造成了兩個文本之間的諸多不一致。滿、漢之間由於歷史文化、生活區域、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對同一事物的認識也存在差異，這就需要採用轉換法，如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齊因臣民嗜酒，曾發佈上諭禁止飲酒過度，在上諭中，努爾哈齊列舉了嗜酒的種種不良惡果，其一即是“beise akū niyalma omici / beye bucembi ||”<sup>31</sup>（無貝子者飲之，喪其身）。“beise”，漢文音譯為“貝子”，是貝勒的複數，在滿語中，貝勒乃王或諸侯之意，是早期滿族社會的實權統治者，努爾哈齊稱汗之前，就稱“sure beile”（淑勒貝勒）。

“beise akū niyalma”指滿族社會中無主之人，這一提法帶有鮮明的滿族特色。隨著滿族的入主中原，漢文本《滿洲實錄》力求做到融合各種文化，因此沒有直譯，而是以“愚者”代替，通過轉換法以調節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關於意譯手法的運用，前文已有介紹，此不贅言。

除了翻譯手法的原因，翻譯損失也是造成滿、漢文本不同的一大因素。“翻譯損失是指翻譯過程中資訊、意義、語用功能、文化因素、審美形式及其功能的喪失。翻譯損失具有不可避免性。”<sup>32</sup>如前所述，滿文本開篇布庫裏雍順向三姓人介紹自己的身世，是對前文的重複，漢文本將其刪除，就是翻譯損失的一例。此外，滿文本在提到某人時，即使不是第一次出現，也總會冠上相應的身份標誌，包括名號、官差等，重複再三，不厭其煩。如滿文本中太祖總是以“太祖淑勒貝勒”、“太祖昆都侖汗”、“太祖英明汗”等形式出現，其他人物亦如此，額亦都總是“額亦都巴圖魯”，薑功烈總是“朝鮮主將都元帥姜功烈”，等等，諸如此類重複、繁瑣的稱謂，漢文本都加以刪除。這種做法是符合中國傳統翻譯原則的。早在東晉，傑出的佛教學者、高僧道安在翻譯佛經時，就提出翻譯過程中的五類損失，即著名的“五失本”，其中後三失為“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復，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

<sup>30</sup> 白靖宇：《文化與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1-19頁。

<sup>31</sup> 《滿洲實錄》卷八，天命十年。

<sup>32</sup> 夏廷德：《翻譯補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頁。

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sup>33</sup>此三失都是指翻譯過程中刪除重複內容的情況，而《滿洲實錄》在由滿文翻譯成漢文時，也大量採用這種刪除手法，這就造成了漢文本相對滿文本的簡略。

此外，翻譯者本身的文化素養、對滿漢文的掌握程度、個人喜好、翻譯時的手誤等主觀因素，都影響到翻譯的具體過程，從而使滿、漢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差異。

其次，滿、漢文本差異與政治力量的干預不無關聯。《滿洲實錄》記載了清朝太祖努爾哈齊的言行及其一生的史事，同時也是滿洲入關前的歷史再現，關係重大，與其他實錄一樣，《滿洲實錄》在歷次修纂時都有皇帝介入。又因為《滿洲實錄》是先有滿文本，後有漢文本，因此，皇帝在纂修時的干預，使滿、漢文本出現許多差異，主要體現于漢文本在語言、敘述上更多地進行了潤飾，粉飾、美化的痕跡十分明顯。在清實錄中，美化先祖、刪改不利於先祖之處的例子俯拾即是，著名清史專家孟森指出，清歷朝統治者“務使祖宗所爲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淨盡，不留痕跡於實錄中，而改實錄一事，遂爲清世日用飲食之恒事。”<sup>34</sup>滿文本《滿洲實錄》未作過多修飾，行文樸素，保留了諸多原始資訊，因此，漢文本有必要對其進行二度潤飾。另外，就語言來說，由於滿文發展水準有限，辭彙不似漢文豐富，對滿文本進行潤飾的難度較大，可操作性不強，而潤飾漢文本則要容易得多。再者，隨著滿族的不斷漢化，滿人中會國語的人越來越少，漢人中習滿語者更是不多見，因此，滿文本的普及程度遠遠不如漢文本，也正因為如此，漢文本才是敏感區域，對清統治者的威脅更大，更爲統治者所關注，故而修改力度也愈大。由於以上種種，在統治者的授意下，纂修人員對漢文本的潤飾不折不扣地開展起來，這就使得我們今天所見到漢文本與滿文本存在很多出入。茲舉兩例以證之。

<sup>33</sup> 道安：《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鈔序》，轉引自夏廷德：《翻譯補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0頁。

<sup>34</sup> 孟森：《讀清實錄商榷》，《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中華書局，2006年，第686頁。

萬曆十二年（1584 年）九月，努爾哈齊征棟鄂部阿海，因天降大雪，遂罷攻回師，途中，完顏部遜紮秦光袞請其出兵助剿仇敵翁鄂洛人，努爾哈齊以此為侵翁鄂洛路的大好時機，因此毫不猶豫地答應出兵，滿文本敘述太祖的心理活動為“*taidzu sure beile emgeri jihe de / ere golo be manabuki seme gūnifi ||*”（太祖默思：“吾既來，當破此路。”）明顯帶有侵略的意蘊，甚至連夜前進，如此殷勤的舉動，暴露了其急於收穫翁鄂洛的心理。而漢文本則對此進行了粉飾，“太祖默思：‘吾既興兵至此，當乘茲以勘定一方。’”“勘定一方”四字不僅文雅，而且一下子將努爾哈齊由侵略者塑造為戡亂的聖主形象。<sup>35</sup>

再如，努爾哈齊側福晉博爾濟吉特氏，乃蒙古科爾沁明安貝勒之女，努爾哈齊聞其賢慧，頗有淑範，欲娶之。萬曆四十年（1612 年），明安貝勒送其女與努爾哈齊成婚，從此拉開了滿蒙聯姻的序幕。對於這一次聯姻，漢文本記載，努爾哈齊遣使來聘，“明安貝勒遂拒他部之請，送其女來。”但是仔細推敲滿文，似乎並不是那麼回事。滿文本記載如下：

*taidzu kundulen han monggo gurun i korcin i minggan beilei*  
 太祖 昆都侖 汗 蒙古 國 的 科爾沁 的 明安 貝勒 的  
*sargan jui be sain seme donjifi / elcin takūrafi gaiki sere jakade /*  
 女兒 好 聽聞 使者 派遣 欲娶  
*minggan beile ini sargan jui be da eigen ci hokobufi.....*  
 明安 貝勒 他的 女兒 原來的 丈夫 從 使辭別

應譯為：太祖昆都侖汗聞蒙古國科爾沁明安貝勒女賢，遣使欲娶之，明安貝勒遂令其女辭去原夫……通過滿文明顯可以看出，明安貝勒之女先前已經嫁人，或者至少已經許配人家，所以才有“*da eigen*”（原來的丈夫）一說，另外，“*hokobumbi*”（使辭別，使離去）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使休妻”，很明顯，明安貝勒因努爾哈齊欲娶其女，所以將其女召回，轉手送與努爾哈齊。其實從滿文的後一句即可看出，事實的真相就是如此。滿文本在“明安貝勒遂令其女辭去原夫”及“送其女來”中

<sup>35</sup> 《滿洲實錄》卷一，甲申年九月。

間，插入一段話，“ini yehe de dafi / uyun halai gurun i cooha jihe fonde / bontoho morin yalufi burulame tucike / orici aniya ||”（其助葉赫，隨九國兵來時，騎驕馬敗逃而出，至今已二十年矣），這一句絕不是憑空插入，而是如筆者前面所言，滿文本在敘事時，習慣介紹事件的前因後果，此處也不例外。明安貝勒先前助葉赫，九國合兵攻打滿洲，大敗而回，兩國遂結仇隙。此次努爾哈齊往聘其女，正是重歸於好的絕佳時機，明安貝勒爲了與滿洲修好，不惜召回其女，轉嫁努爾哈齊，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筆者認爲，博爾濟吉特氏在嫁努爾哈齊之前，已有夫婿，後來蒙古科爾沁與滿洲修好，明安貝勒從夫家召回其女博爾濟吉特氏，與滿洲聯姻，而絕不是漢文所說的僅僅是“拒他部之請”。漢文之所以這樣說，只是爲了掩飾先祖的不雅之事。在滿洲早期，甚至到清初，皇帝娶已婚女子、寡婦等的例子比比皆是，並不是什麼醜聞。但是隨著滿族漢化程度的加深，受三綱五常等傳統禮教的影響，清朝統治者已不願接受這種婚姻形式，也不希望後人看到其先祖的這種婚姻歷史，因此進行種種隱瞞、掩飾。努爾哈齊作爲清朝的創業先祖，太祖的英明形象不容有半點瑕疵，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之下，博爾濟吉特氏的婚姻史當然也需要重新書寫。<sup>36</sup>

翻譯者的政治立場也對漢文本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萬曆四十七年（1619 年），明朝興起薩爾滸之戰，滿文本以紀實的手法，記述萬曆命文臣武將領兵二十萬“manju gurun be urunakū mukiye bu”（“務必消滅滿洲”）。翻譯官站在滿洲的立場上，很自然地將其改爲萬曆帝命“文武臣等統兵二十萬，侵我滿洲。”一個“侵”字就凸顯了滿洲受害者的地位，同時將明朝塑造爲侵略弱邦的不良大國。<sup>37</sup>

最後，歷史發展及認識水準的提高也是造成滿、漢文本不同的重要原因。《滿洲實錄》始修于天聰元年(1627 年)，天聰九年（1635 年）即完成，這就是滿文本的最初版本，由於當時滿洲尚未入關，對明朝的情況不甚瞭解，故而造成史書記錄的諸多錯誤。後來的漢文本對這些錯誤進行了一一糾正和補充，恰恰說明漢文本晚于滿文本，是在滿文本的基礎上進行

<sup>36</sup> 《滿洲實錄》卷三，壬子年。

<sup>37</sup> 《滿洲實錄》卷五，天命四年二月。



翻譯補寫的。漢文本之所以能夠對滿文本的錯誤進行修正，與清代史官認識水準的提高不無關聯。中華書局影印本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的本子，距離初修本已經將近 150 年了，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清朝修史者對於明朝情況的認識不可同日而語，很多錯誤得到糾正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奇怪的是，漢文本雖然得到糾正，滿文本何以不進行修改呢？筆者以為有兩種可能，一是漢文本是後世添加的，力求準確性，而滿文本是初修本，爲了保持原貌，沒有做過多修改。二是漢文的一些內容可能不直接來源於滿文本，即漢文本不是完全根據滿文本翻譯的，而是參考了其他文獻。

### 三、《滿洲實錄》滿、漢文本對勘及重譯的學術意義

正如前文所述，《滿洲實錄》的滿、漢文本之間存在諸多差異，漢文本在修正滿文本的錯記，補充滿文本的缺載，並在語言上對其進行潤色，使文本讀來更加優雅、流暢的同時，也暴露了自身的諸多不足，如對滿文本資訊的缺失、錯誤以及過度潤飾。鑒於漢文本有以上不足，重新翻譯《滿洲實錄》就顯得十分必要。在導師祁美琴教授的帶領下，筆者與諸師姐、師兄們一起，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將《滿洲實錄》八卷本重新翻譯完畢。這一活動具有下述學術意義：

第一，通過對勘《滿洲實錄》的滿、漢文本，能夠發現通行漢文本的不足，經過重譯，向學者展現更加符合原意的文本，能夠多角度推進今人對於清前史的認知，深化清入關前政治史、軍事史、社會經濟史、明與女真關係史的研究。

首先，漢文本的過度潤色和刪改，影響了《滿洲實錄》的紀實性。實錄重在紀實，是我們認識歷史的一個重要視窗，在實際的運用中，我們往往把實錄看成第一手資料，但是，由於翻譯中的有意潤飾，《滿洲實錄》漢文本在很多地方偏離了史實，對我們研究、認識歷史真相造成誤導。早在三國時期，翻譯界公認的中國傳統譯論第一人、佛經翻譯家支謙就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翻譯觀。<sup>38</sup>近代中國翻譯先驅嚴復提出

<sup>38</sup> 謝振天：《中西翻譯史整體觀探索》，選自任東升主編：《翻譯學理論的系統構建——2009 年青島“翻譯學學科理論系統構建高層論壇”》，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信、達、雅”的三維準則，其中，“信”是第一位的。19 世紀英國翻譯理論家泰特勒提出的著名的翻譯三原則，第一條就是“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譯文應完全複寫出原作的思想。）直到現在，中外翻譯者們依然以“忠實”二字為翻譯的基本原則。可見忠實于原文，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修飾、創造才是翻譯的真正要義。《滿洲實錄》的漢文本在某些方面的過度潤飾掩蓋了歷史真相，脫離了原文主旨，違背了“忠實”的原則。試舉一例以說明之。天命三年（1618 年）九月二十五日，努爾哈齊掠明朝撫順城北的會安堡，並修書一封給萬曆帝，書中有這樣一句：“mini usin weilere aha be tanggū waci / suweni usin weilere aha be bi minggan waha ||”（若殺吾務農事之奴一百，吾將殺汝務農事之奴一千。）努爾哈齊在這裏使用了“阿哈”（奴僕）一詞，這與滿洲當時的社會現實是相符的，證明滿洲貴族曾大量使用農奴進行農業生產，不僅如此，努爾哈齊還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以為明朝的農民跟他們的農奴是一樣的，故而有“suweni usin weilere aha”（汝務農事之奴）一說，漢文本將“usin weilere aha”（務農事之奴）轉換為“農夫”，顯然掩蓋了滿族早期使用奴隸進行生產的真相。<sup>39</sup>類似這樣的諱飾會影響我們對歷史真相的把握。

此次重譯本，本著“忠實”的原則，基本保持了滿文本的原貌。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儘量使用直譯、音譯的手法，避免破壞滿文的詞語、結構，甚至語氣。對一些帶有滿洲特色的稱謂，如“beile”、“jušen”、“booi”等，音譯為“貝勒”、“諸申”、“包衣”，對滿文本中的反復之處也儘量不作刪除，滿文本的大量反問句式也得到保留。並且，我們始終保持中立的態度，將“manju cooha”直譯為“滿洲兵”，而不是漢文本的“我兵”，“daiming gurun”直譯為“大明國”，而不是“明國”，等等。因此，重譯本貼近滿文本原貌，不作過多修飾，立場更加中性，紀實性也更強。

其次，漢文本的資訊錯誤，對我們準確把握歷史具有消極影響，特別是當漢文本是流傳最廣、使用頻率最高的本子時，這種消極影響也隨之擴

社，2010 年，第 366 頁。

<sup>39</sup> 《滿洲實錄》卷五，天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大。比如天命四年（1619 年）夏六月，努爾哈齊攻破開原城後，欲屯居界藩，休養兵馬，以備下一輪的征戰，但是，其他的貝勒大臣們都想回家，不願遷居。努爾哈齊以天熱路遙爲由，勸慰再三，才打消了他們歸家的欲望。他說：“ere baci boo de geneci / juwe ilan inenggi dubede isinambi / musei amba hecen ci casi golo golo gašan de geli ilan duin inenggi dubede isinambi || ”（自此歸家，須二三日，自吾等大城至各路村寨，又須三四日方至。）但是漢文本卻譯爲“自此歸家，遠近不等，或有二三日至者，或有居都城之東，三四日方至者。”查《太祖實錄》，關於此事的記載如下：“若還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sup>40</sup>《太祖實錄》與《滿洲實錄》滿文本記載相同，說明漢文本確實有誤。這樣的錯誤翻譯，如果治史者不加甄別地運用，則會對其認知及判斷產生錯誤引導。敦冰河在《努爾哈齊祖居地考——兼與陳捷先先生商榷》一文中，恰恰引用了這一段，並據此得出結論“努爾哈齊所屬八旗兵丁，從界凡歸家，最遠的需三、四天才能到家。”<sup>41</sup>實際上，自界藩至大城就得二、三天，再從大城到各寨，又須三、四天，因此兵丁們從界藩回家，最遠的至少需要五天，甚至六、七天，而不是敦先生推測的三、四天，敦先生顯然是受了漢文本的誤導，才做出這樣錯誤的判斷。爲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再發生，重譯本將漢文本的錯誤一一糾正，同時也保留了漢文本校正的資訊，在準確度上較漢文本更高，基本可以避免錯誤資訊對治史者造成的困擾，對於人們更準確地把握、認知歷史具有積極作用。

此外，漢文本對資訊的大量缺略，是史料的一大損失，阻礙了我們更加詳細地瞭解歷史事件的發生及當時的情狀，對學術研究十分不利。其中，一些涉及物品饋送及經濟往來的資訊，是我們研究入關前各部落社會經濟與發展水準的重要史料，許多重大戰役的過程性描述是研究軍事史的寶貴素材，重譯本對這些資訊全部予以保留，相信會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

<sup>40</sup> 《太祖實錄》卷六，天命四年六月辛酉。

<sup>41</sup> 敦冰河：《努爾哈齊祖居地考——兼與陳捷先先生商榷》，《滿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第二，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說，對勘文本、重新翻譯《滿洲實錄》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下面僅從《滿洲實錄》的成書考辨角度，談一談筆者的淺見。筆者通過實錄的重譯，發現滿文本有敘事詳細，信息量大，原始記錄保留較多，語言質樸，滿族特色鮮明等特點，因此，基本可以排除是從漢文本翻譯過來的可能性。相反，漢文本對滿文本多有校正，漢文本雖然有諸多刪節和潤飾，但基本沒有脫離滿文本，二者之間的差異雖然不少，但相對整個文本來說，比例並不算高，而且如前所述，很多差異極有可能是翻譯的結果，並不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因此筆者認為漢文本應是在滿文本的基礎上翻譯、加工而成的。近年來，還有學者提出《滿洲實錄》是一部清高宗親自參與作偽的、實際成書於乾隆四十六年的官方偽書的觀點。<sup>42</sup>對此，筆者認為有可商榷之處，作者大概沒有看過滿文本，其對滿文本部分的論述，幾乎都只是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而主要從插圖和漢文本的角度分析，進而得出《滿洲實錄》是一部文字全偽的徹頭徹尾的造偽之書的定論。如果從滿文本出發，作者的很多論據是不成熟的。例如，作者在文章第七部分試圖分析《滿洲實錄》造偽的原因，他認為實錄第一卷追溯先祖時，“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之下注曰：“南朝誤名建州”，這一有意諱飾的事件，目的是掩飾與明朝的臣屬關係，爲了證明滿洲與明朝毫無隸屬關係，乾隆帝只好依託《太祖實錄戰圖》，增補圖畫和文字，來充當滿洲起源的證據，這就是《滿洲實錄》造偽的初衷。但是據筆者閱讀滿文本，發現滿文本在這裏並沒有“南朝誤名建州”的注釋，這是漢文本加上去的。如果所有的文字都是造偽的話，滿文本爲什麼不加上這一注釋呢？事實上，滿文本並不似漢文本這般諱飾與明朝的關係，其行文中間，處處透露著對明朝的恭敬，稱其爲“daiming gurun”（大明國），天命四年（1619 年），努爾哈齊致書朝鮮王，欲與朝鮮結盟，共同對抗明朝，朝鮮王不從，其回信言明瞭當時明朝、滿洲、朝鮮三者之間的關係，滿文如下：

daiming	gurun	be	han	/	muse	juwe	gurun	amban	seme	banjime
大明	國	汗	我們	二	國	大臣	生活			

<sup>42</sup> 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juwe tanggū aniya otolo / emu majige ser seme gasacun ehe akū  
 二 百 年 至 於 一 稍 微 細 小 狀 怨 惡 無  
 bihe …… daiming meni juwe gurun ama jui adali / amai guisun  
 曾 有 大 明 我 們 的 二 國 父 子 一 樣 父 親 的 話  
 be jui maraci ombio ||

子 若 拒 絕 可 以 嗎

這段話漢文原意是：“吾二國爲臣，奉大明國爲汗，至今已二百餘載，無絲毫怨惡……大明與吾二國猶如父子，父之言子豈能拒？”可見，滿文本沒有刻意諱言，而保留了滿洲與朝鮮一樣，曾向明稱臣的記錄，甚至比爲父子關係。漢文本卻爲“明國與吾二國至今經二百餘載，毫無怨惡……明國與我國猶如父子，父之言子豈敢拒？”只有朝鮮與明的臣屬關係，掩蓋了滿洲也向明稱臣稱子的事實，篡改的痕跡十分明顯。如果所有的文字都是偽造的，那麼滿文本就應該與漢文本一致，不可能出現如此重大的漏洞。原因只有可能是，滿文本是原始版本，漢文本在翻譯中對其進行了刪改和潤飾。即使硬要說造偽，也只能說漢文本有造偽之嫌，不能證明滿文本也是乾隆時期的偽造，高宗皇帝不可能這樣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本文於 2015 年 2 月 20 日投稿，於 2015 年 3 月 2 日審查通過）

## 介敘林恩顯博士所著《新疆論叢》

孟鴻

前清雲科大中亞所兼任教授

在台灣鮮少人研究新疆問題，其實以其地緣居亞洲心臟地區，據有極重要地緣意義，現有林恩顯教授所著《新疆論叢》一書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就當前形勢而言，尤具學術與政治雙重意義，全書共四百一十六頁，約三十三萬多字，作者林恩顯先生（1936 年生）台灣高雄縣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系畢業，日本中央大學碩士，文學博士，東京大學研究，歷任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民族社會系主任，邊政研究所所長、訓導長、學務長、日本中央大學、東洋文庫研究員，中國邊政協會、中國民族學會、中國訓育學會、人文科學研究會理事長，台北市選舉委員會委員等。

林恩顯博士就讀政治大學邊政系時，主修維吾爾文，赴日留學期間專攻突厥史，著作頗豐，計有：《邊政通論》、《突厥研究》、《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國父民族主義與民國以來的民族政策》、《中國古代和親研究》、《新疆論叢》等專書。林恩顯博士於突厥、回紇、新疆、邊政都有深入研究，《新疆論叢》所收錄之十篇論文係三十多年來所發表之學術菁華，具有極高的學術水準，只有緒論及附錄五篇係較新之作品，卷首有阿不都拉先生及劉學鈞具名的序文，序文中除對林恩顯博士有所介紹外，對於維吾爾民族在文學、哲學的成就也酌有敘述，頗值一讀，除序言外，其目次如下：

- 一、緒論
- 二、中國古代民族政策理論體系概論
- 三、新疆研究理論與方法
- 四、新疆維吾爾語文概說
- 五、清朝在新疆的政策制度分析
- 六、新疆維吾爾社會與文化
- 七、清代新疆墾務研究

八、清代新疆駝牛羊廠研究

九、清朝在新疆開採銅礦分析

十、大陸伊斯蘭教發展概況

十一、新疆民族關係一分離活動

附錄

感恩朱院長建民

我所知道的阿不都拉師伉儷

敬悼恩師蔣君章教授

懷念我國邊疆史的開拓者—李師符桐

悼嶋崎昌恩師

首篇《緒論》，對新疆一詞作了最簡略卻也是最扼要的介說，文中稱：

「新疆、中國古代稱西域（書中「域」字誤植為「胡」字），西域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單指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廣義則指天山南北之外，還包括今天的中亞地區，甚至把歐洲也包含在內。大致上把東起大興安嶺西端西至裏海周邊，南起萬里長城一線，北至西北利亞南緣，這一大片空間稱為《北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中亞》一詞的認定，和《北亞》的範圍幾乎一致，而這兩個稱謂常為歐美、日本學者所用，因此北亞或中亞的定義，包括了原來廣狹二義的西域，而狹義的西域於清初納入中國版圖，並於清末建為行省。」（見頁 12）

這一段話簡明扼要，清朝將西域納入版圖後名曰新疆，但以天山以北（今稱準噶爾盆地），自元代以來就是蒙古別支的西蒙古人為主，所謂西蒙古明時稱瓦剌，或作衛拉特，係由四個族群組成，這四部是：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其中除和碩特為蒙古本支外，其他三部都是蒙古別支（指原非蒙古而入於蒙古者），四部之中以準噶爾最為強大，明末和碩特徙牧青海，土爾扈特遠徙裏海北岸，駐牧天山以北唯準噶爾為大，遂稱之為準部；天山以南以回紇為主（即今維吾爾，清時稱纏回），因稱回部。在《緒論》中作者以表列方式將衛拉特四部，酌為介紹，頗收醒目之效。

《緒論》對新疆特色、新疆問題都作了頗為詳明的敘述，尤其《新疆問題》部分，作者認為有以下幾項基本問題：省區過大、族群多元複雜、宗教問題、交通經濟問題、教育問題，每一問題都指向核心發人深省，尤

值主政者注意。《緒論》之末提出自來研究新疆方面之學者與其著作，很具參考意義。（見頁 25~27）。

第二篇《中國古代民族政策理論體系概論》，本篇下分前言、理論基礎、古代族群觀暨治邊思想、政策形成過程、政策特色、政策比較、政策方針（原則）、政策項目（方策）、政策評價等九項。按中國自遠古以來就是由多元民族所構成，即以華夏系民族而言，很明顯的是由華與夏兩族融合而成，其後逐漸與所接觸的各民族互相混融，至秦統一天下時，所謂秦人或稍後的漢人，論其組成分子，就包涵華夏系、東夷系、荆吳系及百越系四大系民族，無論秦人或漢人莫不認為是華夏嫡傳、炎黃之胄，其所以如此者，實由於在混融的過程中，彼此互相吸納對方的文明，即以代表民族的圖騰而言，也是採取兼容併包的方式，如夏民族以蛇為圖騰，之後逐漸與諸民族融合，同時也吸納各民族的圖騰，使之附麗於蛇圖騰之上，使之有角、有爪、有鱗……最後成為生物學上未曾有之龍，這是中國古代各民族混融的過程，秦漢之後，在中原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疆域擴大，接觸之民族益為多元，但中央王朝要求境內典章制度的劃一，與周遭各民族遂形成相當的差異性。作者參採各國學者所提出有關民族整合的理論，並製作成《族群關係研究的分析架構系統表》（見頁 35），讀來頗為醒目，由於本篇純屬民族學上的理論性論文，與新疆關係不深，不作贅述。

第三篇敘述新疆研究理論與方法，本篇從自然地理上立論，認為新疆在地理結構上，易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進入新疆，而與南方的中原、農業民族較有隔閡，此種看法頗有創見，文中引清左宗棠所稱「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此言充分說明新疆對中國之重要性，如從整個亞洲大陸情勢看，新疆居其心臟地位，如將甘肅、新疆、中亞作一整體看，其形勢恰如一把扇子，甘肅為扇柄、新疆為扇骨，中亞則為扇面，新疆的地緣優勢已是不言而喻，因而俄國、英國、日本對新疆懷有相當野心，對新疆之研究也相當用心，在日本把新疆研究稱之為北歐亞游牧民族史、中央亞細亞史等；而歐美則逕稱新疆為東突厥斯坦，從名稱上看，已然明白歐美日從潛意識中都不認為新疆屬於中國，其心可誅，但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更應深自檢討，自清乾隆將之納為版圖後，可曾善待之、呵護之？俗語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對外人意圖染指新疆，固應嚴予駁斥力加抗拒，但更應善待新疆各民族，加緊建設新疆，如此談研究新疆



始有意義，方能落實作者林恩顯博士對各國研究新疆的角度及吾人應從相關學科著手，作者稱：

「在相關國家研究新疆的角度上大體是：（一）中國學者多利用漢文文獻，採文獻學、歷史地理學研究「西域」。（二）日本東洋學者，採波斯、察合台、土耳其等語文所寫的伊斯蘭時代的現地語文史料，描寫黑汗朝史、喀什史等歷史，進而也寫東土耳其斯坦、西土耳其斯坦、游牧民族史概說一屬歷史研究。（三）以西洋外交官、軍人、學者，從事新疆地區探險實地調查研究。（四）土耳其學者對中亞、土耳其系諸民族的語言及文學遺產採語言、文獻學的研究法。

論學科的研究新疆重點，以時間言；早期在中國採漢文獻紀錄分析法，其重點在當地考古、語言、民族學等資料的分析法。在方法上：以史學為主，輔以考古、語言、民族、社會、宗教、地理、生態等學科。在考古學以墳墓、集落、都城遺址等遺跡、出土遺物研究。在語言學，比較語言學以阿爾泰語言學，利用當地語文紀錄，或語言解釋，以補充漢文獻之缺失來瞭解其文化和歷史事實。在文化社會人類、社會、宗教學；從事實地調查，以真實瞭解當地。以上理論方法，各有其優劣，如能採科際整合的角度則完善也。」（見頁 49）

第四篇為《新疆維吾爾語文概說》本篇篇幅多達七十六頁為全書篇幅最大的一篇（見頁 52~128），由於本文寫作年代距今（2014）已有三十年左右，因此文中所舉維吾爾族人口，與當前情況已有不符，所幸本文是探討維吾爾語文的論著，人口數字不是重點，雖與現況有較大出入，對論文本身並無影響。

本文從維吾爾文字母發音，開始敘述，在台灣要列印出維吾爾文，有很高的難度，政治大學邊政系維吾爾文組，早年由新疆籍維吾爾族耆宿，專攻維文的阿不都拉老師任教，培養出第一代學生如劉義棠、林恩顯、朱正明、陳耀祖、劉學銚等人，其只有劉義棠、林恩顯、劉學銚三人或從事邊政教學，或從事邊政實務工作，但都繼續從事突厥、回紇、蒙古……等邊疆少數民族研究，雖則如此，台灣迄無一套維吾爾文字模及印刷設備，要以維文印刷極其困難，本文據悉系唐山出版社委請政治大學阿拉伯文系專家代為繕打，但阿文畢竟不是維文，再加上林恩顯博士近年不良於行，體力也不勝負擔校對工作，以是維文部分頗有誤植之處，雖則如此，本文對維文文法之敘述，到目前為止，仍為台灣最詳盡、正確的專著，對認識

維吾爾文有莫大助益，由於印刷困難，此處也無法詳加介述。

第五篇敘述清朝對新疆政策制度分析，本文原載《台北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第一冊，2000年），篇幅多達三十九頁（頁130~168），為本書重點之一，按清乾隆平定準噶爾並趁勢平定回部，將天山南北政式納入中國版圖，時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今已超過兩個半世紀，較美國整個歷史還多十六年，因此清朝對新疆政策，絕對是個重要課題，本篇分：緒論、研究理論概述、清朝新疆民族政策、清朝新疆行政制度、清朝與新疆關係分析及結論等六節，每節之下各有若干小節，文章結構完整、敘述條理井然，若干節中附以圖表，使閱讀時更為方便，緒論部分簡述新疆歷史並敘及研究目的與方法，更敘及中國古代傳統治邊思想（見頁133~134），對研究新疆問題者提供了基礎；林恩顯博士在日本攻讀碩、博士，對研究理論受過嚴格訓練，因此特列專節敘述其研究理論，其下又分：國家整合民族政策理論族群關係理論，兩大部，研究新疆問題或擬訂有關新疆的施政方針，如忽略國家整合、民族利益與族群融合，則必然會發生問題，本書此節深值兩岸從事民族事務工作者的注意。第三節《清朝新疆民族政策》，輔以《清代中央決策與立法形成執行簡表》予人以一目瞭然之感（見頁141），接著敘述清代在新疆實施軍府制，駐重兵以鎮懾之外，又採漢、回隔離政策，封爵錫祿羈縻懷柔政策、崇其教抑其政等措施，可說是把中國歷代治邊政策都在新疆推行，但之後從新疆情勢演變看，清代治新政策是失敗的。第四節敘述清朝新疆行政制度，基本上清朝在新疆採行多種行政制度，本節分別以軍府制、州縣制、扎薩克制、伯克制加以敘述，並輔以圖表，使人讀來不覺枯燥，學術論文能寫到如此程度，可說是已臻化境。第五節分析清朝與中央的關係，此種關係作者分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內地與新疆的關係、民族與文化的關係，雖說相當複雜，但作者林氏深闇執簡馭繁之理，在頁159處，把這三種複雜的關係，以圖表方式呈現，對讀者提供了莫大方便；末節係對清代治疆政策作一總結，本其學術中立立場並未多作得失之評論。

第六篇係敘述新疆維吾爾社會與文化，此篇除前言外，下分：家族與婚姻制度、社會組織與價值觀念、人格特徵、土地與經濟制度、社會制裁、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結論等節（見頁170~188），可說是從多面向介紹了新疆維吾爾社會與文化，很值得詳讀。

第七篇敘述清代新疆墾務研究，下分：新疆墾務環境、墾務意義及其

淵源、新疆開墾方式及其地理分佈、新疆墾務經營方法及其成果、南北疆墾務比較，並附有歷任陝甘總督名單、歷任伊犁將軍名單、歷任陝西甘肅新疆巡撫名單，每節之下又分若干小節，所占篇幅頗大（頁 190~275），占全書八分之一，按新疆古稱西域、土地廣袤，雖沙漠占地甚廣，但荒地仍多，從漢代以來墾戍西域就成為重要西陲防務之一，之後也多因戍而墾，因此戍務一旦停止，墾務也隨之停擺，因此雖有二千年的墾戍歷史，但墾務始終不成氣候，以是內地人到西域也始終無法落地生根形成聚落，西域與內地也無法打成一片，中共入疆後，將所有在疆部隊留在新疆從事生產建設，（形成後日的生產建設兵團），其用意或已注意到歷代墾戍時興時廢，而改弦易轍，寓墾於戍，果而如是，也可算是從歷史得到啓發，由於中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半個世紀以來，已在新疆落地生根，而且在經濟上也獲得相當成就（當然也造成維吾爾族在經濟上產生被剝奪感，因而形成諸多衝突事件，此為另一問題，與本文無關，不宜多述）似乎對清代的墾務已是明日黃花，其實不然，吾人皆知，昔人之所為，都是今日的歷史，而今日吾人之所作，皆系明日之歷史，因此本文所敘述各節，實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詳讀本章各節比對今日生產建設兵團所開發的成果，更具意義，尤其本章所列《新疆戶口概況表》（見頁 201~204，係清乾隆四十二年調查數據），具有統計上比對意義，而且第二節敘述到清代對新疆開墾方式舉出有：兵屯、犯屯、戶屯、回屯、旗屯（見頁 215~225），實為研究新疆提供了許多基本資料，本篇實深具歷史價值。

第八篇為敘述清代對新疆駝牛羊廠的研究，下分：前言、新疆駝牛羊廠的源流及其分佈、駝牛羊廠的制度及其毛色、駝牛羊的養育與用途及結語等五節，在今天看來，雖已時過境遷，但其所具有歷史意義仍永遠存在，而文中所列出之具體數字，無論在何時，都具有參考比對價值。第九篇敘述清代在新疆開採銅礦之分析（見頁 314~341）之情況也類此。

第十篇敘述大陸伊斯蘭教發展概況，按伊斯蘭教為世界性五大宗教之一，擁有最多信徒，分布地區也最廣，原先歐美社會多不大重視，但自 2001 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雙子星大樓遭到恐怖分子先劫機再衝撞雙子星大樓造成數千人死亡，事後查知係伊斯蘭怖分子賓拉登集團所為，於是伊斯蘭教一時之間成為「顯學」，至今（2015）不衰，而且有更為殘忍，恐怖的組織出現，因此研究伊斯蘭教者日見增多，從此一角度看，本篇則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本篇下分：大陸伊斯蘭教組織體系、大陸伊斯蘭教

的發展、大陸伊斯蘭教的現況與趨勢等三節，篇幅雖不大（頁344~352），卻是簡明扼要言簡意賅，很值得詳讀。

第十一篇，敘述新疆民族關係及分離活動，此篇也是本書重點之一，尤其近年來新疆恐怖攻擊事件漸見增多，而且恐怖攻擊地點已溢出新疆向外擴散，甚至在北京也出現恐怖分子活動，因此本篇就顯得特具意義，本章分為以下十一節：一、新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現況，二、新疆各民族分佈狀況及民族關係，三、新疆少數民族幹部所占地位及比例，四、民族幹部、知識份子與一般群眾之心態，五、分離獨立活動原因，六、當前中共對新疆的政策，七、分離運動在北疆的實況，八、分離運動在南疆的實況，九、外國勢力介入新疆分離運動實況，十、中共對新疆分離運動之看法及對策，十一、未來趨勢與感想。這十一節可說對新疆現況（按此文寫於上世紀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因此許多新發生之事件未能納入），七、八兩節所敘述南、北兩疆分離活動實況，不無明日黃花之感，第九節敘述外力介入新疆分離活動情況，作者引北京社科院民族所所長李澤的分析認為：

『1.把新疆稱作「東土耳其斯坦」。2.把新疆突厥語諸民族說成為「突厥族」。3.把突厥文化作為各民族的共同文化。4.把「泛伊斯蘭主義」作為自己的宗教觀。5.歪曲杜撰新疆歷史，編造八千年前新疆向四方幅射移民的歷史，認為新疆是人類文明史的發祥地。6.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要用「宗教壓馬列主義」等，以上這些觀點構成新疆民族分裂主義思想體系的主要架構。

李氏認為外力的支持反動的集團，認為其能促使中共「和平演變」的催化劑，反動分裂分子為中共「和平演變」的內應力量。近幾年，達賴喇嘛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艾沙被捧為整個突厥民族的英雄，促使中國大陸的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們，把民族分裂主義作為他們的反動隊，認為分疆土有利於社會進步。而當其流亡國外時，亦妄想能在新疆或別的地方建立起他們的國家，某些國家亦借人權問題給國內的民族分裂主義鼓勵，妄圖將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國際化，以干涉中共國內輿論」（見頁383）

以上無論是北京社科院民族所李所長或本書作者林氏的看法截至目前為止，都是極為正確，蓋歐美日各國從潛意識上都不願見到中國統一、團結、強大、而且都認為中國只指漢人聚居的地區，把滿、蒙、維、藏等邊

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都認為不屬中國版圖，而另行稱之為滿洲利亞、東土耳其琪坦等稱謂，其意圖分化、分裂中國，已是不言而喻，因此新疆的分離運動，與外國勢力脫不了干係。至於第十一節對新疆未來趨勢與看法，作者認為：

「一、除非中共能要求俄與中亞四國落實邊界裁軍協定否則分離活動將趨頻繁，且有延伸至北京的趨勢。

二、在中共所採取兩手策略。政治一手硬，經濟一手軟下，分離活動難有緩和現象。較有效辦法是『多元民族，一體格局』思想，落實尊重與平等，提升經濟生活水平，尊重宗教自由，緩和漢維關係等措施，讓新疆少數民族樂意與漢族共建國家。」（見頁 387）

林氏此項對新疆「未來趨勢」的分析，距今（2015 年）已有十幾年，然而幾乎皆與上引第一點相合，此非林氏有預卜未來之能力，實係林氏對新疆諸多情勢有深入瞭解，並善於運用分析、歸納方法而得出之結論。至於林氏分析之第二點係「進行式」，供施政者參考，但揆諸十餘年來，待改善之空間似仍未見縮小，林氏之看法仍值參採。

附錄五篇係作者林恩顯博士感念其唸大學之後，老師所給予為人處事研習學問方法，深覺受惠，本諸中國傳統尊師重道精神，對感受特深獲益最多的五位老師：朱建民、阿不都拉、蔣君章、李符桐及日籍嶋崎昌，除首尾兩位筆者無緣受教外，阿、蔣、李三位教授也是筆者的恩師，林氏的感恩文章也說出筆者及所有身列阿、蔣、李三位老師門牆的心聲，尤其對蔣師所作簡要年表（見 403~405），就是一份很珍貴的文獻足供各界參考。

## 論《飛燕驚龍記》書中韓愈的為文立場——以《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為例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文大史學博士

### 摘要

韓愈曾在《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於是《飛燕驚龍記》書中據以解讀為在「潛意識裡流露出對河北的歧視」，韓愈於是成為帝國文化工程師隊伍的一員，而且還有許多文學家也成為這支隊伍的成員。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韓愈文章，卻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從各種跡象看來，韓愈跟烏重胤明顯有相當深厚的情誼，關係既然不錯，似乎就沒有作負面文章的必要了。韓愈所謂「冀北馬多天下」，就是奉承冀北的言詞。算是既稱頌了冀北，也讚美了伯樂。如果韓愈對河北並無歧視，或許就不適合承擔書中所封「文化工程師總隊長」這個職稱了。

**關鍵字：**韓愈，冀北，伯樂，烏重胤，《飛燕驚龍記》

### 一、前言

《飛燕驚龍記》旨在闡述唐代安史之亂後一百餘年間，<sup>1</sup>河北盧龍、成德與魏博等三鎮，為了追求自治而與朝廷進行武裝抗爭的歷史。河北三鎮為了追求自治，一再與官軍對抗，朝廷雖然能集結大軍圍剿河北叛軍，

<sup>1</sup> 盧建榮，《飛燕驚龍記》，（台北市：時英出版，民 96[2007]）。

但最後結果都是遷就現實，而不了了之。

該書作者對同一史事以不同的人物觀點，反覆討論，把歷史的場景分為河北地區與兩京地區兩處。<sup>2</sup>書中文本取材自正史、政書、文集，並大量引用從河北當地發掘出來的墓誌銘，以說故事的輕鬆形式轉述歷史真相，讓河北人站到台前，使長久被「消音、醜化」的河北人躍然紙上，擺脫兩京士大夫留下的歷史紀錄形塑的負面形象。而新文化史幾個相關的重要概念如：權力、意識型態、階級、認同、族群等項目均已自然包含在各章節中，為文手法讓人耳目一新，堪稱典範。

## 二、韓愈是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隊伍的總隊長

《飛燕驚龍記》這本書並不大談論流俗喜歡閱聽的武裝抗爭的過程，重點都擺在文化論述之上。唐代中央人才濟濟，在「文攻」方面，具有先天上的優勢。所以本書開頭的圖 20 中就說明了這種態勢：

韓愈是本書文化工程師隊伍的總隊長，他對河北人集體意像的形塑，影響至鉅。

韓愈也者，就是那個「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豪韓昌黎。至於「文化工程師」是什麼意思，這裡說的並不明確。然而，可以想像得知，韓愈在文化工程師隊伍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否則難以承擔「總隊長」這個職稱。還好，書中第十八頁「序曲」中，對「文化工程師」一詞的定義提出了詳細的說明：

唐代皇帝不需要豢養一群為他們塗脂抹粉的化妝隊伍，但唐代皇帝卻擁有一支專司醜化帝國反抗者的義勇軍，他們很有辦法予帝國反抗者以負面形象，並因而讓忠於帝國的人對反抗者心生反感，而煽起一股以軍事解決反抗者的鷹派風潮。在本書中，我稱這批醜化河北人的志工隊伍為帝國文化工程師。

也就是說，韓愈這批人，擔任了文化工程師的工作，經常在「形塑河北人為異族的集體意像」。由於「異族」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異端，經常是以醜化的、負面的形象居多。以致所謂的

<sup>2</sup> 兩京指的是長安與洛陽，當時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

「文化工程師」，他們的工作，不過就是不問是非的盡量抹黑醜化對方罷了，這和「文化打手」是意思，看來並沒有多大差異。

「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豪，竟然在做「文化打手」這類勾當，使我們對韓愈如何「形塑河北人的集體意像」的內容，產生了了解的興趣。

### 三、文化工程師概念是如何產生的

本書作者也數度提及這種概念產生的原因，書中第十八頁、三五〇頁、三九六頁等處內容中，提及「伯樂和好馬」的文章，是形成這種概念的最初來源：

我年輕時讀到韓愈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這篇文章，一直以為作者是在揭示普世性的政治哲學。直到負笈美國修習新文化史的治史方式，才警覺這裡面有韓愈衝著河北人而講的話這一意涵。同我一樣讀過《韓昌黎集》的讀者，通常只出以審美的口味在細品韓文之美，而於不知不覺中對每篇韓文去脈絡化。韓愈有多文針對河北人發言，但經讀者去脈絡化之後，這些文章涉及河北人集體形象這部分就被人給忽視了。韓愈只不過是這支帝國文化工程師隊伍的一員，還有許多文學家也是這支隊伍的成員，他們寫及河北人的部分，千餘年來都被忽視了。

經查韓愈的這篇《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的文章，作者書中第三五三頁註第三一八中說明，就是《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而從第三五〇頁到第三五三頁的引文中，也可證實的確是節錄自《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的文字。

上述引文曾提到「去脈絡化」這一個專有名詞。所謂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通常就是跳開其原有的脈絡，找出其特殊的時空性。或是將物件或符號從本來的環境(context)中抽離，之後便再現它本身在功能層面的意義。簡單的來說，作者認為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文章的文情並茂，使得韓愈這個文化工程師隊伍的總隊長的塗脂抹粉化妝功夫變成主體，而讓人忽視了河北人集體形象這個重要的部分。換言之，要避免皮相干擾，切入核心，才能看清事情真相。



因此深入研討《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相信是了解韓愈爲文立場的重要關鍵。

#### 四、書中作者對韓愈解讀的分析

書中第三四九頁的一個場景。時間是西元八一一年的一個晚上，地點是東都最高長官鄭餘慶的宴會上，眾人正替洛陽名士溫造餞別。席間大家賦詩作樂，之後公推韓愈爲這些篇集子寫序，韓愈大筆一揮，膾炙人口的《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於焉誕生。

作者下面一段文字，部分取自《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評述，正是書中對韓愈的解讀的重要線索。在這段文字之中，標楷體是作者自己的評述，新細明體代表韓愈的古文。：

韓愈一開筆等於是把河北三鎮痛貶一頓，說：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這用的是伯樂知千里馬的典故，儘管韓愈反對用典，但伯樂之事不是僻典。伯樂是指烏重胤，誰都看得出來。千里馬還未寫到，但溫造是匹千里馬已呼之欲出了。下面一句話明暗俱通，讓與會人上嘆為觀止。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河北與天下的對辭在文章裡出現，反映雖是現實，但帝國幅員之中確實是河北生長的馬較多。但馬多是多，如果都是駑馬也沒用。這種河北全是駑馬說，不正是暗損河北沒有人才嗎？沒錯！下面一句話就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溫造這匹千里馬一到河北，照見滿山遍野的河北馬群，相形之下，河北群馬全給比下去了。這在洛陽士大夫聽了很搗心。然而，韓愈批判力畢竟不同凡響，千里馬明明生長在我們東都洛陽這邊，卻讓牠給跑了，這不證自明，不是說我們天子世界這邊缺乏相千里馬的伯樂嗎？底下一句話反過來自責自己這邊的不是，請看韓愈大國手出招：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我們別笑河北沒人才，我們自己東都這裡就跟河北一樣，一俟溫造一走，人才空空如也，不就是河北第二嗎？這下洛下士大夫讀到

這句話，笑都笑不出來了。我們有何理由譏嘲河北人不行呢？

韓愈打到兩京士大夫的痛腳是一回事，但潛意識裡流露出對河北的歧視，正在這裡見出。

這段文字把「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解釋成「溫造這匹千里馬一到河北，照見滿山遍野的河北馬群，相形之下，河北群馬全給比下去了。這在洛陽士大夫聽了很搗心。」算是歧視河北的一項證據。另一句話「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也在「潛意識裡流露出對河北的歧視」。

作者又根據這個基調，將書中第三五五頁的「對河北嗆聲」、三六三頁的「戎狄」、三六五頁的「污名化」、三六九頁的「鄙視」、三七一頁的「異類」、三九三頁的「負面」、三九六頁的「他老人家爲裂縫已深的社會不時投擲汽油彈」等都順理成章的歸成了韓愈的立場。

## 五、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韓愈文章

古人爲文，會隨著句讀的標示，而有不同的解釋。韓愈爲溫造爲文的立場，也有重新詮釋的空間存在。如果把溫造出仕後，韓愈寫《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從正面解讀，那麼稱溫造隱居王屋爲良馬、推薦人烏重胤爲伯樂，這種語調也是有可能的。再進一步推測，本文主題看起來是說溫造的才能出眾，但細細品味，稱讚烏重胤的成分更多。烏重胤，唐朝大將，張掖人。他爲人寬厚大度，禮賢下士，當時如石洪、溫造等許多名人都曾在其幕府做過事，據說韓愈也有類似經歷，不過尙有待證實。從各種跡象看來，韓愈跟烏重胤明顯有相當深厚的情誼，關係既然不錯，似乎就沒有作負面文章的必要了。

韓愈的《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開頭就把伯樂與河北「冀北」的關係，說得十分透徹：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伯樂一經過冀北的原野，馬群就空了。冀北是天

下馬匹最多的地方，伯樂雖然擅長相馬，怎麼能使那裡的馬群空了呢？了解這層道理的人說：我們說的空，不是沒有馬了，而是沒有好馬了。伯樂能識馬，一遇到好馬就把它挑了去，馬群裡留不下一匹好馬。如果沒有一匹好馬，那麼說沒有馬，也不能算是假話了。

韓愈顯然沒有貶抑冀北的意思，「冀北馬多天下」就是奉承冀北的言詞。而「馬羣遂空」一語，就韓愈的說法是「非無馬也，無良馬也。」那正是伯樂能識馬、挑了好馬的結果，把伯樂和好馬綁在一起，真是既稱頌了冀北，也讚美了伯樂。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第二段，則以冀北的實例來看東都洛陽，說出烏重胤到洛陽戲劇化「選馬」的過程：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東都洛陽，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才實學而隱身不仕的，洛水的北岸有一位，叫石生，洛水的南岸有一位，叫溫生。御史大夫烏公憑節度使的身份鎮守河陽的第三個月，認為石生是個人才，就依照禮儀，把石生招入幕府。沒有過幾個月，又認為溫生是個人才，於是通過石生作媒介，又把溫生招入幕府。東都有真才實學的人儘管很多，可是怎麼禁得起早晨挑選一個，把最好的帶走，晚上又挑選一個，把最優的帶走呢？這樣一來，從東都留守、河南尹起，到各部門的主管和我們兩縣的官吏，如果政事上遇到疑難問題，或者辦案時遇到可疑點，找什麼人去商量妥善解決呢？青年後輩又到哪裡去考究德行、請教學業呢？東來西往經過洛陽的官員們，也無法依禮到他們的住所去拜訪。像這樣也

就可以說是：「御史大夫烏公一到洛陽，洛陽處士們的住所裡就沒有人了。」難道不行嗎？

韓愈在這段話的開頭處認爲，東都洛陽，原本是士大夫的最多的地方，就像冀北是天下馬匹最多的地方一樣，所謂「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就是這個意思。又說「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也就是說誰知烏重胤先生挑走了洛陽的賢人，政事上遇到疑難問題，都找不到人商量了，以致「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害得洛陽簡直成了文化沙漠，而「無所禮於其廬」。東都洛陽，原本是以士大夫眾多見長，現在既沒有士大夫優勢，馬匹也不如冀北了，實在已經是個乏善可陳的地方呢。

《送溫處士》最後一段，講出寫作這篇文章的用處，明白告訴烏重胤治國之道，以及恭賀烏重胤得到賢才：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皇帝處理天下大事，所託付、依靠出大力的，只有宰相和將軍罷了。宰相為皇帝搜羅人才到朝廷，將軍為皇帝選拔文人武士到軍帳裡，如果這樣，要使國家內外不安寧，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被束縛在這裡，不能自己引退，想依靠石、溫兩位的幫助度過晚年。現在，二位都被有權力的人要走了，這又怎能不使我耿耿於懷呢？溫生初到，在軍門拜見烏公時，希望把我前面所說的，代為天下人祝賀；把握後面所說的，替我表示對選盡人才這件事的抱怨。東都留守相公首先寫成一首四韻詩來讚美此事，我便依照他的詩意寫了這篇序。

韓愈在這個結尾裡，把烏重胤搜羅選拔人才到幕下的行為而讚揚冀北「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也相對的藉著批判自己的死氣沉沉而大加撻伐洛陽「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看來，韓愈是並不怕得罪兩京人士的。八年後，韓愈諫阻唐憲宗迎

佛骨，作《諫迎佛骨表》，幾乎惹來殺身之禍，韓愈直言的風格再度獲得了映證。

此外，韓愈《祭十二郎文》中有言：「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正說明自己是河陽人，也認同河陽。韓愈為文的立場偏向冀北，是無足為奇的，似乎更不會歧視河北。

從這個角度看待韓愈，由於他的出身、交往都和河陽有密切關聯，於是讚揚冀北成了主調，與書中作者把韓愈解讀成「文化工程師」的分析是相當不同的。

## 六、其他人看韓愈這篇文章的評語

爲了深入了解《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的文章意，有必要將其他人對韓愈這篇文章的看法，也加以歸納整理。

袁梅等注譯的《古文觀止今譯》<sup>3</sup>認爲，韓愈寫《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意在諷刺隱士，看來也有其道理：

韓愈居洛陽，與石洪、溫造交遊，他愛惜他們的才能，但對他們以隱士之名，而趨奉達官貴人，輕易出山是有所不滿的...在這篇贈序中，韓愈也是意含諷喻的。

也有認爲是暗中讚揚溫處士的，清代的《古文觀止》<sup>4</sup>就持這種看法。此書的注解還把韓愈的各種譬喻都一一點出，讓讀者一目了然：

全篇無一語溫生之賢，而溫生已處處躍露。...已上以譬喻起，不獨為送溫，并送石亦連及，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凡四段。

另外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家姚鼐評本文「意含滑稽」<sup>5</sup>

當然，這些人都把韓愈這篇文章看成文學作品，並不認爲有什麼政治

<sup>3</sup> 袁梅等注譯，《古文觀止今譯》，濟南市，齊魯書社出版，1983，頁六七九

<sup>4</sup> 吳楚材（清）吳調侯選，《古文觀止》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頁三七五

<sup>5</sup>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8卷，文外集2卷，臺北市:世界，2002，頁二九六

意含。

## 七、結語

多方面探索《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的文章意之後，可以大致歸納出三個想法：

（一）《飛燕驚龍記》一書的作者從政治的角度，把韓愈解讀成唐朝帝國方面的「文化工程師」，在《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一文中藉著說：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認爲韓愈痛貶河北了三鎮，暗損河北沒有人才、全是駑馬，潛意識裡流露出對河北的岐視。

（二）本文筆者則從傳統文學角度，認爲韓愈基於人情世故，稱許伯樂與冀北，文辭幽默，他的觀點可能是站在烏重胤與河北方面的。

（三）根據前面二項分析結果，本文筆者認爲韓愈的立場是有些言人人殊的。既然難以歸於一致，或許就不適合承擔「文化工程師總隊長」這個職稱了。稱韓愈爲「文化工程師」或許可以，而稱其爲「總隊長」就有點勉強。再不然把韓愈歸入爲河北發聲者之一也可。因其爲「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豪，似應對形塑河北人集體形象能有所幫助才是。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木雕的雄獅，雖兇誰又怕（藏族）

吹得比山還大，做得比羊還小（藏族）

內奸作怪，外敵得逞（白族）

吃家裡的飯，敲廟裡的鼓（佤族）

老鼠替貓生崽（毛南族）

外患易治，家賊難防（蒙古族）

積累財產，不如積累知識（烏孜別克族）

知識是燈，不撥不亮（維吾爾族）

羊靠草原，人靠知識（塔吉克族）

武器越擦越亮，道理越辯越明（壯族）

一株榕樹九百條根（侗族）

滿樹的紅果，不是一朝的露水（維吾爾族）

井水不出魚，枯樹不開花（蒙古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十七）－黎族食品 「竹筒飯」

華華

### 壹、前言

2015 年 1 月 4 日，赴友人婚宴時，巧遇中國邊政協會理事周健教授，兩人得以同桌餐敘。周教授對本專欄曾仔細閱讀，提出許多看法，受益良多，或可據以改進，造福讀者。

周理事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具有西洋文化史、世界古文明研究、超心理學等學術專長，在學校任教的科目為世界文明史。教學認真，頗受學子好評。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電視名嘴」，能將外星人奇聞軼事講得頭頭是道，字字珠璣，令人嘆為觀止。其實他的學術基礎是西洋史，外星人不過是個業餘的嗜好而已。

外星人是否存在，當然舉世關注。然而至今成謎，尚待周理事更進一步證實。不過少數民族卻就生活在你我身邊，只是很少人注意到而已，且是「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例如海南島的黎族，很多人連聽都沒聽說過，卻早已來到寶島台灣，而且風情獨具。

原來以前居住過的眷村，就有黎族存在，大家還比鄰而居，有過一段相處。話說村中隔壁鄰居老林，來自海南島，常自稱是番人，會說一些我們聽不懂的方言，回想起來正是黎語。他個子不高，矮矮黑黑，頗有南部原住民的相貌。不過所娶的老婆，卻是道地的台北人，高頭大馬，皮膚白皙，打扮時髦。經常足蹬高跟，穿著高領旗袍，梳著一個當年最流行的雞窩頭，高出老林兩個頭，人稱「林婆子」而不名。

老林與林婆子都是愛應酬的人，常不在家。他家兩個男孩，與我們年紀相仿，大家經常玩在一起。有一回正在他家欣賞魏平澳的滑稽歌曲唱片時，<sup>1</sup>老林回來了。還帶了一個海南島的鄉親到家，一同飲酒。下酒菜只

---

<sup>1</sup> 播放唱片的機器，叫做電唱機或留聲機（Phonograph），當年眷村裡只有幾部，能聽



有一道「炒辣椒」，整隻紅色的辣椒，連蒂現炒下鍋爆香，弄得滿屋嗆辣煙霧，跟著就吃將起來了。老林跟朋友大口喝著米酒，還自顧自對著辣椒的味道品頭論足一番，大聲嚷嚷說：「這隻很辣，有味道。這隻不辣，不好吃」，轉眼間，一大盤辣椒就下肚了，留下不少辣椒蒂、空酒瓶，看得小朋友們目瞪口呆。

當時空軍眷村的住戶，都來自大江南北，可說什麼吃辣的人物都有。像是不怕辣的四川人、辣不怕的貴州人、怕不辣的湖南人和專做辣椒醬的湖北人等，但這些英雄豪傑都只是把辣椒放在菜裡當佐料小品，怎能跟把辣椒當主菜，狼吞虎嚥、瘋狂下酒的海南島人相比？難怪當年受到這場震撼教育之後，會留下深刻印象，五十年不變。

「炒辣椒」是個相當刺激的主題，但如果繼續談「炒辣椒」，就與「少數民族美食簡介」題旨背道而馳了。因為辣椒這種食物，評價兩極。在不同民族間，接受的程度並不相同，有人感覺是美食，有人卻會視之如毒藥。像是前幾期談過的朝鮮族(韓國人)普遍吃辣，而京族(越南人)卻是選擇性的吃辣，兩者習性，天差地遠。黎族習慣與京族相似，都是選擇性吃辣，往往會在主菜旁擺上一碟辣椒，讓不同口味需求的人，得以同桌共餐。因此一般所謂的「美食」，不會偏向以佐料如薑、蔥、蒜、辣椒、胡椒等，當作主題，這是明顯的道理。

那麼黎族有什麼「美食」，值得一談呢？其實黎族一日三餐，主食大米，佐以雜糧，這就是他們的「美食」。以下就來介紹黎族食品「竹筒飯」。

## 貳、黎族食品「竹筒飯」

一般黎族做米飯的方法，是用陶鍋或鐵鍋煮，燜熟後盛碗就食，與漢族做飯的方法大致相同。

另一種則是饒富野趣的做飯方式，陶鍋或鐵鍋全免，以竹筒代替上場，同樣能做出香噴噴的米飯。

方法是，取新鮮綠色粗大的竹竿一支，鋸下成竹筒，一端開口，另一

---

唱片算是高級享受。魏平澳（1929—1989 年），是臺灣、香港老牌歌手及演員，演過精武門(電影)裡的日本「走狗」胡恩(胡翻譯)。

端帶有竹節，裝進適量的米和水，再塞上香蕉葉子封實。接著放在火堆裏烘烤，一小時後，竹筒外觀已經由綠轉灰，等到用餐時，劈開這些竹筒，取出一個個圓柱形的飯團，就是香味撲鼻的「竹筒飯」了。

有飯無菜，則不符合食道。黎族喜歡食用「雷公根小魚」，這是一道黎族經常下飯的野菜。就是將水邊略帶苦澀、草香十足、圓形葉子的雷公根，和河裏剛網起的新鮮小魚蝦同煮，再灑上麻油、鹽巴、蔥花，作成一道極為可口的佳肴，配合上「竹筒飯」，剛好符合「野趣」二字。雷公根也可藥用，能消炎解毒，算是食補兼藥補的好食材。

「竹筒飯」還有變化的配方。如果把獵獲的野味，像是山雞、野羌等的瘦肉，混以香糯米和少量鹽巴、蔥花，放進竹筒燒成香糯飯，更是異香撲鼻，是招待貴賓的珍饈美饌。

香糯米是海南島區域性的特產，推測跟泰國的香米，有些親屬關係。據說以香糯米做出的「竹筒飯」，會有「一家煮飯百家香」的效果。

黎語稱竹筒飯為「眉萬」，是當地人出門遠行時所帶的「便當」。此外喜慶佳節時，也要製作竹筒飯，以示隆重。

竹子，跟海南島的關係密切。黎人造屋，要靠竹子當建材。做家具、農具，要用竹子製作。連慶祝黎族三月三節（農曆三月初三），又稱愛情節，黎語稱「孚念孚」<sup>2</sup>。這天黎族青年男女要跳竹竿舞，吹竹簫，以示歌舞昇平，也是以竹子當道具。看看這段三月三節情歌《要想交情妹做媒》，就可以感受到那份濃情密意了：

男：要想吃煙沒有火，

要吃檳榔沒有灰，

要想吃酒沒有配，

要想交情沒有媒。

女：哥要吃煙妹送火，

想吃檳榔妹送灰，

哥要吃酒妹送肉，

要想交情妹做媒。

<sup>2</sup> 黎語發音 tsu11「一粗」，lau11「二撈」，fu11「三孚」，可知「孚念孚」就是「三月三」的語音直譯。黎語屬東亞語系的分支，不同地區有不同方言。

這種場合，免不了徹夜狂歡。必需帶上竹筒飯「眉萬」，以隨時補充體力，是顯而易見的了。

### 叁、結語

黎族源于嶺南的駱越人和駐守嶺南的中原人。漢武帝曾在海南島設置珠崖、儋耳兩郡，拉近了與中原的關係。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島的中南部，根據 2000 年第五次大陸人口普查統計，人口數為 1,247,814，數量上也不算太少。海南島簡稱瓊，泛指美玉，《詩經》上說：「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sup>3</sup>意思也還算不錯。

黎族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竹子，跟寶島的關係也很密切。早年台灣眷村是國軍大撤退時代的產物，曾有過一段艱苦歲月。許多人家連「雷公根小魚」這道野菜也吃不起，更別提吃竹筒飯「眉萬」了，經常是豬油拌飯灑點醬油，就混過一餐。老林家能有錢喝酒、聽唱片、梳雞窩頭，算是個例外。一般住家也多以竹壁、竹瓦搭建，屋內睡竹床，坐竹椅，幼兒推竹子雞公車學步，院子圍上竹籬笆，真可稱是「竹器時代」，<sup>4</sup>想來與黎族所居住的瓊州，還有許多神似之處呢。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瓊州黎民三月三，竹舞竹簫竹眉萬，寶島餘勇度小月，<sup>5</sup>竹籬竹瓦豬油飯。」

<sup>3</sup> 《詩·衛風·木瓜》。

<sup>4</sup> 與石器時代相輝映。

<sup>5</sup> 度小月語出擔仔麵店名，與艱苦歲月同義。早年臺南人洪芋頭以捕魚為業，在無法出海捕魚的月份，常於臺南市水仙宮廟前叫賣麵食維生，勉強度過小月，並在攤前所吊的燈籠上自名「度小月擔仔麵」。

## 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暨 中國邊疆研究所專題講演紀實

林遙鵬  
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

2014年4月24日至5月2日本協會舉辦「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學術研討會，中國邊疆研究中心(現已改為中國邊疆研究所)邢廣程主任參會，由於邢主任第一次到臺灣，且對中國邊政協會六十餘年來致力於中國邊政學術的研究傳承深感敬佩，畢竟中國大陸對於邊疆的重視也不過是近二十餘年來的事，雖然過往也有部份學者從事邊疆學術研究，但都是個別或某一部領域研究而未有全面及系統性的籌劃，今日雖有政策支持，但仍有一些時期及領域未能窺視，如少了臺灣長期以來所作之研究成果，在中國的邊疆學術論點上將自有殘缺。而中國邊政協會是目前臺灣仍從事邊疆學術研究的單位，不但是民間社團又無政策束縛，是故邢主任力邀本協會劉秘書長與我參加「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後能親臨北京中國邊疆研究中心作幾場專題講演，並冀希雙方能簽定學術文化交流合作協議備忘錄，為雙方未來學術交流建構可長可久之平臺，在簽呈楊理事長核准後，秘書處按期程落實北京與騰沖學術之行。

11月27日劉秘書長與我搭乘下午航班抵北京首都機場，入住機場邊上之北京麗豪酒店(首都機場國展店)已近8點，匆匆用完晚餐後，將赴馬來西亞講學一個月之民族大學吳楚克老師來訪，短暫的一小時的晤談中確立了吳老師將作「臺灣研究中國邊政人物訪談」的架構(當然細節還是必須規劃)，夜晚酣睡中首都機場起降飛機聲伴我度過漫漫長夜。28日晨北京近零度的氣溫稍感一絲絲寒意，經過昆明轉機後終於在下午近5點到達嚮往已久的中國·雲南·騰沖，此地氣候宜人著實適合人居，主辦方安排入住世紀金源酒店並為論壇召開場所。

## 壹、西南論壇（2014）

2014 年 11 月 29 日，本會劉學鈔秘書長暨本人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與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保山市人民政府聯合舉辦“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中國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如圖一、筆者拍攝)，會議於雲南騰冲舉行，本次論壇深入分析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推進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的意義、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以及周邊國家和世界可能的反應等重大問題，並從“親誠惠容”和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周邊外交理念出發，探討深化中國的沿邊開發開放以及沿邊地區與周邊國家開展區域合作的思路、重點專案、實施方式、保障措施等重要課題。在舉辦方作為地主的保山市悉心安排下論壇圓滿成功並獲致重要結論，保山市市長吳松心先生更是近乎全程參與。本次論壇共有百餘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61 篇(如表一、筆者整理)，本協會為第一次受邀參加，此論壇屆今已舉辦五次，每次會議後編輯成冊，並作為大西南地區開發的重要參考資料與依據。

保山在先秦時，屬哀牢。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在哀牢國統治中心地（今隆陽壩東金雞村）設不韋縣，強制從四川遷呂不韋後裔呂氏家族到此居住。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哀牢王柳貌內屬，遂設永昌郡。唐宋時期，保山先屬南詔，為永昌節度；大理國成立後又歸其所屬，後改為永昌府。元初期，設永昌三千戶，隸大理上萬戶府，此後又改設永昌府、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明代，先後置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昌軍民府。嘉靖三年（公元 1524 年）設保山縣為附郭縣。清代設永昌府。1913 年廢府，各縣直屬於省。後又設騰越道、第一殖邊督辦署、騰龍邊區行政監督、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第十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治所在或在保山縣，或在騰衝縣。1949 年 12 月設保山地區，2000 年 12 月保山撤地設市。保山市轄下一個市轄區龍陽區，四個縣施甸縣、騰冲縣、龍陵縣與昌寧縣，常住人口 2,506,491 人，常住人口中，漢族人口為 2,248,140 人，佔 89.69%；少數民族人口為 258,351 人，佔 10.31%。保山市年均溫 15.5℃，年均降水量 966.5 毫米，近年來保山市人民政府

大力推廣為休閒旅遊、養生養老勝地。<sup>1</sup>

2014年11月29-30日：

第一階段 開幕式由四位主辦方與會領導致辭

- 1、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研究員
- 2、雲南省保山市市長吳松先生
- 3、雲南大學校長林文勳教授
- 4、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楊沐研究員

第二階段 主旨演講

- 1、黃毅先生（中共雲南省委常委、統戰部長，雲南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題目：雲南對外開放的回顧與未來的思考

- 2、張蘊嶺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學部委員）

題目：對我國沿邊開放發展的思考

- 3、邢廣程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所長）

題目：現代絲綢之路戰略：中國與世界深度互動的新型連結範式

- 4、江瑞平教授（外交學院副院長）

題目：東亞格局中的二元困境與脫困之策

第三階段 分組討論

本次會議共分為 A、B、C 三組，每組的研究討論領域為：“一帶一路”：戰略與政策，中國-東南亞關係與區域合作，保山對外開放與區域合作。

A 組、“一帶一路”：戰略與政策：

從國際之經濟、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推進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的意義、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以及周邊國家和世界可能的反應等重大問題。

B 組、中國-東南亞關係與區域合作：

從中國大陸內部各種主、客觀的條件因素去體現中國在“一帶一路”

---

<sup>1</sup> 保山市人民政府網站

戰略背景下推進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的意義、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C 組、保山對外開放與區域合作：保山市在當前此政策下如何去因應與推展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推進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的意義、保山市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圖一)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中國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表一)論文發表學者暨題目

序號	姓名	單位	職務	論文題目
1	吳松	保山市	市長	
2	Nadine Godehardt	德國國際政策和安全研究所亞洲研究室	研究員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 Chance for Chinese-European cooperation?
3	牛治富	西藏自治區黨校	教授	試論“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地緣政治學基礎及其新發展
4	楊沐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研究員	全球治理中的雙軌制——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學思考
5	陸建人	廣西大學中國一	研究員	中國與馬來西亞經濟合作：過

序號	姓名	單位	職務	論文題目
		東盟研究院		去、現在與未來
6	常欣欣	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	教授	環北部灣區域經濟合作發展中的石油戰略構想
7	魏玲	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	教授	
8	李晨陽	雲南大學社科處	研究員	滇越鐵路對中國-東盟互聯互通發展的歷史啓示
9	藍平兒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	研究員	China's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East Asian Responses
10	李含琳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	所長	中國西北整體融入絲路經濟帶建設快車道的可行性分析
11	孫宏年	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研究員	沿邊開發開放與西南邊疆安全、穩定、發展問題淺議
12	傅德華 Ed Pulfor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劍橋大學	研究生	Qing Hunchun and changing understandings of territory and borders in northeast China
13	陸南泉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研究員	以中俄關係步入新階段爲契機積極推進兩國區域合作
14	程亦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研究員	把握時機推進中俄務實合作
15	阿拉騰奧其爾	中國邊疆研究所	副研究員	俄羅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認知
16	初冬梅	中國邊疆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17	楊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副研究員	“絲綢之路經濟帶”：從理念到實現
18	汪戎	雲南財經大學黨委書記	教授	對外開放新格局與周邊區域合作
19	楊燁	雲南省政府研究室	研究員	孟中印緬地區合作歷程與思考
20	劉稚	雲南大學大湄公河次區域研究中心	研究員	關於保山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幾點思考
21	呂昭義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	教授	搭建實用技術交流合作平臺，促進保山對南亞開放再度先行



序號	姓名	單位	職務	論文題目
22	林文勳	雲南大學	校長	關於建設南方絲綢之路經濟走廊的構想
23	楊先明	雲南大學發展研究院	院長	沿邊開放與重塑周邊經濟地理
24	Sayana Namsaraeva	英國劍橋大學	研究員	“ It is all built on our money ! ” : Russian border-traders in /and about Manzhouli
25	李明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	副教授	關於一路一帶的一些思考
26	林遙鵬	中國邊政協會	副秘書長	中國邊政季刊邊政學術研究梳理
27	肖憲	雲南大學	副校長	中印人文交流，促進雙方互信建設
28	張永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副研究員	中印沿邊開發開放與西藏邊貿淺議
29	朱翠萍	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	教授	西向開放戰略與中印合作前景
30	李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研究員	絲綢之路經濟帶視野下的新疆對外合作芻議
31	呂餘生	廣西社科院	院長	一帶一路建設新機遇與廣西沿邊開放新舉措
32	楊保筠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	從歷史走向未來：充分發揮中國西南部地區在“一帶一路”中的樞紐地位
33	黃金輝	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四川大學政治學院	教授	四川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及其實現路徑
34	盧光盛	雲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所長	“絲路外交”與雲南的作為
35	孫壯志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黨委書記	研究員	絲路經濟帶語境下中國與中亞的合作
36	彭光謙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	研究員	“一帶一路”：開創陸海和合新地緣戰略時代
37	周偉洲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教授	關於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的思考

序號	姓名	單位	職務	論文題目
		主任		
38	周茂榮	武漢大學邊界與海洋研究院	教授	東亞生產網路的深化與“一路一帶”戰略
39	陳玉榮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歐亞部	研究員	一路一帶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互利合作
40	範祚軍	廣西大學中國—東盟研究院	教授	規範和促進中國對東盟投資的政策建議
41	馬勇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科研處	研究員	大國智慧、大國心態與中國的開放合作
42	許建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研究員	簡論土耳其維吾爾族華人華僑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
43	羅群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	副院長	民國時期越僑在雲南邊疆地區社會活動與管理的歷史考察
44	方鐵	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	教授	論古代邊疆演變的內在機制：基於人類學視角的考察
45	潘先林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教授	“寓改進于開發，寓國防于建設”——民國時期雲南邊疆“開發方案”補論
46	張軻風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副教授	近代以來區域合作戰略主導下的“西南”區域重構
47	李大龍	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研究員	利益邊疆與利益共同體——對沿邊開放與國外投資安全的幾點思考
48	吳磊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	教授	建設中緬油氣管道複綫幾點思考
49	方盛舉	雲南大學民族政治與邊疆治理研究院	教授	我國陸地邊疆社會治理的邏輯
50	王欣	陝西師範大學西部邊疆研究院	教授	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民族問題——以新疆為例
51	餘虹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	研究員	Yunnan as China's Gateway towards Asia in the Context of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21st Century
52	范建華	雲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	研究員	雲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53	Akihiro Iwashita	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	教授	Eurasian Border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hysical and Mental Aspects
54	呂文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副研究員	論雲南是連接“一帶”和“一路”的中心——以交通建設為

序號	姓名	單位	職務	論文題目
				基礎的討論
55	段光達	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	教授	加快邊境旅遊發展，落實睦鄰友好政策
56	霍明琨	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	教授	試論“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人文合作
57	高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副研究員	黑龍江省經濟增速放緩形勢下沿邊口岸功能研究—以綏芬河口岸為中心
58	翟崑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	“一帶一路”時代的公共外交
59	田春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社會發展所	研究員	從“一帶一路”看中國沿邊經濟發展與合作的特點與問題
60	王志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研究所	教授	南方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周邊開放模式創新
61	王卓	四川大學社科處	教授	沿邊扶貧開發戰略思考
62	羅靜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雲南的機遇和挑戰

## 貳、中國邊疆研究所專題講演

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中國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結束後，於12月1日回到北京，據說前幾日北京正籠罩在一片霾害中，昨晚的一夜強風霾霧散了，但氣溫也急速的下降，騰沖與昆明氣溫17℃-19℃，飛機抵北京後面對2℃的溫度，趕緊禦寒大衣加圍巾再加瑟縮成一團，稍能抒解寒意。北京不愧是大都市，車多人多從首都機場緩慢的往市中心前進，據師傅說今天情況還算好的哩，有時是動彈不得，真是萬幸只晚了40多分鐘入住中國邊疆研究所旁的太姥山旅店。南方人似乎不喜吃羊肉，在騰沖的幾日聞不到羊肉味，既然到了北京索性點了數道羊肉料理，再搭配北京二鍋頭與劉秘書長好好的享用一番。

2日上午9點準時抵達中國邊疆研究所，由於邢所長臨時社科院有會議，故改由副所長李大路先生主持，所裡的學者幾乎到齊，珍惜這場臺灣

研究中國邊疆學術既深且廣的學者劉學銑先生的專題講座。劉秘書長也不失大家所望在先前就已擬好講座大綱，大綱內容如下：

## **壹、何爲邊疆**

### 一、邊疆與核心

### 二、邊疆各說

#### (一)地理邊疆：陸疆與海疆

#### (二)民族邊疆

#### (三)政治邊疆

#### (四)文化邊疆與經濟邊疆

### 三、兩百年來的邊疆地區

#### (一)東北

#### (二)內、外蒙古

#### (三)新疆

#### (四)西藏

#### (五)西南地區

## **貳、邊疆問題**

### 一、主觀或內在因素

#### (一)「治邊政策之適否」

#### (二)邊臣疆吏之良窳

#### (三)漢人之態度

### 二、客觀或外在因素

#### (一)外人之蠱惑、勾煽、分化，甚至裂解中國

#### (二)少數民族人士的野心，甘受外人參養

#### (三)整個國際不願中國統一、團結，更不願中國強大

## **參、解決邊疆問題與芻議**

### 一、積極面作法

#### (一)加強邊疆研究

#### (二)強化宣導邊疆與內地的「離不開性」。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

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兩個或三個離不開)

(三)漢人須放下大族思維，從內心尊重少數民族

(四)教科書中多加正面描述少數民族

(五)派優秀幹部到邊疆地區工作

(六)鼓勵優秀青年到邊疆

(以上兩者均需加強學習簡單邊語)

(七)選拔少數民族人才到省(區)級及中央工作

(八)盡量落實邊疆資源用於邊疆

(九)邊疆各重大建設盡量用邊疆人

(十)鼓勵邊地大企業與當地學校建教合作

(以上兩項可能須中央補助，但民族工作本身就是花錢的工作)

(十一)吸納當地意見、宗教領袖進入政府相關部門(至少應經常保持聯繫)，使其瞭解政府決策，進而影響一般人民

(十二)其他

## 二、消極面作法

(一)強化邊地治安力量(含通報系統、運輸工具、治安人力與火力)

(二)對犯罪者速審速決

(三)對外人分化邊疆情況廣為宣傳

(四)可由民間人士撰文分析維、藏縱然「獨立」情況只有更壞，可舉中亞五國之貪污、獨裁為例，西藏人口已多，物質依舊不足，一旦獨立實無法自存。

(五)藏、新各有民族矛盾，可由普通學者撰文分析

(六)邊境管理加強

(七)加強與外媒溝通，使其瞭解恐攻本質

(八)網路管理

(九)加強國際合作

(十)掌握資訊，增加談判籌碼

(十一)責成宗教或意見領袖保境安民，定期給予獎勵

(十二)其他

## 肆、結語

- 一、邊疆問題就是民族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甚至是外交問題，邊疆政策也即民族政策，是長期的投資，難於短期見效，更不可能立竿見影，當前的少數民族政策並無問題，而且目標正確，其所以仍有問題出現，除外力介入，執行面是否還有改進空間？頗值得探討。
- 二、找出真正意見或宗教領袖，加強溝通，並加以培植。
- 三、舉辦大、中學生寒、暑假民族融合研習營，從繼起一代加強民族融合基礎，參與者均需嚴選有發展潛力者，講師更需嚴選絕對反分裂者，且需口才好、學識淵博(廣度重於深度)，必要時也可請海外人士擔任，以增加對參訓學員號召力。
- 四、推廣邊疆研究。
- 五、加強與國際學術合作，但更須加強瞭解其背景。
- 六、強化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人員、預算，使成全國邊疆學術研究上層決策部門，以便統籌邊疆研究工作，而免重複調研工作而浪費人力、財力。

專題講演結束後，有許多老師提出了問題，問題中當然也包括了中國邊政協會成立的時空背景與「中國邊政季刊」的研究宗旨與未來的發展方向，劉秘書長不但一一說明另更作了許多邊疆情況的彙整尤以新疆近數十年來所發生的動亂及頗析，並介紹了一套完整的剪報記錄，這套剪報資料中國邊疆研究所與社科院民族與人類學研究所也深感興趣並提議以購買條件作為收藏。中午由邢所長作東除為今日的專題講演另也邀約劉秘書長與我均為熟識的社科院郝時遠祕書長，出版社主任宋月華，方素梅老師，席間由劉秘書長代表理事長與中國邊疆研究所邢所長簽署雙方「學術文化交流合作協議備忘錄」(如圖二、三、筆者拍攝)，為此次北京、騰沖學術之旅留下美好的成果，同時也為中國邊政協會再更進一步的與大陸從事邊政研究單位的成果喝采。

(圖二) 劉秘書長與中國邊疆研究所邢所長簽署雙方「學術文化交流合作協議備忘錄」



（圖三）學術文化交流合作協議備忘錄

# 中國邊政

## 学术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备忘录

台北中国边政协会 （甲方）

中国边疆研究所 （乙方）

缘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中国边政协会举办之「如何圆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国梦」学术研讨会，贵我双方合意后，签订本合作协议备忘录。

- 一、本备忘录系双方加强学术文化交流合作为意旨。
- 二、甲方承诺致赠乙方自 2014 年起，每期出版之《中国边政》季刊。
- 三、每来年由甲方主办之两岸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所可派若干学者参加（确实人数俟学术研讨会规模而定，惟不少于二人）。
- 四、乙方如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时，邀请若干人参加（确实人数俟学术研讨会规模而定，惟不少于二人）。
- 五、乙方所出版刊物与书籍致赠甲方。
- 六、以上合作备忘录，经双方会议协商通过后生效。

（以下空白）

甲方代表人： 劉學鈞

乙方代表人： 邱繼程

2014 年 12 月 2 日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9 號 29 樓 電話(02) 27392222-1106 傳真(02)27207858





##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一屆第三次理、監 事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二月十四日，上午 11：30 時整

二、開會地點：台北市松壽路 2 號（君悅二樓雲錦廳）。

三、出席（請假）人員：如附件一。

四、主 席：楊克誠理事長

記錄：林遙鵬

五、主席致詞：

六、來賓致詞：無。

七、報告事項：如附件二。

八、臨時動議（決議）：如附件三。

十一、散會。

附件一

##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出席、請假人員

理事名單			監事名單		
編號	是否參加	姓名	編號	是否參加	姓名
1	✓	楊克誠	1	✓	馬普東
2	✓	阿不都拉	2	×	張華克
3	✓	廣定遠	3	✓	賴蕙玲
4	×	楊開煌	4	×	楊哲淑
5	✓	藍美華	5	×	蘇家煦
6	✓	多長有	合計	出席：2 人 請假：3 人	
7	×	粘聰明			
8	×	張台生			
9	✓	娥舟文茂			
10	✓	周 健	會務人員		
11	✓	趙竹成	1	✓	劉學鈺
12	×	張淑珍	2	✓	林遙鵬
13	✓	巧兒潘			
14	×	楊大鵬			
15	✓	李信成			
16	✓	王慶平			
合計	出席：11 人 請假：5 人				

✓：示出席

×：示請假

附件二

**報告事項**

- 一、2014 年如期出版《中國邊政》季刊四期(197-200 期)。
- 二、2014年4月25日，本協會假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4樓會址，舉辦 103年(第四十一屆第二次)年會
- 三、2014年4月25日至5月2日，本協會假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8號4樓會址，舉辦「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兩岸學術研討會，共邀請中國社科院郝時遠秘書長等12位大陸學者發表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已委託台北思行文化出版社編輯成冊，依合約電子版部份本協會可得 40%版稅，紙本可得10%版稅。
- 四、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5 日，理事長率副秘書長應邀參加中國社科院與山東煙臺大學所合辦之之「海峽兩岸解決民族問題的歷史經驗和現實抉擇」學術研討會。
- 五、201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秘書長與副秘書長應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原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之邀到雲南騰沖參加「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西南論壇（2014）：中國沿邊開發開放與周邊區域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林副秘書長提出「中國邊政協會-《中國邊政》季刊邊政學術論文梳理」論文，頗受與會者之重視。並邀請秘書長主持一場學術研討會。
- 六、與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所簽定學術交流、互贈雙方出版刊物。
- 七、本會出版之《中國邊政》季刊，此間若干大學已認定所刊論文可作教師升等之用(如中正大學、文化大學等)。
- 八、2014 年以私人關係爭取到某文教基金會贊助新台幣捌萬元及該基金會以某篇文章又致贈貳萬元稿酬；思行出版社贊助新台幣貳萬元。
- 九、本年 8 月將由中國社科院主辦在青海循化召開兩岸學術研討會，按循化一地係多民族聚居之處，尤其回族居多，對民族工作之研究饒具意義，當鼓勵本會會員多報名前往與會。
- 十、明(2016 年)年由本協會主辦兩岸學術研討會，主題可否定為《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
- 十一、《中國邊政》季刊，委託智慧藏上網供各界下載，截至 2014 年止共收入 1344 元，已入帳。
- 十二、本協會之運作承副秘書長協助，特此申謝。

## 壹、臨時動議

- 一、本年度會員大會召開時間、地點。
- 二、大陸中央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正擬進行臺灣研究中國邊政學術之人物訪談研究計畫，但礙於經費遲遲無法成行，盼本協會能予落地接待方式完成相關研究之協助。
- 三、政大社科院民族系碩、博士生將進行臺灣研究邊政學學者名錄建檔(政大民族所邊政系之師資、學生為主，及其他研究學者)
- 四、本年 8 月將由中國社科院主辦在青海循化召開兩岸學術研討會。
- 五、《中國邊政》季刊為能更符合學術期刊規範，將進行部份調整：
  - (一)《中國邊政》季刊封面將採中、英對照。
  - (二)研究論文摘要需中、英對照。
  - (三)研究論文架構須更嚴謹，匿名審查要更落實。
- 六、學銚長年擔任祕書長與《中國邊政》季刊主編，今已然年邁，請准予辭去此職，請理事長另覓適合人選擔任祕書長與《中國邊政》季刊主編乙職。

## 貳、決議事項：

- 一、今年會員大會定於民國 104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16:00 召開，地點請秘書處儘速選定(鼓掌通過)。
- 二、大陸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進行臺灣中國邊政人物訪談研究計畫，本會擬落地接待，請秘書處辦理費用規劃(鼓掌通過)。
- 三、政大社科院民族系碩、博士生將進行臺灣研究邊政學學者名錄建檔，請秘書處規劃協助方式(鼓掌通過)。
- 四、請秘書處通知本會會員，鼓勵本會會員報名與會，至於參會費用補助，請秘書處規劃提報(鼓掌通過)。
- 五、秘書處所提《中國邊政》季刊為能更符合學術期刊規範，將進行部份調整方案至為正確，《中國邊政》季刊如今有大學已認定所刊論文可作教師升等之用，可見是本會先進共同努力的成果，同時也是秘書處同仁與時精進的規劃，但我們仍需更努力以赴，實事求是改正，只要

是能符合本會以「擁護憲法落實邊疆政策，團結各民族研究邊疆問題，促進邊疆現代化」宗旨之文章皆可刊載，不應侷限只以臺灣學者論文為主，也應包括大陸學者及其他地區研究中國邊政之學術論文，惟須特別注意著作權問題(鼓掌通過)。

六、秘書長請辭乙案，理事長代表理、監事會予以挽留，並冀希劉秘書長能留任為中國邊政協會之發展延續努力(鼓掌通過)。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論文題目、摘要均需附英譯，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經本社同意後，作者可自行出版專書。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鈺。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三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 季刊

名譽  
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2段141號4樓之6

電話：2314-142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0197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1658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